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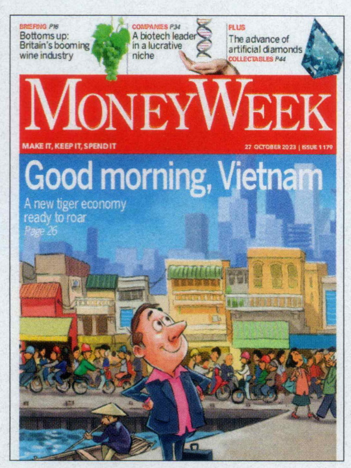
2023.11.6
2023年第45期，总第1263期
www.lifeweek.com.cn

房地产新局

许家印落幕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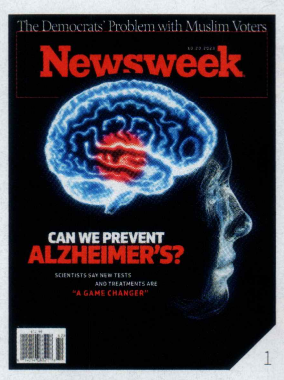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生活周刊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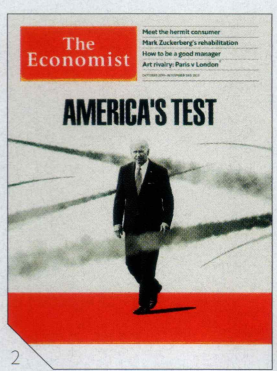


《货币周刊》2023.10.27

亚洲新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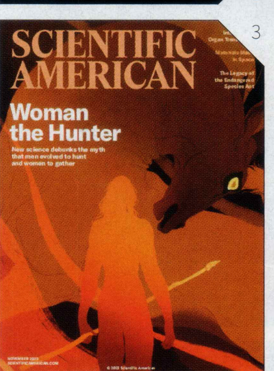
20 年前，越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现在，越南被称为新的“亚洲虎”，经济蓬勃发展。1986 年，越南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不到 7%，2021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93%，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耐克鞋和三星手机都是在越南制造。在 2002 年之后的 20 年里，越南经历了三次外商投资繁荣期，人均 GDP 增长了 3.6 倍，跃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除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近年来越南也在积极布局科技型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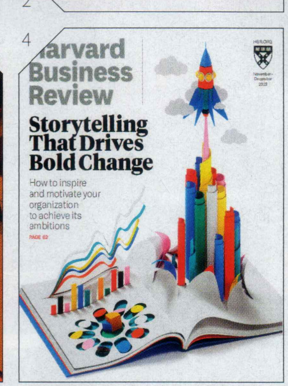




1 2

3 4





1 《新闻周刊》2023.10.20

一种新药

仅在 1998 年至 2017 年间，就有 146 项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的临床试验失败。今年，两种新药的研发打破了阿尔茨海默病 20 年的研究僵局。名为 Leqembi 的新药在试验中被证明能使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降低近 30%。今年 7 月，Leqembi 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全面批准，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与此同时，礼来公司（Eli Lilly）研发的另一种药物 Donanemab 被证明在减缓疾病进展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

2 《经济学人》2023.10.28

美国的拐点

拜登将巴以冲突称为美国的“拐点”，对美国能否继续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学人》认为，美国具有很多优势，其一是军事实力。美国去年的国防开支相当于排在其后的 10 个国家的总和，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其二是经济实力。美国人口占世界的 1/20，产出则占到全球的 1/4，这在过去 40 年里没有发生改变。如果拜登成功应对了加沙危机，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3 《科学美国人》2023.11

女性运动生理学

最新研究发现，远古的女性和男性从事着同样的狩猎和觅食活动，女性有着悠久的狩猎历史。来自运动科学的证据表明，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更适合耐力性运动，比如跑马拉松，而男性则擅长短暂而有力的爆发性运动，如举重。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雌激素决定的，雌激素在运动表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运动的控制和记忆，能促进神经元的生长发育、改善脂肪代谢。

4 《哈佛商业评论》2023.11～12

讲故事的能力

研究表明，讲故事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可以将人们团结起来。对领导者来说，讲一个清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塑造团队的信念和态度、激励团队进行变革。这其中包括四个关键步骤：充分理解故事、用简单的语言进行叙述、规划严谨乐观的前进道路和识别并利用自身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者的情绪具有高度的感染力，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会有的放矢地展露自己的情绪。



28 **封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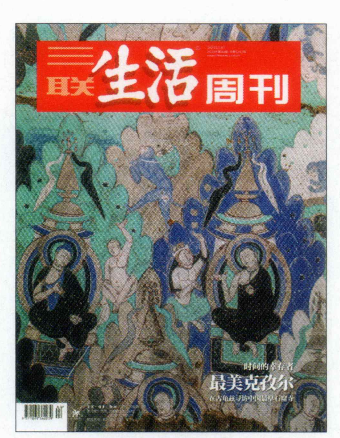
房地产新局

许家印落幕记



封面绘图：范薇

2023年第45期，总第1263期，2023年11月6日出版。



2023 年第 44 期，总第 1262 期

最美克孜尔

上周有幸参观了克孜尔千佛洞，非常值得一看。会让人惊叹颜料的鲜艳、刻画故事的精彩。希望能好好保存，让更多的人欣赏到。（@ 林居安）

6 年前第一次去参观，就惊叹石窟内壁画色彩之美丽，念念不忘。今年去南疆，又特意再去了一次，发现它的美依旧能打动我。（@ 王渊 Valerie）

父亲去世后

父亲活了 85 岁零 4 个月，作为儿子，我和他交流最多的就是这最后 4 个月。那时他已经起不了床，知道即将去另一个世界，所以有什么就说什么，彻底放下了往日严父的架子。

他念叨说自己走上社会，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不该离开上海。“上海多好啊，要是我留下，你们几个不说上‘清北’，复旦、交大估计是没问题的。”病床上，父亲回忆过往。他总认为是自己的人生抉择，给后人带来“蝴蝶效应”，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之所以当年他自愿舍弃上海户口，是觉得爷爷奶奶管束太严，他想去外地真正独立地生活。若干年后，我们兄弟仨也都想考外地的学校，分配到外地工作。和父亲一样，也想摆脱父母的管束。但父亲以他的人生经历，认为我们必将后悔，于是阻止了我们远离原生家庭。

看过一篇文章说，“家有两种：一种家，家里人都想回去；另一种，家里人都想逃离”。后一种都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家庭。就拿我们家而言，父亲凡事爱替儿女做主，然而看问题缺乏前瞻性。他的主观想法是好的，客观上却将孩子带进了沟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看到了他立的遗嘱，他将所有遗产给了二哥。二哥二十多年都在“啃老”，而且没有照料过病重的父亲。大哥一直是陪护父亲的主力，十多年贴进去一二十万元。父亲的遗嘱，立意可能觉得二哥的条件最差，应该向他倾斜。然而他没有考虑到，纵然大哥不计较，大嫂、大侄儿会怎么想？

“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形同陌路，多半因为父母在世时，有些事情没处理好。”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我身边有一些特别恋家的朋友，逢年过节就会赶回原生家庭聚会。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依然经常走动。这些家庭都有共同点：管理有序，每个人都能从大家庭受益。

就拿朋友阿翔来说，10 年前他做生意失败，父亲发动全家帮他渡过难关。5 年前，原本条件最好的小妹，丈夫被判刑入狱。父亲召开家庭会议，最后敲定哥仨每人每月出 500 元，他自己从退休金里出 1000 元，帮助小妹渡过 3 年难关。

遗产问题最容易让大家庭分崩离析，处理得好的家庭，父母在世时往往已经公布方案，大致公平合理。有些家庭某个子女木秀于林，经济条件好出兄弟姐妹一大截，会主动放弃自己那份。这种情况下，一家人的情义会变得更深厚。这和父母倾向性太强的“划拨”相比，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毕业分配，分配去的单位身不由己，有的让人想一直干下去，有的让人想马上离开。投胎到一个家庭，就如同被老天分配到一个单位，同样身不由己，同样有人想逃离，有人想待一辈子。当我们成为家长时，一定要好好“经营”，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争取将自己的家庭建设成一个好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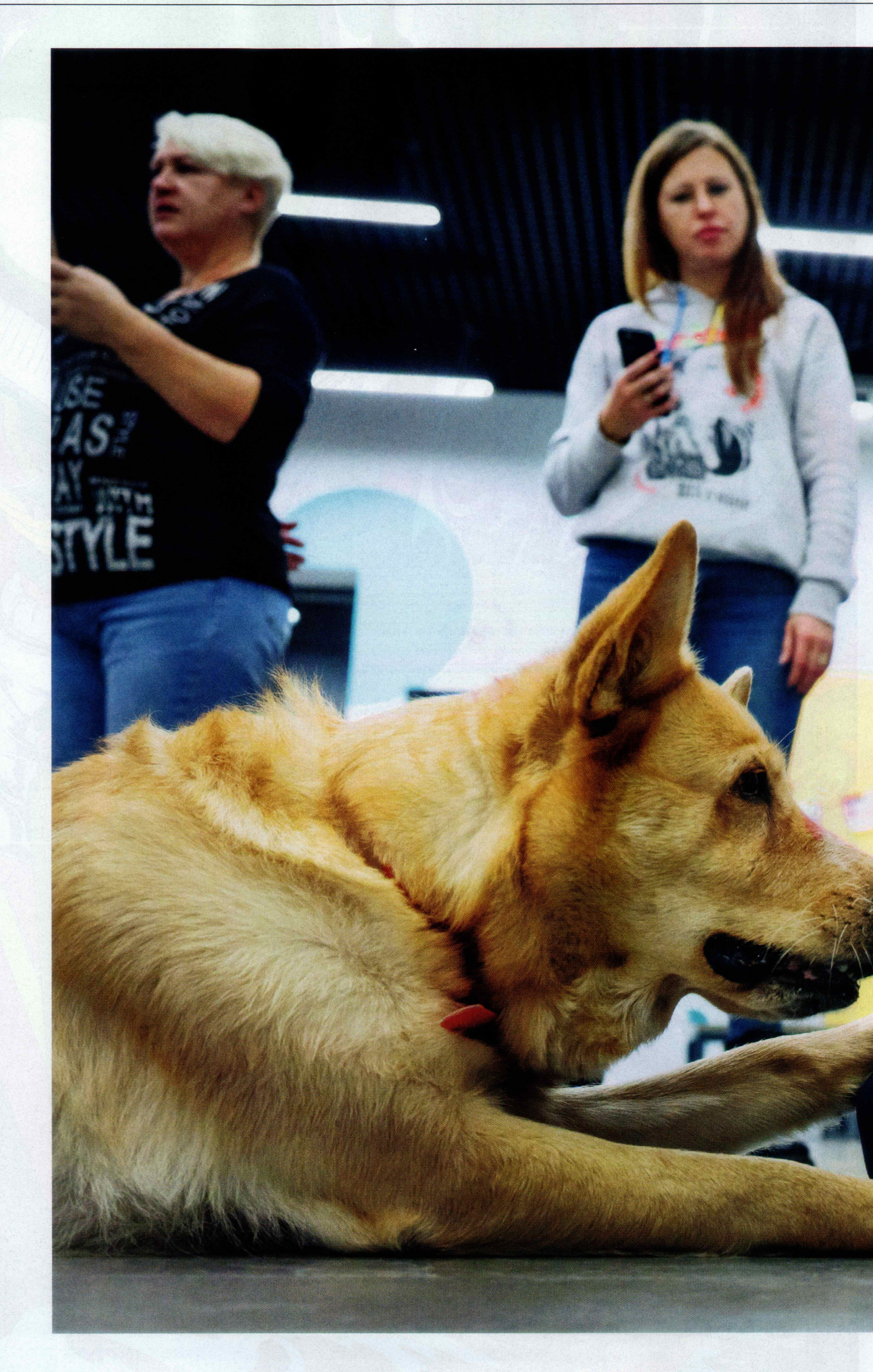
（读者 天潼）

本期截稿时间：10 月 30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乌克兰 |

“狗狗医生”

10 月 26 日，基辅的一个社区中心使用动物辅助疗法，为因俄乌冲突受影响的孩子提供创伤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犬是近年来越发常见的一种服务犬。







英国 | **万圣节“鬼故事”**

（右图）10月25日，威尔士的演员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在牛顿别墅向观众讲述17世纪的鬼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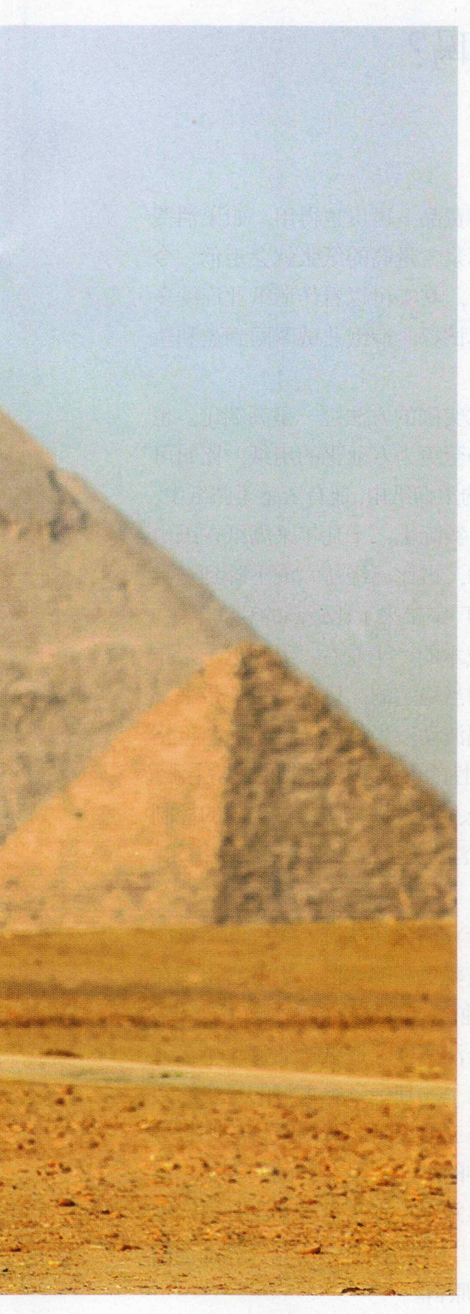
德国 | **人工智能音乐机器人**

（左页上图）10月26日，马格德堡大学移动对话系统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与人形机器人Ari互动。马格德堡大学的科学家们把人工智能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这台机器人将与各音乐流派的艺术家会面。

墨西哥 | **飓风**

（左页下图）10月27日，飓风对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等地造成严重破坏。墨西哥安全部公布，飓风“奥蒂斯”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36人失踪。





埃及 | **艺术展**

（左图）10月28日，第三届埃及艺术展上，游客们乘坐马车路过法国艺术家斯蒂芬·布鲁尔的艺术装置“神庙”。

印度 | **祈福**

（下图）10月28日，沙拉德·普尼玛收获节当天，人们点灯祈福。人们还在节日当天进行斋戒，供奉印度教的财富女神拉克什米。



纸张还会像环保风暴时那样涨吗?

文 · 邢海洋

9月，针叶林木浆价格上涨13%，阔叶林木浆价格上涨15%，整个夏天木浆价格上涨了三成。金九银十，这是传统的用纸旺季，太阳纸业、玖龙纸业、晨鸣纸业等多家公司宣布了价格调整，有的一个月上调了三次。10月以后，调价还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纸张要大涨价了?

对纸张涨价的记忆，停留在两次环保事件。6年前，因为环保趋严，国家严控纸厂的废水排放，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国内各类纸张从一月一涨，到一周一涨。新闻纸价格上涨40%，从每吨3800元涨到5300元，印刷用白卡纸过去一直都保持着6500元/吨的价格，那时却涨到1.3万～1.4万元/吨。后来是2020年另一次环保风暴，《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政策实施，2020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当年年底实现零进口。对于造纸业这个重资产、长周期、高投入的行业来说，这又是一场艰难的过关考验，纸张价格再次大涨。

环保风暴过后，造纸业恢复常态，造纸企业却开始卷起来。造纸业的销售毛利率2019年曾达到过21.45%，随后四年连续下降，2022年为13.14%，2023年一季度再度降至10.8%，可谓是步步退守。具体到企业，比如维达纸业，今年上半年营收增长10%达到100亿港元，可净利润下降了八成，只有1.2亿港元。纸巾三巨头中的另两家，中顺柔洁净利润下跌超六成，恒安国际表现相对好一些，但净利润也下跌了4%。

造纸行业是典型的周期行业，纸张是刚需，生活用纸更是刚需，还是高频消费品，再贵也得用，如果消费者收入提高，高品质的木浆含量高的纸张就会走俏。今年9、10月间的纸张涨价，其实可以看作造纸业连续多年利润变薄后的一次集体试探，造纸业试图回到盈利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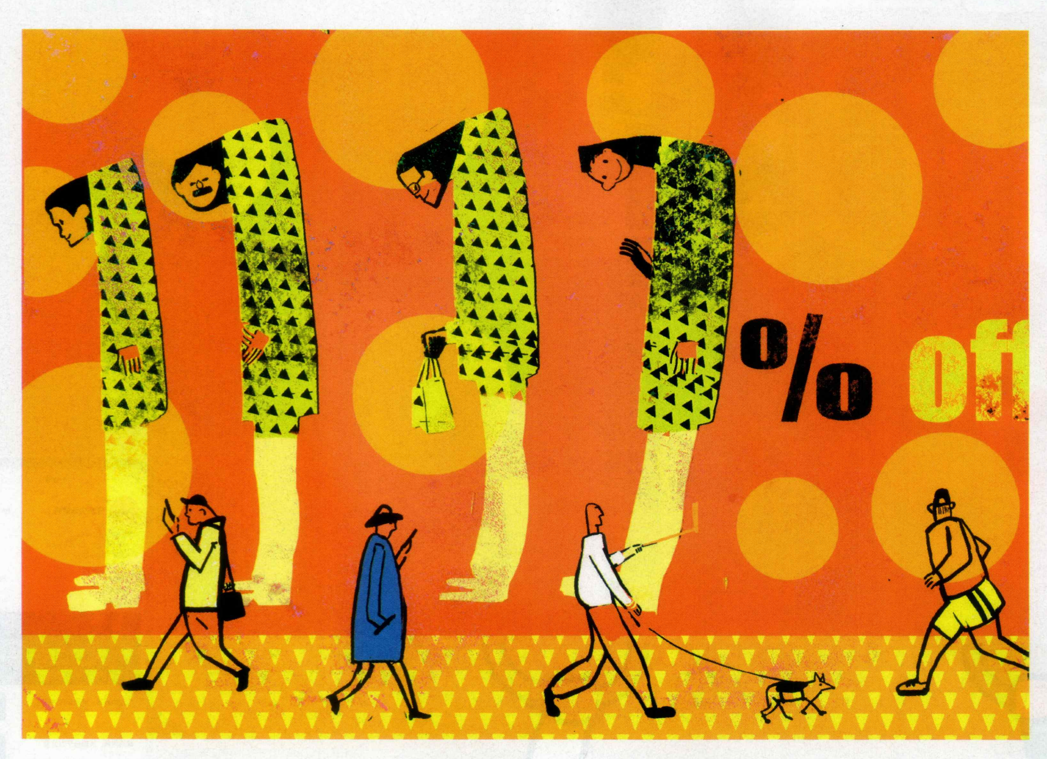


利润降低，企业寻求突围的方法之一是高端化，也就是生产更柔、更紧实乃至更为专业化的用纸，比如可水洗的厨房用纸、羊绒棉的柔韧纸巾，还有云感柔肤纸巾、高端纸尿片等卫生用品。实际上，十几年来厕纸在纸巾消费中一直是稳定下降的，占比已经从六成下降到一半左右，反而是高端用纸给厂家带来了比较高的利润。

木浆占到纸张生产成本的一半左右，纵观近十余年来的木浆价格，其实是相当稳定的，只不过疫情带来了供应链紧张，价格才大幅波动，当供应链稳定后，价格就稳定下来了，只有季节性的供需矛盾带来的短期上涨。长期看，尽管树木的生长、采伐和全球二氧化碳的控制息息相关，但无纸化办公抵消了部分生活用纸的需求，木材供应并不存在缺口。

我们观察中国造纸产业的分布状况，主要的造纸厂家并没有分布在森林覆盖率更高的地区，也没有出现在进口纸浆更便捷的沿海地区，而是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以湖北为中心的长江两岸。造纸行业每年千亿元的产值，一半被湖北承包了，其中孝感主打的是生活类纸巾，荆州主要制造的是工业用纸，黄冈主打的则是办公用纸。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并没有广阔的森林，造纸原料何来呢?造纸原料并不一定来自于木浆，长江中下游湖泽密布，湖北号称“千湖之省”，生长在湖泊池沼的芦苇提供了廉价的造纸原料。

造纸业还在寻求另一种突围，即电商销售渠道，体积大、质量重，纸巾自身的特点使之更适合邮寄渠道。如今有的企业将近一半的产品通过电商销售，这也节省了流通环节的费用，抑制了纸张价格的上涨。联想到你所使用的纸巾很可能是芦苇捣成浆制作的，而芦苇和树木不一样，一年生，不受环保法规的约束，价格根本不可能一飞冲天。因而，纸张的提价也是季节性的，并不会如环保风暴后的贵上天际。



栏目插图 · 范薇

重回低价

成也“双 11”，败也“双 11”，张勇卸任阿里巴巴 CEO，京东徐雷退位。平台玩不起套路，只有全网最低价了。天猫“跨店满 300 元减 50 元”后，又首次官方直降、立减，不用凑单，一件就打折；京东则是直接取消预售，现货开卖，在提供跨店“每满 299 元减 50 元”的优惠基础上，可继续叠加补贴。天猫与京东还都增加了“买贵必赔”“买贵双倍赔”的服务。

港股没了流动性

特区政府计划于 11 月底完成立法程序，将港交所股票交易印花税从 0.13% 降至 0.1%。这背后是港交所每日零成交的公司从去年同期的 400 多家扩大到现在的 700 多家，全所日成交额跌落千亿港元。港股正深陷估值低、融资功能减弱、流动性紧张等多重危机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在中国香港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增强 ETF 的超额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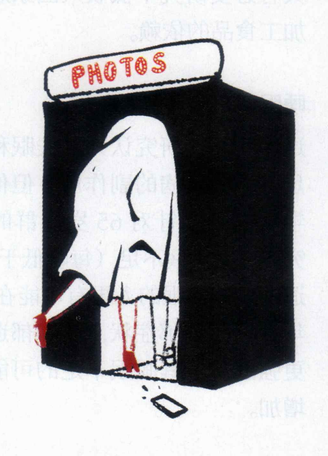
权益类市场表现不佳，股票 ETF 却大放异彩，增强策略 ETF 更是在跟踪指数之外，贡献了不俗超额收益。截至 10 月 27 日，近八成增强策略 ETF 成立以来获得了超额收益，最高超额回报超 8%。原因是，除了策略有效，市场震荡增加了主动管理的难度，但对于量化策略，尤其是指数增强策略是有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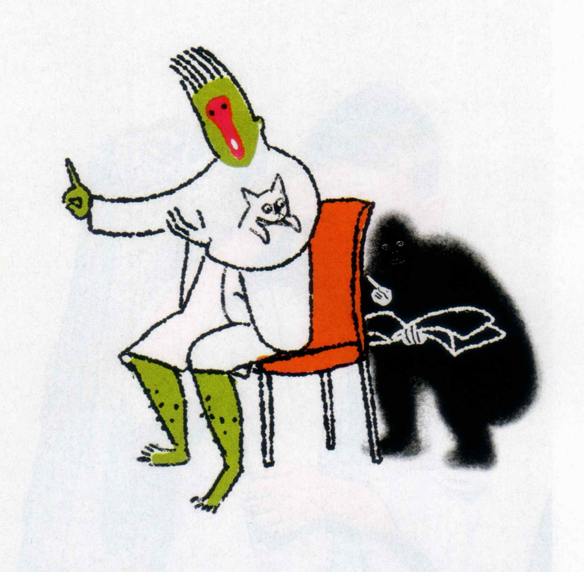
1万亿国债和3.8%的赤字率

中央财政将增发特别国债1万亿元。万亿级别的发债，历史上罕见。1998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洪灾，启动了特别国债；2007年，为购买外汇作为中投公司的资本金，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2020年，疫情暴发，有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此次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安排给地方，多年控制的3%的赤字率也将升至3.8%。

人生四格

在小红书、微博和抖音等平台上，年轻人晒出“人生四格”——童年5～15元的大头贴，如今值20～60元，还摇身变成了互联网上的社交货币。一台台大头贴机器被投放在商圈、步行街和网红打卡点，和娃娃机、自助彩票机组成了“社交三件套”。“投放机器，无需人工，两三个月回本”的广告也多了起来，但愿不是又一轮收割。





直播有剧本

直播间苦情戏收割老年人，颇有“中招”的，还有网友吐槽“退货的速度跟不上奶奶被骗买的速度”。苦情戏其实有剧本，网上即有售，还有商家可代写带货剧本，包括剧情、直播台本、带货话术等，单款商品收费几百元。除代写完整带货方案外，还有部分商家打包出售全题材的口播文案或剧本，几千篇婆媳故事口播文案仅售4.8元。

激增的美债

9月美债激增了6000多亿美元。此前，3个月内增加了1万亿美元，创下了33万亿美元的纪录。海外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债最大买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经从9万亿美元的高位缩减了1万亿美元，中国在过去22个月中有20个月都在抛售，第一大海外“债主”日本5个月减持美债304亿美元。而明年还有17.84万亿美元新发美债等在后面。


（站酷海洛 供图）

防晒霜悖论

全球范围内，防晒霜的使用率保持着上升趋势，但黑色素瘤和皮肤癌的发病率也在上升。一些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防晒霜悖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皮肤科学系的学者对此进行的新研究表明，问题主要在于，人们错将防晒霜视作任意晒太阳的许可。一方面，宣传广告往往让人误以为只要涂抹防晒霜就能起到预防癌症的作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涂抹的量并不够，在户外活动数小时也不会补充。这些都造成人们产生错误的安全感。研究者表示，防晒霜很重要，但比起防晒衣或者直接避免日晒，它却是保护效果最差的方法。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防晒霜，应该成为全球皮肤癌预防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好消息



淀粉类蔬菜的营养

《营养前沿》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淀粉类蔬菜（如土豆、玉米、豌豆）在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素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不应为了降低碳水摄入量而避免食用它们。如果用谷物类食物代替淀粉类蔬菜一天，会导致人们摄入的钾减少21%、维生素B6减少17%、维生素C减少11%。



新的最佳步数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领导的一项研究首次确定了能让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益处的最佳步数。该研究表明，每日行走8000步（约6.4公里）就能显著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天走7000～9000步是合理的健康目标。研究者还指出，走得越快，对健康越有益。

坏消息



超加工食品的成瘾性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在分析了36个国家的281项研究后发现，14%的成年人和12%的儿童对冰激凌、薯片等高糖、高精制碳水化合物的超加工食品上瘾，而这与人们对烟草和酒精成瘾的程度相同。研究者认为，尤其有必要研究中低收入国家居民对超加工食品的依赖。



睡眠不足诱发抑郁？

过去的许多研究认为，失眠和睡眠不足是精神疾病的副作用。但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项针对65岁人群的基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每晚低于5小时）遗传倾向更强的人更有可能在4～12年内出现抑郁症状，而抑郁遗传倾向更强的人，其睡眠不足的可能性没有增加。

我们这般“脆弱”（而不仅仅是“必有一死”）的生物，却在人类心灵中孕育了对幸福的渴望，我们又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欢欣鼓舞呢？对此，卢梭将给出实质性的答复：不仅要以敏锐的判断力，还要以知足的心态来使用生命，并认同生命所赋予我们的生活，不违背其内在和隐秘的“意志”；不与生命作对，也不干预生命反对生命本身；总之，首先让生命表达自己。

——法国哲学家保罗·奥迪，《卢梭：一种心灵的哲学》

在中国艺术家看来，通常人们所说的时间，其实是外在秩序的时间，它是由空间变化所确定、被历史叙述所记载、在知识系统中沉淀出的对象物。它带有鲜明的权威印迹，裹挟着欲望追逐的躁动，记录着朝代更替的血腥，映照着倏忽变动如苍狗的世相，蕴含着人生老病死的悲欢，也充满了对万物生成变坏的怜惜——这种秩序化、刻度化的时间，是一种“知识时间”，是对象化存在。

——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四时之外》

成功的文学教师“必须对精神生活抱有信念，必须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灵魂，以及如果要阐释过去三千年里的伟大作品，仅凭那些将人定义为生物学或化学的意外，或是经济力量的副产品的贫困的哲学是不可能的”。像布里斯·佩里一样，通才捍卫“业余精神”，希望这种精神能够“穿透、照亮和理想化我们庞大的工业民主中的粗野力量以及不可遏制地向前疾驰的大众”。

——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格拉夫，《以文学为业》



（插图 山羊胡）

工作是我们照料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彼此联系的桥梁。只为生存而工作固然令人绝望，为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而工作却会给劳动一份无比的尊严。那样一份尊严，那样一种百折不挠的力量与渴求，它不断催人奋进，如同一股生命之力。

——美国记者兰斯·莫罗，《工作的意义何在》

数字

104 地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北京市朝阳区、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本溪市、贵州省贵阳市、湖北省宜都市等104地被命名为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69.3 万

美国一名男子培育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平均辣度达269.3万单位，是先前最辣辣椒“卡罗来纳死神”的1.6倍。迄今只有5个人吃下过一整个这种辣椒。

1.298 亿

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电影成为史上首部总票房过亿的演唱会电影，票房超过了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花月杀手》，在美国国内的总票房达到了1.298亿美元。

打猎和写作

文 · 二公子　图 · 谢驭飞



德国朋友苦着脸跟我说要考试了，内心很忐忑。我这个朋友已经退休两年了，还考什么试呢？我追问，他支吾了一会儿，才跟我说要备考的课程很多，但如果通过了，他就成为一名持证猎人了。原来他说的是这个考试，我听说过有这么个说法，考猎人证大概是德国人在学业之外能遇上的最难的一类考试。

他跟我解释了一下，原来在德国打猎要知道的东西还不少。比如首先必须熟悉打猎目标，也就是对动物要清楚地了解，认识动物、分得清雌雄、哪些动物是要保护的不能猎杀、在什么时间能狩猎什么样的猎物等是基础知识。而且了解动物还不够，你还要了解相关环境，哪些土地以什么动植物为主、什么植物有毒之类。

当然对枪支火药及其他附属武器装备要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知道保险柜密码的人数，什么时候可以把武器取出来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有射击水平也是要考试的，如果枪法不准让一只动物受了伤痛苦很久却死不了，这也是不道德的。猎人买的手枪，就是专门给受伤的动物致命一击，解除其痛苦的。

此外，风险防范、生态环境保护、卫生标准都有笔试和口试。最后关于猎物的处理，也是要专人干专业的事。上次他和教练实习一起打了一头鹿，至今他家的冰箱里还有十多公斤的鹿肉，而且这还是他花钱买来的。为自己的猎物买单，是一种义务。打猎收获的鹿头他想留做标本，可是做标本的师傅太忙，没有空，于是他只能把割下来的鹿头放在家里，又专门买了个冰箱冻了两个星期。他跟我讲的时候带着苦笑，我问他住在这样的家里是不是感觉有点毛骨悚然。

当然和所有的爱好一样，最好的老师是兴趣。他的同班同学已经有好几个放弃了，也有人一直考不过一些科目，所以至今没有执照。我问朋友最喜欢打猎的哪个部分，朋友说是寻找猎物的时候，那种特别笨的猎物比如雄鹿他没有兴趣了，他说他的目标是聪明、敏捷而且凶猛的野猪。即使找上一天，最后没有收获，他也不想浪费弹药在轻而易举找到的猎物上。寻找，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他说的这些让我想起同样爱打猎的作家海明威。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说：“打猎之道在于，只要那里有一头这样那样的动物在，你就得在那里待下去；就像画画，只要你有颜料有画布，你就得画下去；还像写作那样，只要你能活下去，有铅笔和纸和墨水或任何用于写作的机子，或你愿意写的任何素材，你就得写下去。”

写作可能不需要考试，但是找到写作的目标，畅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形成一篇小文或者打磨出一个论点，和更多的人分享。这和我朋友打猎、射击，最后和我分享鹿肉串，何其相像。

同样是猎手，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在一次演说中这样描述写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临桌而坐，不受打扰，有足够的白纸，就可以感受谋章布局的快乐。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就让它去吧。下议院想干什么，就干吧，上议院也可以。市场可以崩溃、证券可以下跌，各种权利运动可以兴起，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时间可以躲开这个俗气、管理不善、杂乱无章的世界，用想象力这把钥匙，去打开大千世界一切宝物的小橱。”所以，想象力，就是文词的原野上最优雅且精准的武器吧。

无衣可穿

文 · 信仔　图 · 谢驭飞



人到中年，再穿带帽衫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它含有挑衅和鬼鬼祟祟的意味，它的兜帽能“罩住年轻人邋遢的样子，遮住粉刺和焦虑，遮住在自习室里戴的耳机，形成了一个足够自主的孤独空间”。所以带帽衫更适合学生和嘻哈族。

时尚杂志说，成熟的男子要有一件海军蓝的单襟夹克衫。“你可以像一个无业游民一样走进一家可爱的小酒店，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皱巴巴的蓝衬衫，并且不刮脸，但如果你套上一件海军蓝的夹克衫，那么你突然间就会看起来像乔治·克鲁尼，克鲁尼自己也穿它……买夹克衫的时候，要买合身的。如果太大，你会看上去像一个东欧的出租车司机。”

以前人们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工业化生产后，为了量产，衣服就只有若干尺码，导致很多人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而且衣服的尺码越来越小。67% 的美国女性穿 14 码或 14 码以上的衣服，而大多数商店都不出售这些号码的衣服。

英国作家琳达·格兰特在《穿出来的思想家》一书中说，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说，女性如果穿不了 6 码（S 码）的衣服就算胖。“卡尔·拉格菲尔德在扇子后面飞舞，以遮住他的双下巴，他跟麦昆这些胖男人都命令女性挨饿，以便能穿他们设计的紧身连衣裙。他们花钱买最贵的运动鞋帮他们瘦了下来，而且他们不用每天做三顿饭。”如果你去游泳池或桑拿房，就会注意到，不存在一般性的体型。“有的女的个子高、腰身短，有的躯干长但腿粗，有的像子弹立在优雅、瘦削的腿上，有的屁股大、腰细。随着财富和繁荣而来的是对苗条的推崇。女性的视觉形象变得越来越瘦，而现实中的女性却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答案很简单，就是放弃。把衣服当作伪装，穿运动服。”

时尚设计师不愿意为肥胖的人设计衣服，肥胖的人被认为生活不节制、身体不健康，这并不是事实。体重指数在 18 到 24.9 之间被视为健康，25 到 30 之间是超重，30 以上就是肥胖。但这个指数只研究了欧洲男性，对女性和亚洲人来说不够准确。有研究发现，体重指数正常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并不健康，而那些超重的人，有一半在代谢方面是健康的。肥胖的人有四分之一也是健康的。

大码服装很少，肥胖的女性甚至被迫购买男装。穿大码衣服的人自有一种特别的风采。2017 年，《卫报》的时尚编辑卡特纳·莫利说：“宽松的衣服现在比紧身衣服显得更时髦、更现代。很多人仍然认为，宽松的衣服很休闲，像睡衣、运动服，时髦意味着要穿紧身的裙子、合身的上衣，努力意味着要把腰带扎到最紧的扣眼。其实不是这样。宽松的衣服比紧身的衣服看上去更高贵、更周到、更优雅、更绝妙。宽松的衣服有其自己的规则和要求。细节的多少是关键。太朴素，就会看上去像使女，装饰太多就会像算命的。”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多彩深秋

APM Monaco ROMANCE 系列多色爱心链环项链以纯银手工制成，微镶了白色、蓝色、卡其色、红色、紫色、胭脂红色的合成立方氧化锆，交织出秋日大自然的调色盘，心形符号更适合无性别佩戴，链条长度可调节。





双重萃取

飞利浦全新双子星半自动咖啡机搭载“意式萃取+速萃胶囊”双重萃取模式，休闲时意式萃取模式带来了手作乐趣，忙碌时可切换到速萃胶囊模式，Creamy system 速绵干蒸汽系统则实现了新手拉花的愿望。

优雅格调

浪琴表名匠系列腕表搭载 L899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6 点钟位置设日期显示环及月相显示窗口，小指针指示当前日期，表盘上的银色麦粒纹饰在光线的折射下更具层次感，摩登的阿拉伯数字读时鲜明。





户外装备

INFINITE WONDERS 是 ASICS 以鞋型 GEL-KAYANO 14 为蓝本与 UNAFFECTED 推出的联名设计，鞋身配有拴扣系带系统，鞋带延伸至脚趾，并带有穿孔覆盖层，几何感材质拼贴打造出更耐磨的鞋面。



三合一骑滑车

Qtus B4-Penguin 能够一键切换推车、平衡车、滑板车三种模式，让孩子在不同玩乐场景中训练平衡能力、身体协调性与肢体力量，闪光轮与车灯一起为夜间玩耍保驾护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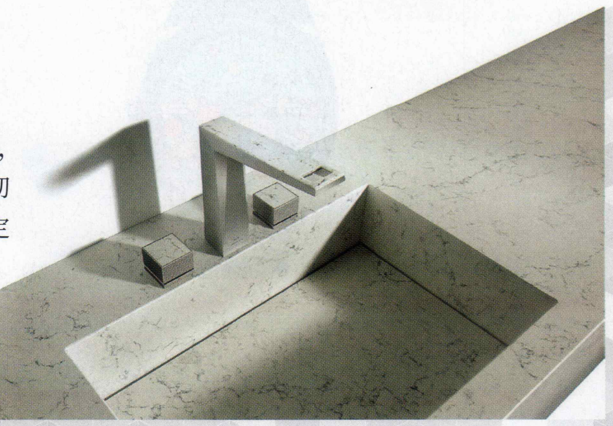
尖端材料

高仪 SPA 艾瑞欧纤薄盆在烧制过程中采用微晶纤薄技术，令晶体达到微观临界状态，从而提升晶体密度，使其更加薄韧轻盈；银晶釉技术将抗菌银离子烧制在陶瓷釉面中，形成稳定耐刮擦的抑菌釉面，有效抑制 99.9% 的细菌滋生。



便携式电站

SOLIX F3800 可作为应急备用电源在户外给设备和电器供电，3800 kWh 的内置电池以交流电的形式提供高达 6000 ～ 12000W 的功率，白天储存太阳能，实现自给自足，便携轮式手提箱设计方便携带。





堆叠宝石

Suzanne Kalan Fireworks 耳环采用自创的分散式镶嵌工艺，5 颗色泽柔和的彩色宝石从不同方向依次向上堆叠，像是随时会失去平衡散落下来。

彩色气泡

Rolex Oyster Perpetual 腕表在绿松石表盘上镶嵌带有夜光涂层的银色棒状时标，大小不一的彩色圆球像香槟酒中的气泡般集中在表盘底部，还有一些小球漂浮在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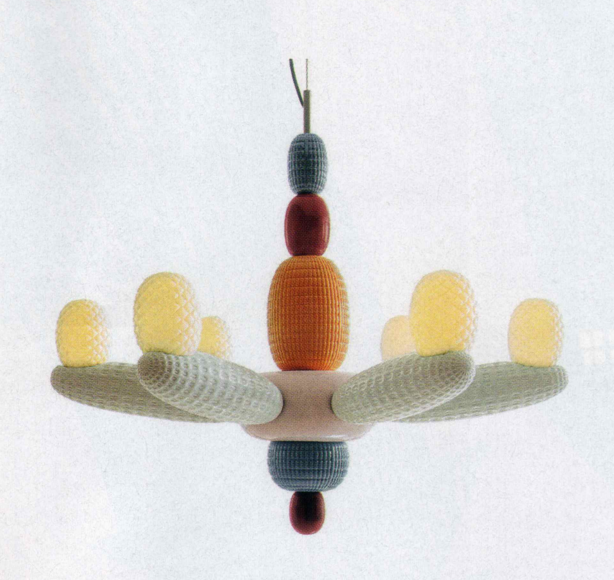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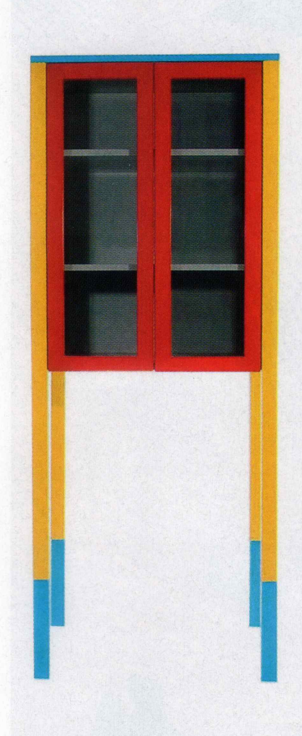
编织拉菲草

Tory Burch Fleming 单肩包用彩色拉菲草编织出交叉的菱格图案，包盖顶端融入用粉红和淡绿拉菲草刺绣的双 T 标志，可拆卸链式肩带装饰着黄色皮质流苏。

飘浮的气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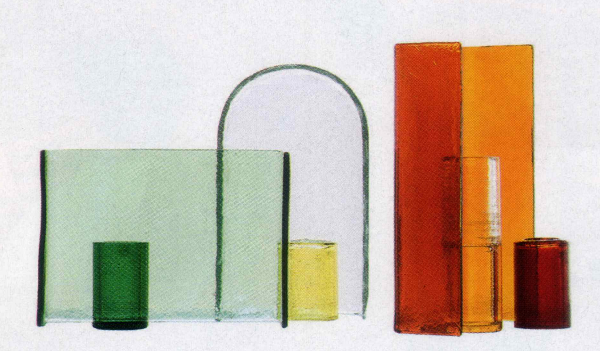
Lladro Afloat 枝形吊灯受气球艺术启发，由一连串色彩明亮的瓷质“气球”拼接而成。吊灯主体是 6 个形状各异的彩色模块，半透明的奶白色陶瓷球体充当灯罩。





莫兰迪色调

从亮橙色、草绿色到透明色，Bouroullec Alcova 花瓶系列如同意大利艺术家乔治·莫兰迪的画作。由于采用把熔融玻璃倒入木质模具的传统工艺，每件花瓶都略有不同。



长腿橱柜

Memphis Sowden 木质橱柜结合矩形柜体和轻质细长的底座，从深红色柜门到鲜黄色侧板及支架，每个构成元素都使用了不同的颜色。



（插图：范薇）

房地产新局
许家印落幕记

主笔 · 谢九

1998 年，我国告别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商品化，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2003 年，我国将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住房供应制度从保障房为主转为市场化供应为主，我国房地产进入又一个新时代；2023 年，中共中央确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房地产市场又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时代的终结

9 月 28 日，中国恒大发布公告表示：“本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先生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房地产 20 多年的狂飙之旅，许家印是一个最具符号性意义的人物，他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启动之初进入，然后用难以想象的杠杆获取超额利益，成为房地产狂飙时代的最大赢家。许家印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既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狂飙时代的终结。

1996 年，38 岁的许家印创建广州凯隆公司，1997 年更名为恒大。1998 年，中国开始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由此拉开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中国房地产由此进入轰轰烈烈的新时代。恒大的成立，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完美契合。

尤其是进入 2003 年之后，中国将房地产确认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出“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也从保障房为主的模式，切换为市场化为主的模式。

以此为起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而恒大借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机遇期，以最大限度放大杠杆，许家印从白手起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首富。凭借房地产市场的狂飙，2017 年，许家印以 2900 亿元的身家，超过马云和马化腾这两位互联网之王，成为中国首富。

许家印的财富传奇，不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代表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年代。不过，就在房地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拐点其实已经悄然而至。在经历了 2016 年那一轮房价大涨之后，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住不炒”的时代由此开始。



左图：2023 年，中共中央确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房地产市场又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右图：2020～2022 年，我国的 GDP 增速分别为 2.2%、8.4% 和 3.0%

2020 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经撰文表示：“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上世纪以来，世界上 130 多次金融危机中，100 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 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 GDP 的 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 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为了防止房地产这头灰犀牛冲击到中国金融体系乃至中国经济，有关方面开始约束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杠杆。

2020 年 8 月，住建部和央行约谈了 12 家重点房企，其中包括恒大、万科、融创、碧桂园等头部企业，向相关企业传达了“三道红线”的要求。新的监管对房企的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设置了“三道红线”：一是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二是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三是现金短债比小于 1。如果“三道红线”全部踩中，就不能再新增有息债务。监管层希望以此控制房企的负债规模，避免房企债务过大之后危及金融系统甚至中国经济的安全。

当时被约谈的 12 家重点房企，有 3 家踩中了全部“三道红线”，其中就有恒大，这意味着恒大无法再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持现金流。按照监管要求，踩中“三道红线”之后，还必须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降负债的目标。恒大的加杠杆之路戛然而止，去杠杆的利剑从此高悬头顶。

以恒大为首的开发商们的压力还不止于此。2021 年 1 月份，监管层还推出了贷款集中度管理。央行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对中资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划出了两道红线：一条是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一条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前者主要是针对房地产企业，限制银行资金过度流



向开发商。而后者主要针对个人购房者，要求银行的个人房贷占比必须控制在一定红线之内。

监管层设置贷款集中度红线，主要是为了防止银行贷款过度流向房地产市场，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危机，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风险，所以，监管层开始提前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之间筑起防火墙。

随着管理层对于房地产风险防范的举措日渐升级，以恒大为首的诸多开发商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链压力。在银行信贷和股市融资的渠道都被关闭之后，对于负债超过2万亿的恒大而言，不差钱的资本游戏就此破灭，债务危机迅速浮出水面。

2021年以来，恒大的商业汇票开始不能及时兑付，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开始讨要被拖欠的工程款，恒大旗下高达400亿元的理财产品也无法兑现，大量普通民众开始去恒大总部追债；2021年7月，广发银行宜兴支行请求法院冻结恒大资产，引发资本市场巨大恐慌，恒大的股票和债券双双暴跌；2021年12月，恒大的一笔美元债到期，恒大无法及时支付，正式构成违约，恒大的债务危机开始一步步升级。截至2022年底，恒大的负债总额高达2.4万亿元，其中有息负债1.7万亿元。

随着恒大的危机浮出水面，许家印也开始从财富巅峰跌落。2021年，许家印的个人财富从曾经的2900亿元缩水到730亿，从首富位置跌到第70位。随着恒大股价暴跌，许家印现在的身家还有200亿元，和巅峰时期相比缩水九成。

更致命的还不是财富缩水。2023年9月底，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作为过去20多年中国房地产最具标志性的人物，许家印的财富之旅走向终点，也意味着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落下帷幕，中国房地产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房地产的新时代到来

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做出最新定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标志着我国房地产市场迎来重要的分水岭,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式告别了短缺时代,进入过剩时代。

我国房地产改革20多年来,虽然中间经历过不少波折和低谷,包括2008年受到外部危机的冲击、2013年以来的去库存压力等,但是,有关方面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始终都还是认为房地产处于向上的周期。而这一次,最高层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历史上的首次,意味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真正迎来了历史性拐点。

回顾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历史,就能看出来,我国的房地产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从福利分房转向住房商品化是一个历史性节点;住房供给以保障房为主转向市场化为主是一个重大节点;而这一次,住房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我国住房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性节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住房长期实行福利分房制度,由单位向职工免费分配住房,或者以极低的租金出租。这种完全依靠计划分配的模式,不仅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更大弊端在于无法形成足够的供给,导致民众的居住水平持续下降。

在1949年新中国初期,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大概为4.5平方米,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人均住房面积反而下降到3.6平方米。而同期西方国家的住房面积普遍在20平方米左右,我国的福利分房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持续。

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1980年4月份,邓小平再次提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邓小平的讲话,为我国发展住房商品化奠定了基础。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正式提出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房改工作。不过,尽管80年代就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想法,但是,福利分房制度并没有马上终止,而是一直延续到1998年。

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提出了“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中国的福利分房时代正式终结,由此进入了住房商品化的时代,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不过,当时中国的住房改革虽然终止了福利分房制度,但还是采取了相对谨慎的做法,并没有将房地产完全市场化,而是借鉴了新加坡的保障房模式,“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不过,在时隔5年之后,中国的住房制度再度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从1998年的保障房为主的新加坡模式,切换到市场化为主的模式。2003年,我国首次正式确认了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的支柱性地位,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此为起点,随着市场化力量开始进入,中国房地产进入了前所未有甚至是空前绝后的高速发展时期。以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个指标来看,2003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首次突破1万亿元,到了2022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达到了13.29万亿元,不到20年时间累计增长十多倍。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住房供应快速激增。最近,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公开表示:“现在房地产



过去二十多年，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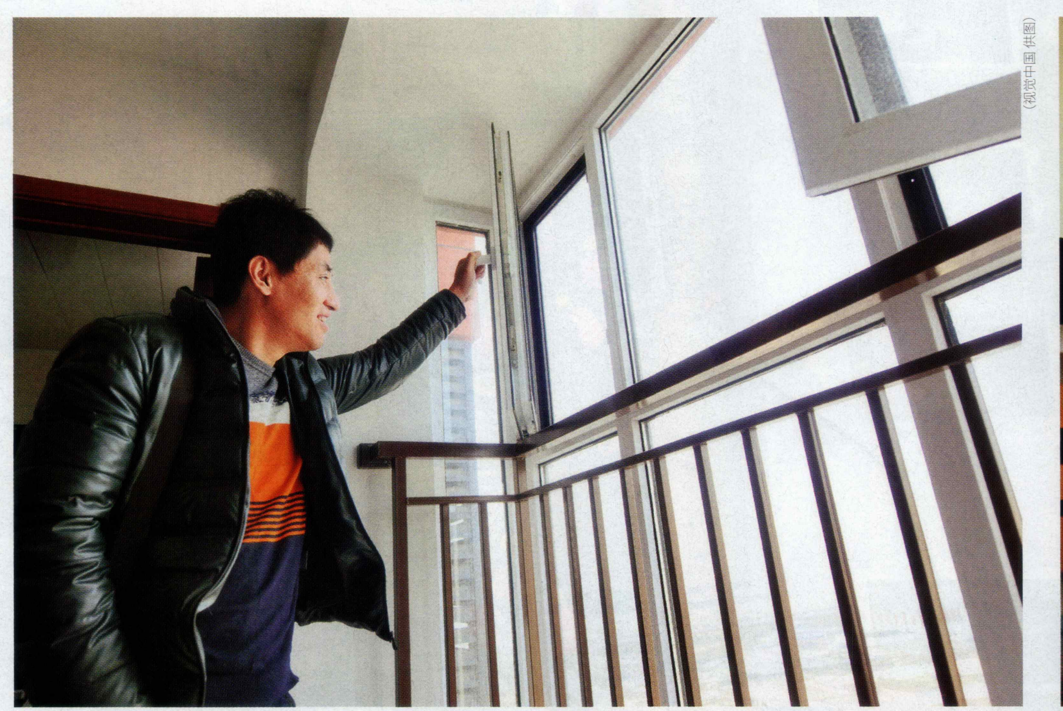
供应过剩，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各个专家估出来的数字相差很大，14亿人可能住不完。”

14亿人住不完，这只是对我国住房过剩的一个粗略描述，如果从更精确的角度来看，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41.76平方米，和70年代末相比，足足增长了超过10倍，已经远远告别了短缺时代。

以家庭住房拥有率来看，我国的住房供应更是充裕，甚至过剩。按照央行在2019年披露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拥有住房1.5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户均拥有住房套数为1.1左右，中国的户均住房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央行数据还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我国的住房拥有率比美国高出了32.3个百分点。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90年代，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民众的住房条件一直处在较低水平，直到90年代末开始的房改，才彻底改变了这一现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2017年3月13日，青岛市李沧区公租房项目发放钥匙，图为市民察看新居

右图：在大城市有一套自己的居所，仍然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状。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住房商品化，让住房首次具有了商品属性，又从2013年开始住房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化之手充分进入房地产市场。这两次重大改革，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极大改善了民众的住房条件，这是我国房改取得的重大成就。

不过，将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房地产过度市场化的负面结果，不仅是让房价快速上涨，房价泡沫越来越大，同时，也在短期之内让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过度膨胀，以至于超过了当前市场的需求。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主要分为刚性需求、改善型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在当前经济背景下，这三大需求都进入一个疲软的状态。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主要依托城镇化。过去二十多年，支撑我国住房需求高速增长的，主要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上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化比例不到30%，经过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之后，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5%。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为房地产市场贡献出了巨大的需求，不过，随着城镇化进入下半场甚至尾声，由此产生的需求也就大幅放缓。

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看，当前房地产的刚需主要来自这一代年轻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就业和生活压力很大，很多人开始奉行“躺平”的生活哲学，对于买房、结婚、生子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太大兴趣。

当代年轻人不愿意买房，一方面是因为买不起，还有很多人是因为不用买。因为这一代年轻人的上一辈人，是过去二十多年积极买房的主力，以人均1.5套的住房拥有率来看，很多家庭不仅为自己买好了房，还为后代提前准备好了住房。很多年轻人即使“躺平”，将来都能继承好几套房子，所以，这一代年轻人，很多根本就没有买房的必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20年国人对于买房的疯狂追捧，其实已经提前部分透支了下一代人的住房需求。

从改善型需求来看，这部分需求其实具有很大的弹性。在经济向好的时候，改善型需求具有



通道，包括一线城市在内，全国房价开始持续下跌，这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房价只涨不跌的信仰。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很多人的投资策略都是买涨不买跌，过去房价上涨的时代，不管房价涨到多高，都会有人愿意进场接盘，但是，一旦房价进入下降通道，即使房价持续回落，敢于进场买房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尤其是我国的租金回报率很低，一线城市的回报率只有1%出头，甚至无法覆盖房贷成本，房产作为投资性资产的回报率就越来越低。一旦房价只涨不跌的光环破灭，住房就失去了投资属性，投资性需求就会迅速消失。

所以，无论是刚性需求、改善型需求，还是投资性需求，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都在明显萎缩。如果从更长远来看，我国的人口结构也会对将来的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

一方面，我国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意味着将来对住房的新增需求也会不断萎缩。最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每年减少100多万，2022年的出生人口跌破了1000万大关，只有956万，并且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在这样的趋势下，将来房地产市场的新增需求还会不断减少。

很大的市场空间，民众对于未来的经济以及自身的收入增长都有很强的信心，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家庭的住房条件。但是，如果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很多人对于自己未来的收入没有信心，也就失去了改善住房的勇气。

甚至，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很多人不仅不对住房升级，甚至还主动降级，也就是将自己现有的住房换成更小的房子，以此套取部分现金，为将来的不时之需提前做好准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改善型住房的需求也会大大萎缩。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还有很大部分来自投资性需求。虽然我国一直强调“房住不炒”，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投资渠道，尤其是股市长期低迷，而房价持续上涨，所以，住房成为民众最靠谱的投资方式，尤其是过去二十多年，房价几乎只涨不跌，更是让民众坚定了投资房产的信仰。我国人均1.5套的住房，就足以看出民众对于投资房产的兴趣，以及投资性房产在我国房产需求当中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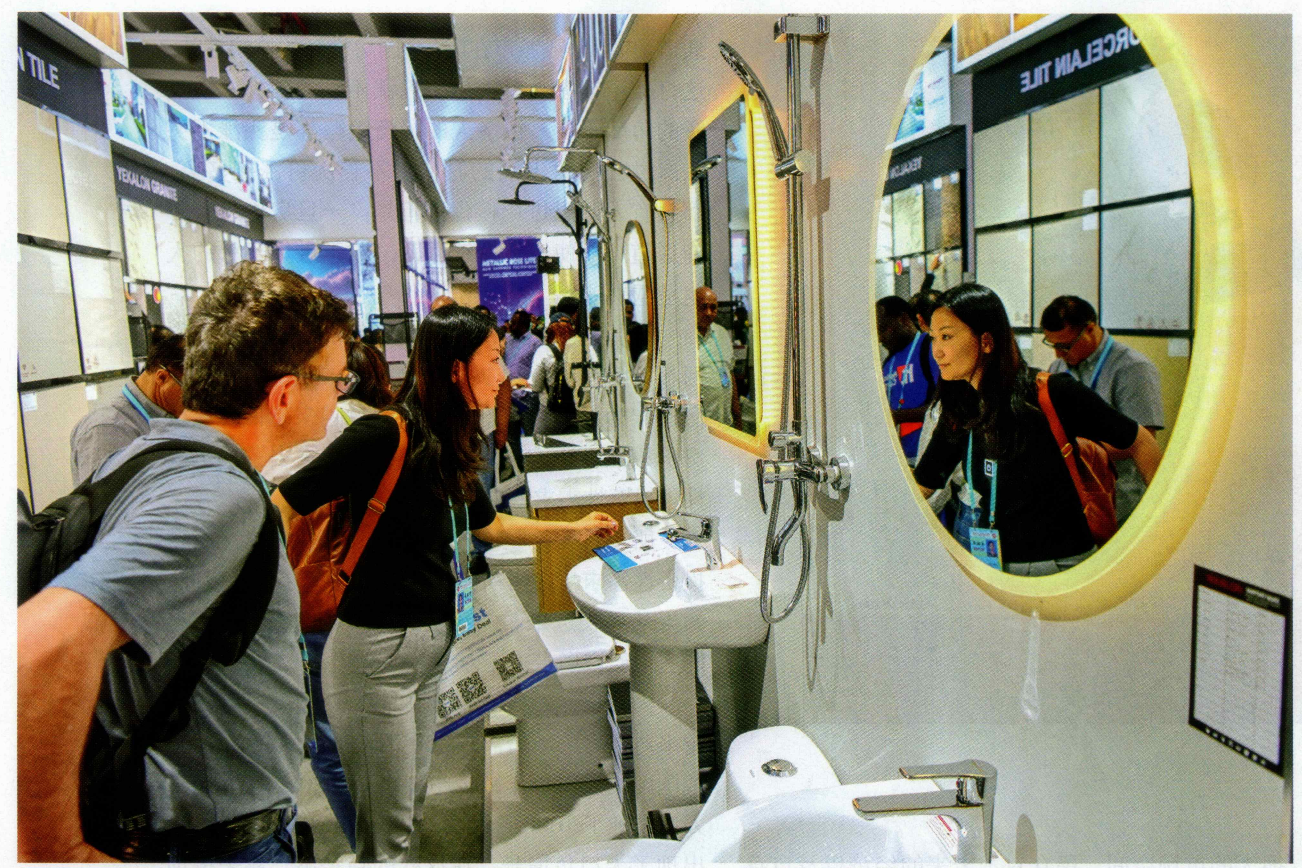
不过，随着最近几年我国楼市开始进入下行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高层首次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做出了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结论。随着房地产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将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

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过去二十多年，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拉动了GDP高速增长，而且，也为地方政府贡献了非常可观的土地财政收入。随着房地产进入过剩时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将面临重大的结构性调整。

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GDP增长历史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GDP增速一度只有7%左右。2003年，我国首次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并且将房地产



如果考虑到房地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中国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度超过 30%，这在全球经济史上都是极高的水平

发展模式从保障房为主改为市场化为主之后，房地产引擎开始轰然启动，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从 2003 年到 2007 年，中国 GDP 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一直到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GDP 增速才跌到 10% 以下。从经济总量来看，在房地产正式被视为经济支柱的前一年，也就是 2002 年，中国 GDP 总量刚刚突破 10 万亿元，到了 2007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高达 25.7 万亿元，5 年时间高速增长了 1.5 倍，房地产的拉动作用可见一斑。

随后几年，中国经济虽然逐渐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房地产的支撑下，中国经济还是保持“七上八下”的较高增速，中国经济总量超过 120 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超过 1.2 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13%，远远超过经合组织国家 5% 的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房地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中国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度超过 30%，这在全球经济历史上都是极高的水平。

所以，当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头号引擎之后，对中国经济就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当房地产行业蓬勃向上时，就可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一旦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对于中国经济开始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曾经的支柱产业，现在开始反过来成为中国经济的拖累。

随着房地产进入供过于求的新时代，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房子开始卖不动了。2022 年以来，国内楼市的销售迅速冰封，2022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下降 24.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6.7%。在去年大跌的基础上，今年前 9 个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继续同比下降7.5%。随着房子开始滞销，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展开。

当房子卖不动之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开发商开始减少房地产投资规模。以房地产投资增速这个最直接的指标来看，2003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很多年都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最近几年开始加速放缓，在疫情前的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还保持了10%的增速，2020年的投资增速下降到7%，2021年的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到4.4%，创下5年新低。到了202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更是同比负增长10%。今年前9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负增长9.1%。

作为中国经济的投资引擎，房地产投资下滑，导致我国的整体投资增速迅速萎缩，2023年上半年，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仅有3.8%，在房地产投资负增长之后，主要靠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勉力支撑。

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最终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今年第三季度，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到只有22%，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投资引擎一向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最重要手段，在中国经济面临困难之际，往往是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而这一次房地产导致投资引擎熄火，也就使得这一轮中国经济脱困面临更大的挑战。

房子卖不动之后，开发商从加杠杆转入减杠杆的阶段，除了投资规模负增长，同时，在土地市场上拿地越来越少，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曾经火爆的土地市场迅速降温，很多地方政府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土地财政压力。

202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同比减少三成，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再度下滑21%，这给很多地方政府都将带来巨大挑战。过去很多年，随着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土地出让收入，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40%，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比如江苏、浙江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山东、福建等地的依赖度也接近50%。在如此高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面前，一旦土地收入每年以20%、30%的速度下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就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我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积累了较高的债务水平，地方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之一，随着土地收入减少，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有可能会浮出水面。

过去很多年，国内一直试图找到能够替代土地财政的新财源，比如房地产税，但是，考虑到房地产税推出之后，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压力，我国房地产税的进度一直是停停走走。今年9月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立法规划，将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等提请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审议，其中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并未在列。这就意味着，房地产税立法再一次按下了暂停键。

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市场的收入越来越少，房地产税推出又遥遥无期，部分负债率很高的地方政府，不排除会有债务爆雷的可能性。公开资料显示，我国个别省份的债务率超过100%，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部分城市的负债率甚至超过400%。技术上而言，有些地方政府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地步。今年4月份，贵州省有关部门就公开发文表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今年10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央财政增发1万亿国债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1万亿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还本付息由中央承担，不需要地方政府偿还。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在土地财政萎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开始需要更多的支持。

房地产持续下行，还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冲击。尤其是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爆雷之后，相关银行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坏账风险。今年7月份，央行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因为部分开发企业出现困难，不良率有所上升，但与银行贷款总量相比

当房子卖不动之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开发商开始减少房地产投资规模。

很小”。央行还表示,“部分房企长期积累的风险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消化”。房地产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灰犀牛,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这头灰犀牛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力也会随之上升。

房地产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虽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但是从更长远来看,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在经过了房地产冲击带来的阵痛之后,中国经济有可能会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经济结构更加合理,走上一条更具持续性的发展之路。

过去二十多年,房地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红利,对GDP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度超过三成,如此高的比例其实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模式。从全球发达国家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成为真正发达国家的,更多的还是依靠科技创新,而那些过度发展房地产业的,无一例外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一个大国如果不能靠科技创新,而是长期依靠钢筋水泥的模式,不可能成为真正全球领先的大国。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反而有可能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质的飞跃。

过去二十多年,房地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除了自身投资规模巨大,还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一起蓬勃发展。但是随着房地产体量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开始越来越突出。

如果说过去是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现在更多是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比如房地产拉动土地价格、住房、房租等相关价格飞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存空间,我国很多制造业原本利润微薄,在房地产挤压之下生存空间更是越来越小。

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和财富效应,其实也起到了一个极其负面的示范效应,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产业资金不甘心从事利润微薄的制造业,转而盖房子赚快钱,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很多创新产业。居民资金也将炒房视为致富捷径,将大量资金投入住房市场,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其实让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得越来越畸形。

房价大涨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现在很多年轻人夫妻购买一套住房,需要掏空2个家庭的6个钱包,才能勉强支付首付,即使买下房之后,每个月的房贷支出,也让每个月的工资所剩无几。一套房子不仅掏空了几代人过去的积蓄,还透支了年轻人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当一个家庭几乎穷尽所有收入来支撑一套住房时,基本上没有余力进行其他消费。中国经济的消费引擎,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所压制。

现在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全社会对于房地产的热情终于开始降温,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中国经济其实是一件好事,只有房地产降温,其他产业才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当中国的新能源、芯片等高科技产业实现突围,中国经济才可能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而房地产业永远不可能带领中国经济走到这样的高度。

对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

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直接的冲击在于,家庭资产会因为房价下跌而缩水,而更长远的影响在于,中国普通家庭的资产配置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在房价飙涨的刺激下,住房成为中国民众最重要的资产配置。央行曾经发布过一份《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当时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接近六成,房子对中国民众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经过了房地产冲击带来的阵痛之后,中国经济有可能会摆脱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经济结构更加合理。



上图：日本地产泡沫主要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六大都市，其地价下跌远高于小城市

下图：美国住户总体的住房拥有率为63.7%

中国民众对房子的偏爱，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央行的调查报告还表示，“和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从家庭户均拥有套数来看，我国也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家庭平均拥有1.5套住房，美国、日本等家庭住房套数为1.1套左右。

家庭资产过于集中在住房资产上，由此带来的风险就是，如果房价大幅下跌，很多普通家庭就会暴露在风险之中。大多数家庭购买住房，都是通过银行借贷来完成，房贷成为中国家庭最大的债务，占家庭总负债的比例高达76%。对于那些首付比例低、房贷杠杆高的家庭，如果房价大幅下跌，就有可能面临负资产的风险。当年日本房价下跌，很多普通家庭的住房成为负资产后，不得不放弃住房，部分民众只能流落街头甚至自杀，房价暴跌给当年的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其惨痛的经历。

中国房价如果大幅下跌，部分民众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风险。央行就曾经在调查报告中表示，“部分家庭债务风险相对较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低资产家庭资不抵债，违约风险高；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债务风险较高；老年群体投资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金融产品较多，风险较大；刚需型房贷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

中国家庭对住房资产的超配，在房地产进入过剩阶段之后，随着房价不再飙涨，甚至持续下跌，其中的风险自然是可想而知，尤其是大部分居民都用了较多的房贷买房，房贷杠杆会将房价的跌幅进一步放大。从居民角度来看，由此带来的反应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售房产，不仅是为了套现，更主要是为了尽量减少房贷杠杆，避免中产返贫。

一个最直观的指标就是，二手房市场的挂牌量变得越来越多。以北京来看，去年11月份，北京的二手房挂牌量超过10万套，当时就引发了市场的一片惊呼，认为北京的二手房房东们开始大规模套现了。到了今年10月份，北京的二手房挂牌量达到了17万套，一年时间增长了70%。背后折射出的含义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减配住房资产，住房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小。

随着美国股市持续走牛，最终改变了美国人的资产配置习惯，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金融资产。

以美国来看，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房产在美国家庭资产的配置中，也曾经占据了超过40%的较高比重，不过，随着美国股市持续走牛，最终改变了美国人的资产配置习惯，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金融资产。现在美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房产占比只有20%多，而金融资产占比超过了70%。

对于中国家庭而言，住房资产占据家庭总资产的60%，对于房产如此超高比例的配置，显然已经迎来拐点，未来只会一步步下降。但对中国家庭而言，如果减配房产，套现出来的资金又该配置到何处？这是当前普通民众资产配置的最大挑战。

当年美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从房产逐渐转移到金融资产，背后的支撑主要在于美国的股市给力，能够持续走出长期牛市，因此，吸引了美国人将大量资金投向权益资产，购买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给美国家庭带来了长期丰厚回报，这种可观的回报率，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美国民众将资金继续投向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资产占美国家庭资产配置的比重不断提高，超过70%。

反观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房产占比高达六成，而金融资产占比只有20%。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回报率导致了资产配置的差异。中国房价持续飙涨，超高的回报自然吸引了最多的资金配置，反之，中国股市“熊长牛短”，最近甚至再度跌破3000点，能够在股市获得回报的普通民众少之又少，在这样的回报率之下，愿意大比例配置金融资产的民众自然不多。

过去二十多年，住房价格飙涨虽然带来了极大的泡沫，但至少让很多人拥有了一条资产配置的路径和方式，而现在，随着住房回报率下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果不能

再配置房产了，家庭资产还能配置什么呢？

如果中国的股市能够走出长期牛市，股市无疑会成为居民最核心的资产配置，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但可惜的是，A股市场始终难以承载起人们的期待，无法帮助普通民众实现财富增值。

所以，当楼市和股市都不具有良好的投资回报率，普通民众资产配置的选择空间就越来越小。

前几年，银行理财受到很多普通人的追捧，成为低风险理财的重要选择。不过，随着银行理财打破保本保收益之后，银行理财波动性明显加大，很多银行理财动辄出现大面积亏损，这也让银行理财的吸引力越来越低。今年上半年，全国银行理财募集资金28万亿元，同比大幅下降了42%。

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将来的养老未雨绸缪，所以，将更多资金配置在养老业务上，应该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去年11月，我国正式推出个人养老金账户，鼓励民众提高个人养老的积极性，但是，由于股市等相关市场持续下跌，个人养老基金表现并不尽如人意，150多只专门针对个人养老的基金产品，九成左右都陷入亏损之中。偶尔有少数几个产品还能实现正收益的，累计回报率也只有3%左右。

这样的业绩回报，也让很多人对个人养老业务望而却步。人社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3038万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其中只有900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实际缴费人数仅为参加人数的31.37%。

在普通民众最主要的几种投资理财方式中，稳定增长的只有银行存款。2022年，全国居民的新增人民币存款达到创纪录的18万亿元，比2021年大幅增长了8成。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增长，住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在2022年高增长的基础上，比去年同期继续增长了15%。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稳增长的目的，我国的存款利率持续下降，利率降到了70多年的历史新低，3年和5年期的存款利率也只有2.5%左右，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阻挡人们将钱存进银行的热情。

在以前楼市火爆的年份，这样的情形难以想象。比如2016年，也就是房价暴涨的那一年，全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4.88万亿元，同比少增924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只有5.16万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在房价大涨的年代，居民都在尽可能放大杠杆买房，将钱存进银行，是当年是极其保守的资产配置。

但是随着现在房地产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房价从暴涨转入持续下跌，股市也是长期萎靡不振，曾经被很多人看不上眼的银行存款，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插图：范薇）

专访陆挺：中国经济变革时刻，策略与机会

主笔·杨璐

这一年，很多人都在克服困难，为生活重回正轨、经济的恢复而努力工作。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三季度宏观数据出现稳步向好的态势，GDP同比增长4.9%，前三季度累计增长5.2%，与年初设定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基本吻合。但隐忧仍在。房地产和民间投资的数据在下滑，债务风险依旧存在。拖累经济数据的部分，指向今年以来比较受到关注的话题：房地产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遇到的困难？“企业信心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减弱”的现象是否会在中国发生？我们距离经济复苏还有多远？我们专访了野村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陆挺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华尔街的美资投行美林、中资的华泰证券和日资的野村证券担任要职。他是香港中国金融协会的副主席，2010年和2011年被彭博通讯社评为预测最准确的中国经济学家。

我最近旁听了陆挺的一场演讲，观众席上的听众是各地的企业家或者创业者，他们的提问是关于未来的经济与机会。他告诉大家，经济转型时代会有一批新企业崛起。对标发达国家，即便是小众或者非常垂直细分的领域走到顶尖，依旧是很大的市场。中国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用“躺平”。

本轮经济复苏有特殊性

三联生活周刊：谈论今年的经济形势，有两句高频出现的话。一个是很多专家在不同场合呼吁要“降低预期”。政府定的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也确实比一些专家预计的要低。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对普通人来讲，“预期”和“恢复”都是抽象的词汇。大家更直观的感受是工作好不好找、工资怎么样、房价怎么样。我们专访的叙述起点，是想请你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一讲，为什么会有“降低预期”这样的说法出现，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



9月22日，河南郑州举办的一场大学毕业生招聘会


中铁建工
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15~18w


野村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陆挺：去年年底，行业内确实有不少人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是很高的。当时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是疫情结束，会有很多报复性消费；第二是过去几年居民累积了不少超额储蓄；第三，完全从计算的角度讲，2020 年 GDP 增速是 2.3%，2021 年的时候 GDP 增速有 8.4%。很多人认为今年的增速最起码在 7% 左右。最后，中央政府设定的 GDP 增长目标是 5% 左右，是低于很多人一开始的预测的。

我在年初的时候就曾建议将今年 GDP 的增速目标设定在 5% 左右。我当时提了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因素是疫情反复可能会冲击经济。其他几个因素基本上后来都发生了。首先是房地产，今年房地产行业的问题还是会很严重。第二个是出口增速会明显下滑。这里一个是内需因素，一个是外需因素。第三个，我讲到也要降低疫后报复性消费反弹的预期。年初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疫情三年中国居民积累了很多超额储蓄，我认为很多人的计算是有问题的。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居民的超额储蓄水平，原因在于把银行存款上升都当作超额储蓄，其实银行存款只是居民配置其金融资源的途径之一。居民不买理财产品的钱回到银行存款上，不代表就是储蓄上升。第四是大家可能低估了过去几年收入受到的影响。中产阶级和中低收入人群的超额储蓄并没有怎么上升，可能还有人下降。内需很大程度是要靠他们来拉动的。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富效应。疫情几年，很多人的财富是往下降的。比如说房地产的下跌，股市并没有怎么涨。因为房地产行业的下滑，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金融行业的降薪等。甚至对高净值人士来讲，信托受房地产影响很大。

最后一个原因是关于未来预期的。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大家对未来更谨慎了，预防性储蓄会上升。大家不要高估消费反弹的力度，事实上也就是回到 2019 年的水平，而且这里还有报复性反弹的一面。从客单价比较高的耐用品方面看，

包括手机，消费行为就谨慎了。

三联生活周刊：疫后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说明我们“恢复”了？

陆挺：从GDP统计的角度来讲，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出现年度GDP总量萎缩的情况。因此从GDP的绝对量来看，我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恢复”。但换个口径，谈“恢复”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假定没有疫情，我们这几年中每年应该平均增长多少，我们现在距离那根趋势线还有多远。疫情前我国的GDP增速在6.0%左右。2020～2022年的疫情三年中，我国的GDP增速分别是2.2%、8.4%和3.0%，这个增速肯定是低于趋势线的。如果今年GDP增速最后是5.0%左右的话，也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每个人对经济的恢复程度会有相当不同的感受。我认为第一个标准是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在4%～5%之间。第二个标准是不再有某个特别大的板块出现明显的萎缩。比方说，房地产和出口。如果这两大板块还属于萎缩的时候，我觉得经济不能算真正企稳。如果让我来评判经济是否企稳，我就会首先观察波动比较大的板块是否停止萎缩。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面对经济下行很容易回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2015年股灾的经历，在短暂的困难之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好日子就回来了。这一次的经济恢复，跟前面两次的情况相比，节奏是怎么样的？

陆挺：本轮复苏，有三个方面是有显著区别的。第一是外部环境不一样了。前两轮复苏都是和全球经济的反弹绑定在一起的。受加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美欧经济增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下滑。我国今年年初开始经济复苏的时候，全球特别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已经处于下行通道之中。外需疲软必然会抑制今年的经济复苏力度。

不一样的外部环境还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要客观地看到，和前面两次复苏相比，这次面临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科技禁运，影响我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内主体的制造业投资。而且从全球供应链来讲，美国通过立法，鼓励跨国公司转移产能到美国及其友好国家，这也会影响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新增投资。三是地缘政治问题对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信心有一定冲击，间接导致他们在边际上降低境内的投资和消费。

第二个非常大的不一样，是房地产。2008年和2015年以后，有那么几年房地产是高速增长的，现在的话，不大可能了。我们现在能够期待的，是房地产在触底之后略有反弹，维持一个中低速的增长。从前不存在一个严重的“保交房”问题，现在，我们得先按部就班把有些关键问题处理好，才能够等来房地产真正的企稳和复苏。

本轮复苏和以往复苏第三个差别是居民消费。正面来讲，之前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和供给同时释放，对宏观经济有一个脉冲效果。但是，脉冲效应是很难持久的。除了疫情和房地产之外，教育培训、平台经济等行业也经历了巨幅调整。

房地产是经济恢复的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你其实强调了房地产在本轮经济复苏中的重要性。对普通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疑惑，我们讲了好几年“房住不炒”。这可能给很多人感觉房地产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我们为什么又重提“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陆挺：房地产肯定是一个支柱产业。我觉得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房地产都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衣食住行，“住”在每个人的支出中占据非常大的一块。即使发达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存量房，房地产还都是一个重要的板块。只是说，讲“支柱”不一定说是比其他行业遥遥领先，比如，汽车也是一个支柱行业。它们都是我们消费支出里比较重要的板块。

在过去20年历史上，房地产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房地产板块对我国GDP的贡献在四分之一左右，而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可能远超四分之一。它占整个中国公共财政的近40%，居民财富的近80%。我们之所以重视“房住不炒”，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太重要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曾经有若干年，尤其是2015年到2018年，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太快了。大家都有点盲目，比方说认为房价可能是永远上升的，很多房地产企业跑到外面去借美元债，而这些企业根本没有境外的业务。实际上，它们都是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扭曲。今天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扭曲的一个后果。所以，一定的纠偏是有必要的。

但是，即使房地产行业出现这些扭曲，当我们开始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指望在短短两三年时间解决问题。宏观经济是一个整体，我们想达成的产业结构转换的目的，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各种条件的成熟。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讲到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人口流出、经济不怎么发达的中小城市却建了大量的房子。房地产宽松政策陆续出台之后，一线城市的楼市有提振，低线城市的提振作用并不明显。这种房地产和人口流动、经济发展趋势的错配，你怎么看？

陆挺：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房地产政策方向上的调整。首先是大城市一定程度取消了限购。

第二个方面更关键，就是土地供给制度的改革。今年发改委提了好几次“优化供地制度”，这个非常必要。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对大城市供地非常严格，结果大城市的供给是不够的，房价太贵。我提过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根据户籍人口、社保人口等的变化来决定供地的变化。在农村，自愿基础上推行宅基地改革。农民工如果在城市落户，可仍保留宅基地产权，也有一定权利处置宅基地，尤其是用宅基地复耕，并向落户城市转让因为复耕而获得的用地指标。

第三，大城市是不是一定要设置人口上限？可能没有太多必要。从发达国家看到的普遍经验，城市化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必然趋势。去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5.2%，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还有20%～30%的差距，而且城市户籍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47%左右，外出农民工约1.7亿，其家属人口为2.2亿，扣除在工作居住地已经拥有城镇住房的4%的农民工人口，在城市里的实际住房需求约为1亿套。

客观上讲，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回老家的概率越来越小。除此之外，中国现在每年毕业1000万大学生，这些未来的白领阶层有很强的流动性，很可能随着产业迁徙，形成人口聚集和住房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提过保障房的建议，就是保障房建设用地指标尽量向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和城市群倾斜。我们不能大城市里保障房稀缺，然后在一些小城市建很多保障房。

我想经济和房地产稳定下来之后，中国一线城市和有人口流入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大家对中国经济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实事求是地说，真正将来有问题的是小城市的房地产。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阻止大城市发展。

中国经济与日本的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疫情三年，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企业信心也不足，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情况，日本曾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是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提出的，最近在中国引起了很多讨论。你认为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情况？

陆挺：真正理解辜朝明的观点，需要对宏观经济学有基本的了解。我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文章即将发表在《北大金融评论》上，那个讲得更清楚和详细。简单说，辜朝明通过对日本企业近距离观察发现，日本泡沫破灭之后其金融机构相对稳定，放贷能力没有明显减弱。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的日本企业也能轻易借到资金，利率不断走低。但是，企业行为发生了变化，其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生存最大化，借款意愿急剧下降，企业通过积极还款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对单个企业来讲是理性的还款行为，但变成大量企业的共同行动，则企业部门从原来的净借款方变成净储蓄方。当经济主体中缺乏借款方时，储蓄没有出



上图：10月12日，人们在山东青州一处商品房售楼处观看沙盘

下图：客观上讲，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回老家的概率越来越小

路，不能转化为先前的投资需求，总需求就会下降，并造成连锁反应。

辜朝明的理论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中日差别巨大，不能直接套用。差别之一在于资产受损的程度。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遭遇股市和土地市场的巨幅下跌。日经指数从1989年的高点到2002年的低点一共下跌78%。日本全国土地价格在1991年到2005年期间共下跌76%。过去两年中国股指相对平稳，中国房价下跌的幅度没有恶劣到日本90年代的情况。

差别之二在于受损资产的类别和区域。日本地产泡沫主要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六大都市，其地价下跌远高于小城市。就地产类别而言，商业泡沫最大，其次是工业，住宅泡沫相对较小。从高点到低点，六大都市的商业、工业和住宅土地价格分别下跌87%、73%和66%。我国的情况是倒过来的，因为2015年到2018年在低线城市大规模推进货币化棚改，我国的房地产泡沫主要在低线城市的住宅地产，其土地和房价下跌幅度远高于一、二线城市。我国工业用地一般是地方政府通过低价用来招商引资，价格波动极小。

差别之三是资产受损方的还款意愿和能力。日本众多企业在80年代末卷入股市和地产泡沫。地产方面，企业的投资当然是以商业和工业地产为主，地产泡沫破灭时资产受损严重。这些企业虽然资产受损，但在国际上其产品颇有竞争力。

我国房地产问题对三类机构和人群冲击最大：一是开发商，尤其是过去十年在低线城市扩张的开发商；二是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其收储的土地价格下跌，流动性剧降；三是拥有房产的居民，尤其是在高点购买低线城市房产的家庭。中国企业没有深度参与房地产投机，租赁的工业用地价格平稳，并不存在因为房地产市场萎缩而带来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资产受损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因为软预算约束，没有强烈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对于受到影响的房地产企业来讲，目前面对的是在多大范围内违约的问题，而非降低负债的问题。对居民来讲，过去一年多确实出现提前还房贷的情况，但这主要是存量房按揭贷款利率大幅高于市场贷款利率导致的，其目的是省钱而不是修复资产负债表。

这些差别实质上是我国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的深层次差异，了解它们非常关键。首先是两国人均GDP不同。日本在90年代人均GDP是美国的106%，而2022年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日本在1990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77%，且人口高度集中于大都市，而中国城市化率目前是64%，城镇户籍人口只有47%左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跟日本相比，相对低。前面我提到过，房地产泡沫影响的群体也不一样。日本是大都市商业用地存在泡沫，受到冲击的是企业。中国主要是低线城市的住宅用地存在泡沫。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的意思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不是讨论目前我国经济复苏和未来一段时间形势最关键的问题。你觉得中国经济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呢？

陆挺：我觉得首先要“止血”，未来几个季度要把保交房的事情做好。无论是对出问题的金融机构，还是那些已经有很强金融属性负债巨大的开发商，要适时介入。从法理上讲，作为预售资格和预收款管理的监管机构，政府对开发商是否能够交房是承担一定责任的。从增加中央政府支出的角度，把资金用到保交房，既能托住总需求，又能托住居民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还能保障社会稳定。

第二是“输氧”。保障地方政府的基本运作，加快摸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本付息情况，及时纾困，但必须同时加强约束机制，确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要出现大面积违约事件。

第三是“激活”。加速已开工的基建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是特别能巩固拉动经济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人口聚集，能够带来服务业的发展。所以，现在很多专家在呼吁增加政府支出。这里面要说明的是，中央政府支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支出在人口净流入的重点城市。我们是在每个小城市都修地铁、博物馆、体育馆，还是在大城市修地铁，盖博物馆、体育馆、剧场，才能确保这些建设的资源利用率高呢？

第四，最关键的是抓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


（插图：老牛）

2016 年下半年，银行新增贷款一度超过 50% 是房地产行业的，对比今年一季度仅有 6%。没有房地产的复苏，会拖累整个中国经济的企稳复苏。有些观点认为，房地产维持在“L 形”走势就行，也就是下滑后稳住。但是，房地产具有复杂性，仅仅依靠自然稳定实现“L 形”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有政策的干预，否则很可能导致房地产、地方政府和相关的多个产业陷入螺旋式下滑。

如果大家的信心完全恢复，不仅仅是今年，明年和后年也会持续复苏。比如，刚才讲到房地产放松限购、限价、限售等，供给制度应该变化等，其实是在承认市场的作用。土地供给、政府财政支出能巩固跟这些因素挂钩，让市场、大家的自由选择来决定，经济能够做得比好，也给人信心。还有比如说，开放也非常关键，让国际社会看到支持经济的政策，包括对企业、开放的政策，通过政策给大家建立信心，让经济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经济转型期，我们的生活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是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从你的研究和观察来看，针对当前的形势，中国经济复苏和未来发展有哪些优势呢？

陆挺：我们很多优势还在。只要我们各方面都是稳定的，我们面临的机遇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比如，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些产业上异军突起，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政府重视。我们政府的治理工作、社会动员能力非常强。第二是中国一旦走上正循环，可以爆发出很大的潜力。因为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土地面积，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很多国家难以相比的。我们的储蓄率也很高。随着我们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崛起，一些产业能够快速发展。第三，中国的制造业，在高端制造以外的很多方面，我们是全球最完善的国家。第四，我

们有世界顶级的互联网络。第五，我们现在一年毕业1000万以上的大学生。

跨国公司想要转移，确实没那么容易。除了中国，不可能有这样完善高效的基础设施、勤奋的劳动人民、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

这里还要说一句，当我们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GDP增速在4%～5%，还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这个过程中间，经济应该形成一个好的结构。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个转型期，但实际上也是我们主动为之的。我曾经提出过中国正在面临“沃尔克时刻”。它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来压制通胀，虽然美国经济在1980年到1982年陷入衰退，但这也为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经济的长期扩张铺平了道路。我把中国的高房价比作沃尔克当年的通货膨胀，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巨大的投入，过度的资源消耗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政府是有意地刺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意地将资源转移到比如说高科技行业中去。我们现在愿意以降低一定的经济增速为代价实现长期的发展目标。这是战略上审慎思考的结果，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做能很好地降低它的负面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在演讲中提到过，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人类历史罕见的。对普通人来讲，却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大家看待经济形势、做人生和家庭规划等都是基于过去30年的经验。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百年大变局的时刻。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你觉得可能哪些方面的变化，我们是要关注的？

陆挺：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我想到几点。第一，确实大家在规划未来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一些因素。从国家来讲，要考虑GDP增长速度。从家庭和个人来讲，要考虑家庭和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未来可能都会有减缓。大家要接受现实，做好合理的规划。

第二个方面，大家要考虑到财富变化。过去二十多年，对一部分比较幸运的、先富起来的人讲，很大程度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实现了人生财富的积累。相当一部分城市，房价可能出现下跌，最起码很难跑赢通胀。特大城市、一线城市，房价有可能保持一定的稳定，但非核心区可能房价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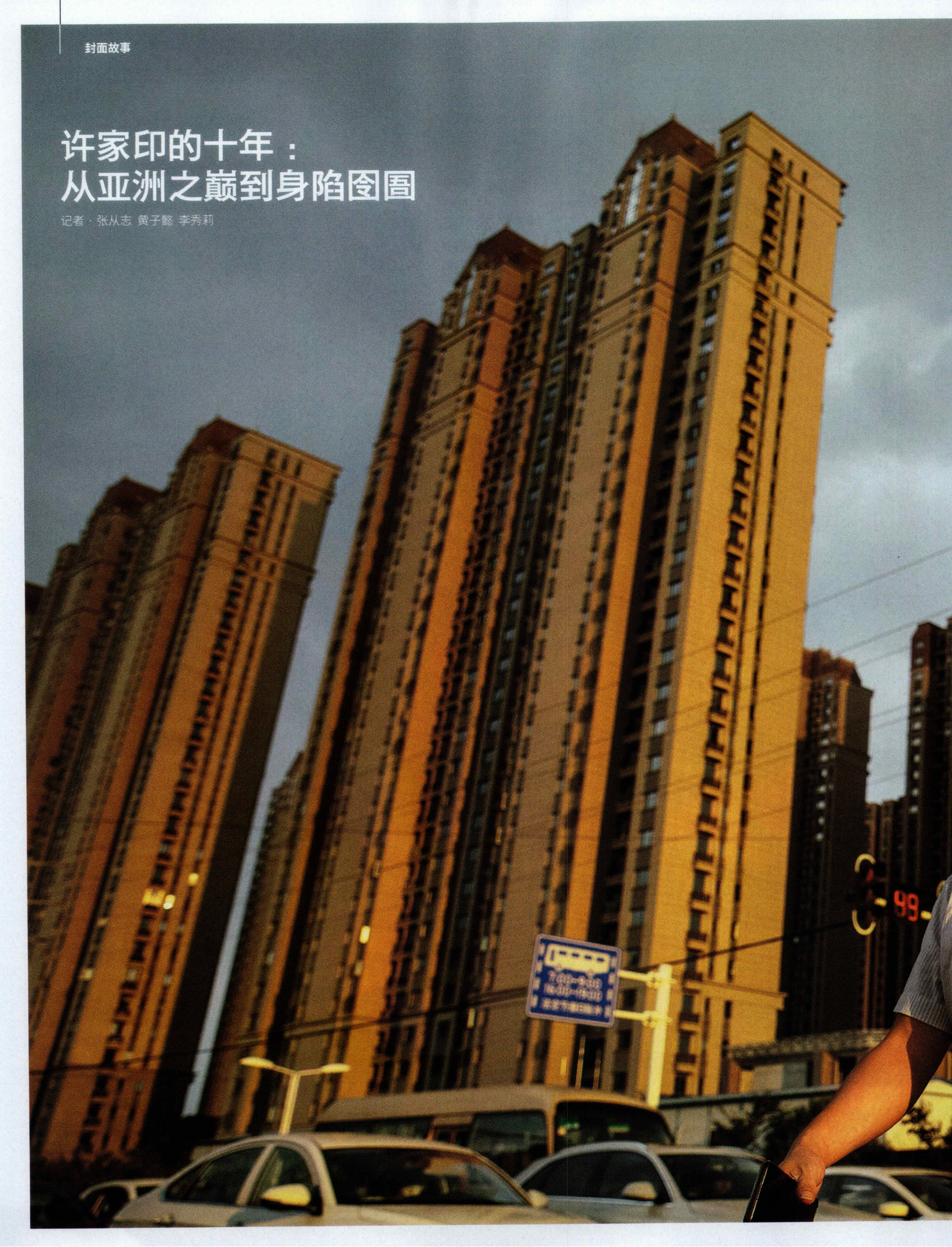
第三个方面，区域经济的重构。这个可能跟年轻人选择在哪里发展有关系。过去20年我们取得的一个辉煌的成就，就是很多地方都发展了高铁。这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整个中国包括中小城市，也经历了一轮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快速发展。从现在看，未来将会迎来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提出，中心城市群将会和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这几年，因为种种因素可能没有快速推进。但是，这一次房地产深刻调整之后，比如说通过对城中村的改造，和其他方面的改造，本身基础设施比较好、治理水平比较高、人口流入、产业发展相对健康的城市，将会迎来新机会。

第四个方面涉及对外开放。过去二十多年，很多家庭都经历了中国高速推进开放的过程。这个开放是双向的。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改变。我们跟外界的交流，可能会相应减少。我想，从个人规划来讲，海外旅游、海外求学的难度都在上升。这里面有人民币币值的因素，有海外通胀的因素，一些因素叠加起来，海外旅游和求学的成本会更高。我认为，眼光放长远来看，海外留学的规划还是会有相对比较高的回报。因为，中国的开放，还是我们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个方面，再回头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日本90年代后期、本世纪初十几年的情况，就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水平明显下行，甚至中产阶级群体可能会萎缩。中产阶级在做消费规划的时候会精打细算，更审慎。经济结构转型的时代，会有一批新的企业崛起。比如优衣库就抓住了一个新时代，日本消费者无所谓非得穿特别名贵的衣服，但一定质量比较好。它做成了一个超级企业。所以，从企业的角度讲，应该紧紧抓住趋势性的变化，更多地推出价廉物美的产品。

许家印的十年：从亚洲之巅到身陷囹圄

记者 · 张从志 黄子懿 李秀莉





2021 年 9 月 24 日，一名男子走过恒大常青花园小区，这是恒大在武汉打造的巨型社区之一

2023 年 9 月，市场传言被证实，许家印被抓了。过去两年，恒大集团（以下简称恒大）扭扭捏捏的自救行动也彻底宣告失败。然而，其庞大债务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并未消除，无数的投资者、购房人和供应商仍然在为挽回损失而奔走。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许家印到底是如何塑造出恒大这头巨兽的？从巅峰坠落至深渊的最后这十年里，他做了什么？为何历次债务危机，并没有遏制恒大的扩张冲动？

恒大没钱了

2013 年 11 月 9 日晚，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5 万多人的见证下，广州恒大队 1 比 1 战平首尔 FC 队，以两回合客场进球多的优势夺得亚冠冠军，荣登亚洲之巅。看台上，有球迷打出横幅："恒大，您是中国的骄傲。家印，您是球迷的上帝。"第二天的新闻头条，都是恒大为国争光的字眼，球场上的这些细节也为人津津乐道。许家印这个名字，开始灌入那些即使不看球的人的耳朵里。

这时候，离恒大入主广州队其实才过去 3 年。3 年前，对足球一窍不通的许家印以 1 亿元的价格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将其更名为广州恒大。房地产老板玩足球，在当时算不上新鲜，但许家印一来就掷下豪言，说广州恒大 3 ～ 5 年内要问鼎亚冠。人们知道，他买下的这支球队，刚刚从假球风波的阴影里走出，从中甲升上中超，还只是一支联赛"升班马"，要拿亚冠，无异于痴人说梦。但许老板是认真的，其后几年，俱乐部重金引援，招揽了一大批国际球星和名帅，在中国足坛刮起了一股旋风，人们称为"金元足球"。从 2011 年开始，广州恒大在中超创造了 7 连冠的成绩，并在 2013 年和 2015 年两夺亚冠。中国足球进入了恒大王朝。

那几年，许家印的个人财富、声望、荣誉，亦达至巅峰。恒大的地产生意狂飙猛进，土地储备、销售收入、面积等数据全面碾压对手，成为世界 500 强，把许家印送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头衔不断加身。在新闻里，他是中国慈善家，各处捐资办学、救灾救险。他还深入参与到扶贫攻坚中，耗资百亿帮助贵州的大方县整体脱贫。许家印的面向变得多元起来，似乎逐渐摆脱了过去人们印象中的那个一掷千金的房地产大亨形象。

许家印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他的一举一动成为关注焦点。恒大足球大杀四方的时候，过去从不看球的许家印开始经常出现在天河体育场的贵宾席上，旁边陪着的有政商各界名流，很多生意据说就是在球场上谈成的。直到 2020 年，恒大债务爆雷的前一年，许家印还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一个可容纳 10 万人的专业级恒大足球场，他甚至为这个项目"亲自构思概念，亲自修改方案，亲自规划商业及业态"，最终拿出了一个设计方案。但因为其像一朵金色的大莲花，被众多网友吐槽又"土"又"丑"，审美畸形，戏称为"番金莲"。人们不知道这些评论有没有传到许家印的耳朵里。不管怎样，这一年的 4 月，位于广州南站附近的恒大足球场在一场盛大的庆典之后正式动工，计划于 2022 年竣工。只是，它没等来这一天。

2021 年 9 月初，恒大集团旗下的投资理财公司恒大财富暂停部分兑付，后相继有人曝出，恒大的部分高管前几个月提前赎回了理财产品。9 月 10 日，许家印紧急召开"恒大财富专题会"，承诺让提前赎回的高管返还资金。但那天，在恒大深圳总部卓越后海中心的楼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一起抗议，要求赎回理财产品，并高喊："许家印，还我血汗钱！"

恒大没钱了——这像是个神经信号，瞬间击垮了这头巨兽。紧接着，恒大旗下的上市公司股价几乎崩盘，境外、境内债务也陆续违约，然后是恒大在各地的项目停摆，即便盖好的房子，也没人敢买了。许家印亲自设计的恒大足球场项目的施工也停了下来。后来，恒大把土地交还给广州城投，"金莲花"的设计方案被一个新方案所取代。相比那些无人接盘的项目，这个结局还算不错。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恒大在全国有数百个项目、超过 162 万套房子烂尾，数百万业主陷入无望的挣扎之中。

江苏江阴的鞠红伟是冲着孩子上学方便买的恒大的楼盘，交完首付两三个月，恒大爆雷。如





上图：2015年12月13日，在日本大阪长居体育场举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广州恒大队以亚冠冠军身份迎战墨西哥美洲队，图为远征球迷到现场为恒大助威

下图：2017年10月22日，广州恒大夺得中超“七连冠”，在赛后的夺冠庆典上，主帅斯科拉里与许家印合影



2021 年，武汉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一景

今孩子已经升学，他每天要开车往返四五十公里接送孩子，“小朋友早晨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晚上也要晚睡半个小时”。宋达在 2021 年 1 月花 170 多万买了昆明恒大城的一套复式住宅，恒大出事后，项目停工。现在，他和新婚的妻子住在一间 30 多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被每个月 9000 多元的月供压得喘不过气来。30 多岁的陈卫强在武汉光谷的一家电子厂里打工，2019 年，他在武汉恒大时代新城买了一套房子，首付是农村的父母凑来的，贷款 59 万元，准备用来结婚。房子烂尾后，他坚持还了一段时间的贷款，最终还是选择停贷。后来，他和女朋友分手。

这些业主经常会提到，自己当初买恒大的房子，都觉得“恒大这么大一家企业，世界 500 强，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谁也想不到，这么大一家企业，上万亿的资产，倒下来的速度却如此之快。

恒大债务危机爆发后的这两年里，许家印仍然不时地向公众露个脸，喊着“保交楼”的口号，还有他正处理在香港、深圳的豪宅的消息传出。但恒大的盘子实在太大了，人们知道，起死回生的机会渺茫。直到今年 9 月，许家印被带走的传闻得到证实，一起被抓的还包括恒大集团的前 CFO 潘大荣、恒大物业的前董事长甄立涛，以及许家印的小儿子许滕鹤。加上此前被逮捕的恒大财富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杜亮，恒大集团原执行总裁柯鹏，至此，恒大的核心高管团队几乎覆没。

恒大之所以能长成如今的这头巨兽，成败关

键很多系于许家印身上。作为恒大的最高话事人，许家印在恒大的决策体系里拥有说一不二的至高权威。很多工作多年的内部员工坦言，虽然是一家上市公司，但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董事会、监事会、外部股东等角色在恒大很难起到真正的制衡监督作用。恒大的很多高管，也都是从许家印身边的秘书提拔上来的——许老板的信任与否，亲疏远近，直接决定着这些人的前途命运。李威是2016年后入职恒大深圳总部的，在一个关键的职能部门工作的五六年里，他只在公开的活动场合远远见过两次许家印，而大部分恒大员工，这样的机会都很少。他说，外界传说的"控梯员"真实地存在于恒大，在深圳总部的员工都知道，当许老板要经过某条走道时，大家都要远远避让。

在恒大，许家印是出了名的喜欢发号施令。据说，许家印的一个指令，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传达至地区分公司最基层；许家印的一个电话，可以让远在沈阳的分公司经理，当天就赶到西安上任；许家印的一个计划，可以让企业的员工当天就在某市组建起一个分公司，并且在深夜11点就正式开始办公。

手握常人难以想象的资源和权力，在恒大的最后这十年里，许家印到底做了什么？在危机到来之前，他在多大程度上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有想过或者有可能扭转恒大这艘巨轮的航向吗？

第一桶金——从珠岛花园到金碧花园

在广州荔湾区东海南路，珠江畔，有一个叫珠岛花园的小区，住了几千户人家，开发商是广州市鹏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鹏达"），时任总经理为许家印。从珠岛花园往东南10公里左右，到海珠区工业大道上，另一个名为金碧花园的住宅区，体量也不小，分为好几期，从外面看起来，装修得富丽堂皇，很有档次。这是恒大地产开发的第一个小区，操盘人也是许家印。要理解恒大这个地产帝国的形成，还得从这两个项目开始讲起。

许家印的前半生是一个贫穷的农门子弟，如何通过考学，进入国企，一步步提升的故事，和房地产半点也不沾边。1958年，许家印出生在河南周口市太康县一个叫聚台岗的村子。在他8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因为败血病去世，他是奶奶一手带大的。18岁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太康县城。许家印的父亲许贤高16岁参军，参加过抗战，后来受伤退伍返乡，在村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恢复高考后，在父亲支持下，许家印放下农活开始复习，1978年考上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冶金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河南平顶山市一家大型国企——舞阳钢铁厂。那里离他老家很近，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但他终于实现了身份转变，从农村跳到了城市。作为车间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许家印很快就从普通员工被提拔为主任助理，然后是车间副主任、主任。他在舞阳钢铁厂的老同事后来给他的评价是："很沉稳，说话也很干练，不啰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了一轮干部下海经商潮。此时的许家印已经34岁，在舞阳钢铁厂的热处理车间干了10年，看不到继续晋升的前景。他辞职来到深圳，进入一家叫中达的贸易公司，从零起步，先做了业务员，后来靠着舞阳钢铁厂的关系拉到了一笔生意，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1994年，他被老板派到广州，创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这就是广州鹏达。许家印最早手底下只有5个人，在黄埔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间民房当作办公室。

当时的许家印对房地产一窍不通，连容积率是什么都不懂。靠着之前做贸易从银行贷的一笔款，他拿下了荔湾区的一块地皮，启动珠岛花园项目。他有野心，头脑灵活，和那一代的创业者一样，也足够勤奋，善于抓住机会。他当时跑遍了广州的新建楼盘，发现80%以上都是大户型，让许多购房者望而却步。所以，他给珠岛花园项目制定了小面积、低价格的策略。而且他手里的资金有限，战线不能拉太长，必须快进快出，回笼资金。珠岛花园一期建的几百套房子，几乎清一色是小户型，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让许家印引以为傲的还有一点是，他们当时需要办的所有手续，108个公章，当年就全部搞定，创造了当年征地、当年报建、当年动工、当年竣工、当年售罄、当

年轰动、当年入住、当年收益的“八个当年”奇迹。珠岛花园让母公司中达赚得盆满钵满，作为操盘人的许家印显然是看到了房产开发的巨大潜力，果断辞了职。1997年，他买下广州鹏达成立的合资公司广州天帝，将其改名为恒大地产有限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1997年，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拉开序幕，很快就要迎来商品房时代，房地产行业正经历着一轮创业大潮。恒大成立时，在广州的大小房地产公司已经不下2000家，环顾全国市场，真正的巨头尚未出现。王石在深圳创办的万科1988年开始聚焦房地产行业，很快便在深交所上市。冯仑和“万通六君子”从海南的土地泡沫中全身而退后，开始分别创业。佛山的建筑工人杨国强1992年创办了碧桂园，同一年在北方的大连，从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赚到第一桶金的王健林也成立了万达地产。相比这些日后齐名的大佬们，许家印的起步晚了几年，但时机刚刚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反倒给新生的恒大创造了空间。许家印当时正苦于缺少资金，买不到合适的地块。那时候的海珠区地处偏远，工业大道上工厂林立，污染严重，环境很差，一般的房地产开发商对这里兴趣不大，但许家印在那里找到了一块原广州农药厂地块。一家公司把地块买过去后握在手里，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迟迟不敢开发，最后索性低价抛售给了许家印。即便如此，这对许家印仍然是一笔巨额资金。但是，有了珠岛花园项目的经验，许家印如盘复制。他在价格上予以退让，但谈下了分期付款的条文。土地谈下来后，他再找银行贷款。一共贷了600万元，其中500万用来支付首期的土地出让金，另外100万留作公司运营经费。许家印后来回忆道：“价格是次要的，但是付款方式是最重要的，因为起步创业的时候没钱嘛，而且新企业跟银行贷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是速度快，所以金碧花园就是这样干起来了，接下来就滚动发展。”

1997年6月8日，金碧花园破土动工。为了快速回笼资金，许家印同样全部采用小户型设计，同样复制了“八个当年”的目标。在建设过程中，他还说服施工单位垫资帮他盖房，等完成第一层施工后，达到楼盘预售条件，然后打着亏本价的广告迅速向市场推出。果然，金碧花园第一期300多套房子只用半天时间就卖完了。第二年，许家印又推出了第二期项目，价格也趁机大幅上调，但因为名声已经打响，照样很快售罄。金碧花园项目的成功，让许家印在广州地界站稳了脚跟。

这套打法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被复制。短短三年，1999年，恒大便从2000多家房地产企业突围，成为广州市十强房企。2006年，成为中国房企20强。2009年11月，在香港成功上市。2016年7月20日，恒大第一次登上美国《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列第496位——这是全世界第一家只用20年就干成了世界500强的房地产企业。

房企的赌性——预售制下的金融游戏

从珠岛花园到金碧花园，许家印两次空手套白狼式的操盘，在当时的房地产行业不是个例，很多房企都是靠这种手段完成崛起的。而这一切，都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在国内全面实行的商品房预售制。日后愈演愈烈的房地产金融化之势，很大程度上即肇始于此。

预售制主要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房子还没完全盖好，但只要达到一定条件，开发商就可以向购房者出售，这样的房子也被人们称为“期房”。内地第一个商品房预售项目1980年出现在深圳，但作为一项制度全面推行则要等到1994年。199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明确允许商品房项目将未完工的房屋提前销售，获得购房人支付的购房款。新房预售，逐渐成为主流。

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国老百姓的住房，尤其是城镇居民的住房过去大都依赖政府筹资建设，人均住房面积很低。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把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力量来解决，开始推动住房商品化改革。但房地产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买地到规划设计、建筑施工都需要大量资金，当时很多房企都是白手起家，手里的钱也不多。预售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2009 年 11 月 5 日，许家印出席港交所举行的恒大集团上市仪式

帮助房企提前回笼资金，从而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及项目开发的速度。起初，这对解决老百姓住房严重不足的局面是有好处的。

但预售制也让房子产生了金融属性，尤其是当房价进入上升通道后，未来才交付的房子实际上成为一种看涨期权——当下低价买进，几年后再高价抛出，购房者能得到巨大的回报，炒作之风自然兴起。在这个逻辑之下，房子不愁卖，房企则有无限扩张的强烈冲动，以恒大、碧桂园为代表的“高周转、高负债、高杠杆”三高模式逐渐成为行业主流。

“三高模式其实是互为循环的：高杠杆与高负债看起来很像，但有本质不同，高负债的‘负债’一般是指有息负债，而高杠杆中的‘杠杆’则既包括有息负债，也包括应付账款及票据，甚至还包括应付薪酬、应付税款这样的无息负债。无息负债看起来短期内不需要支付债务，但也要承兑，到期必须偿还。高周转的原因就是来自高负债和高杠杆的压力，企业必须高周转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去应对高负债带来的财务利息压力和高杠杆带来的现金流压力。这种模式最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这也是这一轮房地产危机的病根所在。”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向本刊解释道。

2006 年，恒大提出向全国市场进军的口号。许家印有意避开了一线城市，把重心放在了二线城市。他认为，要实现恒大的扩张目标，必须做到“两个超前进入”，即超前进入升值潜力比较大的二线城市；超前进入城市当中升值潜力比较大的区位。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说武汉，考察了它的环线，环线边上或者以内，不在市中心，可能还不成气候，但是它的交通、规划、未来的环境，各方面都是一流的，就是说，这个区位的升值潜力比较大。要朝

这个方向去找。所以恒大才有了这么大量优质的土地储备。”到2007年底时，恒大的土地储备比2006年增长了9倍多，同时进入20多个一、二线核心城市，后面几年又下沉到了三、四线城市。

中国的城市能级有足够的纵深，从一线、二线到三线，再到四、五线城市，给房企们扩张不断提供新战场，最终使全国人民都被卷入到了这场房子的游戏当中。

明源不动产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艾振强告诉本刊，在地方层面，2002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价上涨的热潮。2002年以前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基本都是协议出让，即政府和用地者私下签订协议，有关系就能拿到地。2004年“8·31大限”之后全国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所有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公开竞价出让，价高者得，土地市场进入金融红利时代。这个阶段就看你胆子够不够大。因为价高者得，土地会不断升值，所以你借的钱越多加的杠杆越高你拿的地就越多，你的资产增长也就越快。每新拍下一块地，都会把周边的地价抬高，让原来的土储价值水涨船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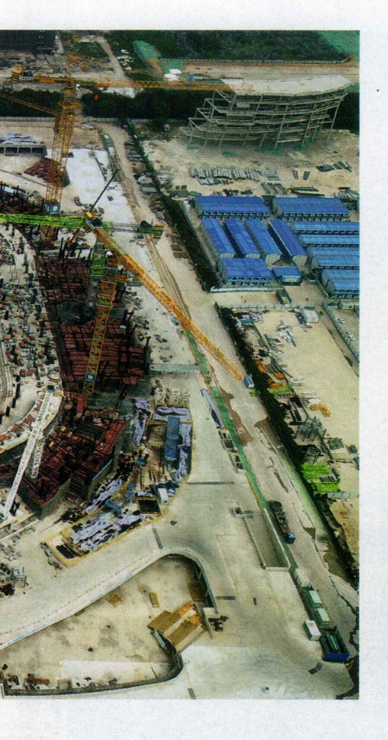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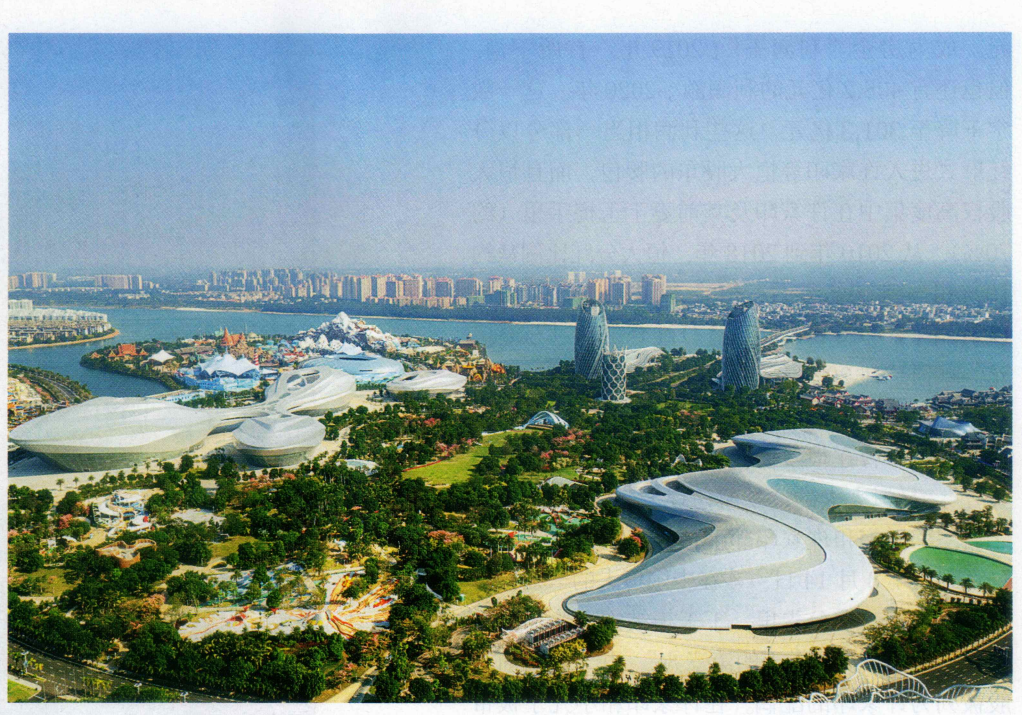
对于房企来说，在城镇化率还不太高时，要快速做大规模，低能级城市也更容易。艾振强告诉本刊：“比如你有一亿元的资金，在三、四线城市去拍地，如果楼面价是2000元一平方米，建成商品房后售价是6000元一平方米，地货比就是1∶3。如果你在一线城市拿地，楼面价是2万元一平方米，最后房子卖3万元一平方米，这个时候你的地货比只有1∶1.5。这里就差一倍了。再加上杠杆放大，绝对规模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算保守一点，比如自有资金是1个亿，再借3个亿，就是4倍的杠杆。低能级城市的地货比是1∶3，乘以4倍的杠杆，总共就是12倍，相当于你用1个亿的自有资金撬动了12个亿的可售货值。相比之下，在一线城市你就只能撬动6个亿。”

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差异，在现实中，房企还能用各种隐形的手段进一步加高杠杆。艾振强提道：“一二线城市的各项法律法规要求更加规范，但三四五线城市就宽松很多。所以这些企业跑到三四五线城市，杠杆能加到更高，还能享受更多优惠政策，比如土地出让金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开发商可以和地方政府财政勾兑，缓缴、分期缴纳，甚至拖欠土地出让金，等房子卖得差不多了再给地方政府，但一线城市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恒大在二、三线城市所储备的土地，大多就是以交付少量定金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分期开发协议而获得的。“比如项目有1000亩地，但会分为几块甚至十几块地拿。如果按第一块100亩算，最先只用付30%或者更少的保证金。剩下的钱需在规定的时间内付完，不然就是高额的滞纳金。”拿到地后，恒大会进入擅长的前期融资阶段。曾在恒大从事5年工程管理的于睿告诉本刊，前期融资成本较高，但“公司总能拿到钱”，这笔钱通常用于项目前期的工程建设直到达到预售条件，“只用1～3个月时间，恒大就能盖完售楼部、建完样板间”。这时候，项目会去跟许家印申请付第一块地的尾款，通常是一笔过桥资金。于睿说，“四证”到手后，就可以去借开发贷，在监管不严的时代，预售资金则被挪用去撬动更多的地块，如此循环直至1000亩。

预售制原本要求预售资金全部进入银行的监





左图：2022年3月20日，广州恒大足球场施工场景。按规划，建成后其将成世界上最大专业足球场之一

右图：位于海南儋州的恒大海花岛文旅项目，是恒大打造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

管账户，按照房屋完成进度支付给施工单位，但在很多地方，房企会抽掉这些预售资金去开发新的项目——这也是这轮房地产危机中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的原因所在。"这个过程里，不少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对这些企业尤其是大型房企比较迎合，监管力度薄弱，然后他们才能高杠杆，不断扩张。但是你用一个茶盖去盖几个茶壶，盖来盖去，有一天盖不住了，就会造成整个链条的崩盘。"陈杰说。他在2016年那轮房价暴涨的时候，就写过文章分析，提示这背后提供支撑的市场逻辑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但是，当房价仍在上涨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忽视掉风险，更看重收益。翁峰在房地产营销行业干了很多年。2018年，他花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国10个城市找了100个购房者来采访，最后问的问题都是"你觉得房价会涨吗"。"所有人都觉得房价会涨。当所有人都觉得房价会涨的时候，什么样的房子都会有人买。我买不起核心地段的，就找一些洼地，看起来虽然远，但房地产商把什么都造起来了。"翁峰说，那几年，恒大、碧桂园这些房企到一个地方已经不是单纯地拿地盖房，而是去造城。在特别偏远的地方，廉价拿下大片土地，把基础设施都做好，然后吸引大家去买。买了，你就能赚。陈卫强买的武汉时代新城就是一个典型，这个项目的位置离武汉主城区特别远，本来是一片荒地。恒大决定开发后，先是造了一片花海，然后盖起漂亮的售楼部，还说会有公园、学校、商业体的配套，政府也规划了地铁。因此吸引了很多和陈卫强一样经济能力不强的外来打工者。

陈杰认为，这一轮危机还暴露出企业高管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的经营者有业绩冲动，能从中获得很大好处，但不会承担太多的成本，这种不对称性会刺激他们去做出冒险性的行为。而且房地产行业这么多年下来，过度金融化，房企普遍都有很高的融资压力，经营者的思维越来越短期化，比如房企发行了很多海外债，面临着短期的业绩压力，所以他们必须对业绩去做粉饰，他们不一定需要利润有多高，但流水一定要高，只要现金流能稳得住的话，就可以继续扩张。"

在事发的前几年里，恒大的财务数据十分亮眼。恒大核心业务利润405.1亿元，同比增长94.7%；2018年同比增长93.3%，达到783.2亿

元，成为房企“利润王”；2019年，有所下滑，但也还有408.2亿元的利润额；2020年，这一数字下降至301.3亿元。这些利润相当一部分以分红形式进入许家印等恒大股东的腰包。而且恒大股权高度集中在许家印及其前妻丁玉梅手里（约70%），从2010年到2018年，恒大分红比例从约10%提高到60%左右。相关统计显示，恒大上市以来，许家印及其家族通过分红套现超过500亿元。哪怕是在2021年6月恒大财富即将爆雷前，许家印还通过分红得利15亿元。

许家印曾在很多场合自诩与丁玉梅是“模范夫妻”，是恒大人的“学习榜样”。恒大债务爆雷之后，丁玉梅和许家印却悄悄办了离婚。这一消息直到今年8月14日，才在中国恒大的一则公告中得到佐证。在公告里，丁玉梅被定义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并未如此前一般被列为许家印的配偶。在许家印和小儿子被带走前夕，丁玉梅则被曝出已飞离香港，远走高飞。

关键抉择——2016年的分水岭

回头来看，恒大首登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的2016年，是恒大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道分水岭。往后的两三年，可能是留给房企转型的最后窗口期。这一年对房地产业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房住不炒”。但当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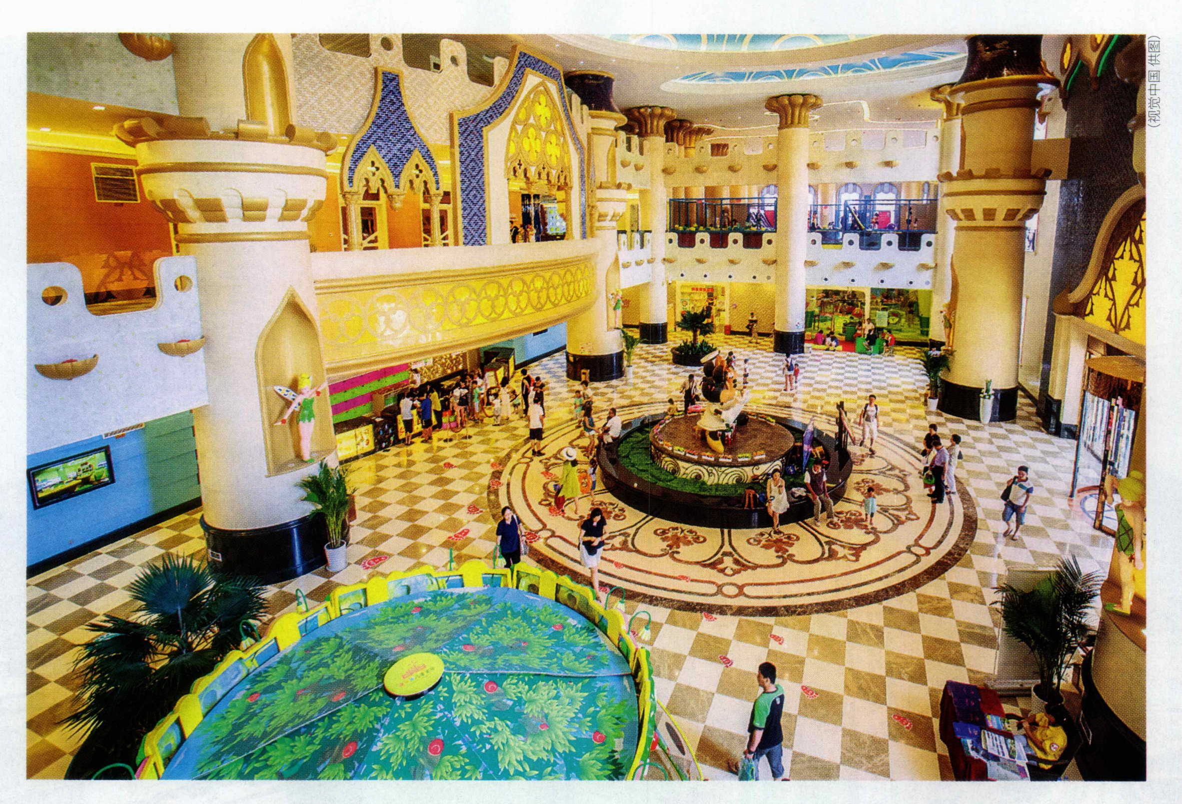
2017年，之前在海外疯狂并购的万达集团首先感到了债务压力，王健林在危机冒头后选择断臂求生，大量抛售旗下的文旅、酒店项目等资产，接盘的包括融创、富力、苏宁等公司，后者如今几乎全部深陷债务泥潭。2018年，万科的董事长郁亮首次喊出“活下去”的论调，此后又不断抛出节衣缩食、缩表出清的信号，在拿地方面也变得相对谨慎。但是，更多的房企仍在加速奔跑，冲击千亿目标。那时候业内盛行的一句话是“有规模才有江湖地位，才有话语权”。

2017年初，许家印在恒大一次重要的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要转变“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低成本”的“三高一低”发展模式，由“规模型”



恒大债务爆雷，给整个地产行业造成巨大冲击，许多合作伙伴也陷入财务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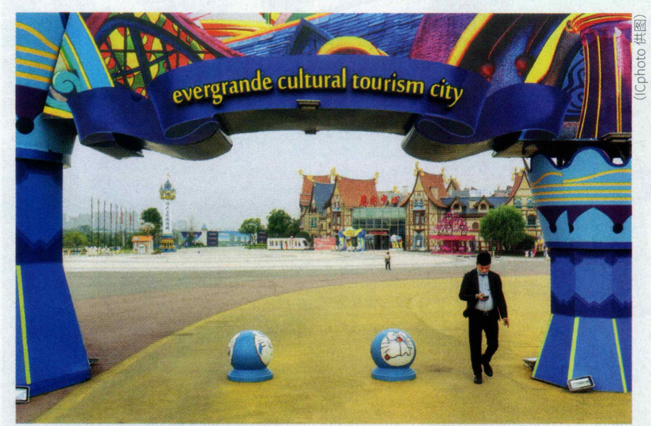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恒大海上威尼斯水城是恒大打造的另一个巨型文旅项目，位于长江入海口上海市崇明岛北岸，与上海市隔江相望

下图：2021 年 10 月，江苏省句容市恒大童世界入口处



（ICphoto 供图）

向“规模 + 效益型”转型，向“低负债、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三低一高”迈步。似乎，他也察觉到了风向的转变。但紧接着，他对房地产的发展表达了乐观和信心，给往后几年定下 20% 的增长目标。他说：“尽管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量非常大，人均居住面积也已经不小了，但中国是 14 亿人口的国家，住房的总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我判断，未来两到三年，总的成交量还会继续增加，随着人均面积越来越大，3～5 年后市场总需求会开始下降。但是无论怎样下降，对龙头房企而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恒大去年销售尽管已经达到 3700 多亿元，但在整个市场中的占比也仅为 3% 左右，占比并不高，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2017 年，成为恒大历史上的拿地高峰之年——新增土地储备面积 1.26 亿平方米，近乎占国内房企新增拿地面积的一半。这些土地储备以 100% 独资为主，主要是靠并购得来，资金则源于外部融资。这一年的新增土地花了恒大 2380 亿元，造成其当年有息负债 7326 亿元，仅支付利息就要 541 亿元。大幅举债的结果是，恒大以 3.12 亿平方米的总土地储备面积成为国内首家土地储备超过 3 亿平方米的房企。

“那几年，集团会有很多巨额的激励机制鼓励分公司去拿地囤地。比如 2017 年至 2018 年疯狂拿地时，差不多就是一亩地奖励 1 万元，拿 1000 亩就奖励 1000 万元，3000 亩就是 3000 万元，然后从上往下按不同比例依次分下去。”于睿对本刊

表示，“拿地的时候，各种图纸和合作单位都已经招标好了，拿地当天施工单位就可以直接进场。一旦付了尾款，恒大最厉害是最快能在一天之内把所有证照全部办完，这就是体现恒大能力的地方。”

于睿是2016年加入的恒大，负责恒大文旅板块的综合运营管理，涉及项目的投资开发、设计、招标、工程、资金等。在2017年左右这一时间节点，文旅是恒大的一个重点发展业务。一份克而瑞的研究显示，恒大2017年的土地储备集中度高，“大”是一个显著特点。比如同样是土地储备的巨擘，以2.82亿平方米排行第二的碧桂园的单项目体量只有恒大的一半。克而瑞认为，这与恒大“2017年在热点二、三线城市新增多个大体量文旅项目有关”，比如恒大童世界、海上威尼斯等热门文旅项目。

“文旅的核心还是住宅。”于睿说，这些文旅项目一般是为了配套住宅而开发，特点是土地面积大，且位置非常偏远。他举了一个代表案例：恒大在河北沧州拿的一块文旅城项目大地块，这块规划约16000亩、计划投资1000亿元的大项目位于渤海岸边，距沧州市区65公里，还多是盐碱地。“光治理盐碱地就要花很大成本，最先是恒大北京公司的人来看过这块地，给否决了。但后来许老板直接下令说这块地一定要拿。”

许家印的个人风格，加上恒大多年扩张的惯性，已经在恒大组织内部形成了某种非理性的氛围。在恒大深圳总部工作的李威说，机械地追求数量和规模几乎是那几年不论业务还是职能部门的共性，往往是公司一项政策下来，各部门都会主动加码，给员工设置很多目标，在数量上不断叠加，有些任务和目标明显毫无意义，但没有人敢不执行，否则就会遭到处罚。因为每个部门内部，员工的奖罚，基本都是看直属领导的脸色。

陈杰告诉本刊，如果2016年前后，政府判断房企“三高”模式风险很大，在政策上采取一个相对稳健的态度，可能那时候就会迫使这些房企提前转型。但当时的背景很复杂，宏观层面承压，很多产业库存积压严重。加之当时大家也没觉得人口增长有很大的压力，普遍认为房地产的潜在需求还比较大。在这种判断下，就采取了房地产去库存的思路，推出货币化棚改，各地楼市迅速反弹。其实国家很快就意识到了势头不对，所以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房住不炒”。“大家觉得风险是有，但还很遥远，还有时间去消化，后面几年政策就没那么坚决，一直到2020年，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想倒逼房企逐步转型。但没有想到疫情一来，宏观经济受到很大冲击，还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加上新生人口断崖式下滑，问题就集中爆发出来。”

许老板的“白衣骑士”

其实2021年不是恒大第一次遭遇债务危机。早在2008年，恒大就曾因为债务问题差点崩盘。那次危机的种子同样是在高速扩张的过程中埋下的。2006年，楼市迎来大涨，许家印做出了向全国市场进军的决策，并同时启动了恒大地产海外上市计划。当时的恒大已经进入中国房企20强，但体量还不算大。为了给上市做准备，许家印故技重施，拉来银行和投资机构的融资，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美林及淡马锡等国际著名投行。前后几轮融资给恒大注入了上百亿的资金。拿着这些钱，许家印开始在全国疯狂囤地。2007年，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较2006年增长了9倍，到2008年3月冲刺上市时，已经高达4580万平方米。这一土地储备，仅次于碧桂园，是当时“地产一哥”万科的近两倍。

当时资本市场对地产股的估值方法比较偏重土地储备数据，恒大由此得到的估值高达1200亿至1300亿港元。这一数字，意味着恒大地产上市成功，许家印个人的身价可达800亿港元，有望成为当时中国内地的新首富。不幸的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时爆发，资本市场一片萧瑟，恒大在香港的上市计划也就此夭折，这直接将恒大推向了险境。根据许家印后来的回忆，当时恒大的资金缺口接近100亿元。2008年7月，恒大于2007年底以41亿元拍下的“地王”广州绢麻厂地块到付款截止日期，此前大价钱买入的重庆科技学院地块和上海项目地块，也相继到了合同约定的土地出让金付款日期——恒大一触即溃。

为了自救，许家印去求了很多人，最后在香港找到了救星。圈内广为流传的桥段是，恒大上

市中止后，许家印在香港待了三个月，几乎每周要与新世界的创始人郑裕彤吃上一两次饭，还常常陪着郑裕彤、刘銮雄、张松桥等富豪打牌。用许家印自己的话说，“差不多可以说是在那里上班了，瘦了四五斤”。最后，总算拿到了他们的银团贷款和注资。另一方面，许家印也开始调整开发建设计划，停下暂时不能开盘的项目，全力冲刺可预售的项目。2008年10月，恒大地产在全国范围内的18个楼盘同时开盘，“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的策略帮助他们回笼了一批资金。

彻底的形势扭转是在2008年底。这一年的11月，中央政府“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出现180度大转弯——恒大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位“白衣骑士”。许家印赌对了。2009年春节过后，全国楼市回暖，量价全面回升。2009年仅上半年，恒大地产实现销售收入120多亿元。恒大不仅从ICU被拉了出来，而且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增强，很快挤进全国房企前三。

事后回忆起来，许家印对自己当初的判断和决策颇为得意。危机之初，有人建议他把手里的工地或者土地卖掉救急，但他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许家印认为，恒大地产这么一个大企业，还没有艰难到卖工地、卖土地的程度。“有人觉得恒大过不去这一关，那是他们不了解恒大。我们的情况，离他们想象的还远着呢。”许家印说，上市失败后，他算了一下手头还有280万平方米的项目预售证，这些项目，如果以3500元/平方米的全国均价出售，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全部卖光，收入达到上百亿元。2009年，许家印终于在香港实现上市梦，包括李嘉诚、郑裕彤等众多香港富豪成为恒大的投资人，纷纷认购恒大股票，路演的时候还派人前来站台。

到2014～2015年间，国内楼市又进入一轮低谷期，新房库存积压严重，恒大的销售遇到难题，债务问题重新浮上水面。这一次，许家印同样是靠打折卖房，然后等来2016年的楼市去库存政策，最终安全过关。但这时候，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警惕性开始提高，特别是“房住不炒”提出后，房企融资的成本和压力越来越大。

此时，许家印萌生了“借壳回A”的想法。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当年有名的“万宝之争”，宝能系的控制人姚振华2016年前后在二级市场大量买进万科的股票，一度成为万科的最大股东，并且试图罢免以王石为领导的管理层，夺取万科的控制权。恒大则乘机不断增持万科股票，成为后者第三大股东，加入了“万宝之争”。最后，深圳国资介入，深圳地铁集团成为万科控股股东。恒大把手里的万科股份也折价卖给了深圳地铁，但许家印获得了深圳国资房企深深房（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壳资源。深深房是中国内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家房地产经营企业，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也是A股最早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但几十年下来，发展并不顺利。2016年10月，恒大与深深房达成了一项重组协议，启动了借壳回A股上市的程序。恒大在2017年8月将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落户南山区的卓越后海中心，有一个解释说就是为了这次上市。

为此，从2017年开始，恒大还经过三轮增资引入了中信、深业、苏宁、中融、山东高速等战略投资者，合计资金规模达1300亿元。恒大与战略投资者签署了对赌协议，如果未能如期重组上市，恒大需要原价回购股权。“2016年前后，恒大在融资方面已经遇到一些障碍，但债务问题还没完全暴露，国内资本市场对他们也没那么警觉，借壳的程序就启动了。但是房地产在2016～2017年已经是强弩之末，再过两年就开始往下走了，政策层面对房企也变得越来越谨慎、怀疑，最后是拒绝。”国家高端智库CDI研究员宋丁告诉本刊，那段时间，不止恒大一家房企试图“借壳回A”，监管层采取的基本都是封杀态度。“因为凡想借壳的，基本上都是存在相当的债务风险，通过其他的融资渠道，比如说信贷、信托或海外融资渠道等，都存在很大的障碍，他们才需要通过股市来解决资金链的问题。”

2020年11月，恒大正式宣布深深房重组失败。接下来，恒大与战略投资者们协商，将这1300多亿战投中的1257亿元转为了普通股，不再要求恒大回购，这其中包括苏宁投资的200亿元。2017年双方达成交易时，许家印和苏宁老板张近东的一张喝交杯酒的照片流传甚广，成为这场交易的场外注脚。2020年11月，苏宁投资的中超球队


2021 年 9 月 14 日，恒大财富爆雷后，各地投资者聚集到恒大深圳总部楼下抗议

江苏苏宁队夺得队史首个中超冠军。第二年，苏宁债务爆雷，新科冠军江苏苏宁队在新赛季打响前宣布解散。很多人认为，与恒大的这笔交易，或许就是压垮苏宁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许家印，同样没等来自己最后的“白衣骑士”。

万亿商票背后的供应商

过去二十多年来，一起参与这场房地产豪赌的，不只是许家印和他的恒大，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无数供应商。把恒大 2.38 万亿元的债务构成拆解来看，这一部分占大头（接近 1 万亿元），另外两大块则是欠业主的合约负债（7000 多亿元）、欠银行的借款（6000 多亿元）。

魏唐是江苏一位建筑商，主要为恒大等房企在江浙沪地区提供围挡施工、工程配套的服务，2016 年成为恒大供应商。“以前恒大扩张的步伐没那么快，但高周转起来后，项目越来越多，要的供应商也越来越多，恒大就主动找了我们很多人加入。”魏唐说，恒大对供应商的要求主要是两个：首先是要能垫资，其次是要能配合高周转。那几年，一个供应商一年做十几个恒大的项目是常态。“开工三个月左右就能开卖，有时候都没拿到预售证就开卖。甚至一个住宅只盖了一个大门，就把房子都卖完了。”魏唐说。

恒大早些年对供应商们还能按时结款。国内火热的房地产市场，总能帮助他们迅速回笼资金。为了吸引购房者，恒大也有独特的自身经验。魏唐说，为了赶工期，相较于其他房企，恒大对于工程质量的要求不高，“做工粗糙，不太讲究”。



恒大集团总负债高达 2 万多亿元，无数购房者成为烂尾楼业主

但另一方面，恒大却愿意在前期的园林和售楼部打造上下血本，“其他房企可能售楼部装修的预算只有 30 万到 50 万元，恒大花个 150 万都正常。”在江苏跟恒大合作了十多年的装修供应商廖红梅说“他们给人感觉就是不差钱，生怕售楼部有任何地方空着了。如果有，那一定要花钱摆个装饰上去。”在这样豪华的售楼部中，恒大展现出了强大的销售能力。“2016 ～ 2018 年间，无锡一个 400 套房子的楼盘，一开盘就有 3000 多人争着抢，一个小时卖了 7.5 亿元。那时候，一个销售人员一个月能卖 25 套房子。”

供应商的巨额垫资，继续放大了恒大的杠杆，使其具备了更加惊人的扩张能力，债台也越筑越高。虽然许家印在 2017 年后多次喊出“降负债”，提出土地储备要每年下降 5% ～ 10%。但随后几年，恒大却一直在增加土地储备，从未达到过 5% 的最低降幅。与之相对应的是，恒大每年的项目数量都在增加，从 2016 年的 582 个增加至 2020 年的 798 个。但 2017 年后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降温。从 2017 年至 2019 年，恒大合约销售金额同比增长速度从 34.2% 降至 9.0%，销售面积增速从 12.6% 降至 11.5%，其中 2018 年仅 4.2%。

供应商们对这种微妙的变化有最敏锐的感知。这时候，恒大已经在大量使用商票付款了。商票是一种金融公司或企业发行的短期票据，经常被企业用作筹款的一种工具。不同的商票有不同期限，到期后，持票人可凭票向企业或银行兑换本金与利息。说白了，这其实是企业的一种“赊账”行为，只有企业有足够的信誉度，其他商家才会接受商票。公司信用越好，商票的贴息越低。艾振强告诉本刊，大量使用商票，也是“三高”模式下的产物。因为开发商拿了土地，从银行抵押贷款，又从购房人那里获得预售款，可能并不是都用来盖房子，而是去拿新的土地，开发新的项目，那么盖房子的钱从哪儿来？就只能让供应商来垫资。为了减少对现金流的占用，开发商不与供应商现金结算，而是以公司信用背书，为其开一张商票，承诺一段时间后兑付，从而延长付款时间，平滑现金流。而且，由于商票融资不用被计入有息债务，还能美化有息负债率。行情好的时候大

家也乐意接受，市场上甚至有专业的机构和个人收商票套利，如果供应商急需用钱，商票也可以提前变现。一旦行情不好或者企业信用崩溃，这个循环就转不下去了。

一开始，这些商票的兑付还算正常，只是票据期限从最早的半年慢慢变成了一年，账期逐步延长。“最开始要到期的商票是必付的。”于睿说，集团财务在2018年后收紧，一个标志是从集团层面开始管理每月的支出额度。“之前每个省的分公司报多少钱基本上都会批，那之后就开始卡了，会规划整个集团这个月要支付多少个亿，然后精打细算往下分配支付指标，还要分支付等级。有一些钱是当月必付的，比如农民工工资、土地出让金的尾款、商票等。必付之后才是那些可付可不付的，不付也暂时不会死的那种——比如供应商。”于睿说。

然而，很多供应商在前期已经垫资太多，到后面即使不情愿也只能被迫接受。在与恒大多年的合作中，魏唐垫出去1000多万元货款，恒大多是付给他商票。2019年之后，恒大的情况就更让他看不明白了。魏唐说，那时候他参与过的很多华东地区的恒大楼盘纷纷推出打折销售，八九折是常态，一些楼盘降价2000～3000元/平方米在卖。“那时候就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商业逻辑，感觉恒大遇到问题了。”魏唐算了拿地和工程成本，认为恒大是在亏本卖房。到2020年，很多地方传出恒大商票兑付困难的消息，但这仍然局限于行业内部，外人不太关心。

恒大这些年遇到过大大小小各种问题和危机，每次都能安然度过，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甚至一直到2021年初，除了少数高层，绝大多数恒大的员工都没意识到大厦将倾。李威说，2021年初，公司又向内部员工推出了一批打折尾盘清仓房源，很多员工还是在抢着买，丝毫没有察觉到风险。

多元化何以加速败局

在开头提到的2013年11月9日这场亚冠决赛上，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细节是，恒大队员的红色球衣胸前第一次出现了“恒大冰泉”的广告。这场比赛也成了恒大冰泉的产品发布会。后来，恒大球员的前胸和后背，成为许家印发广告的最佳屏幕，每次有重大的品牌和产品要发布，都会挑选重要的比赛场次印上球衣。有时候，俱乐部甚至要冒着不讲信誉，被原有赞助商起诉的法律风险。2015年11月21日晚的亚冠决赛，恒大就私自将球员球衣的胸前广告印上了旗下的保险子公司“恒大人寿”，而非签约的赞助商“东风日产”，因此被后者告上法院索赔3000万元。

许家印说：“恒大足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品牌，这么好的品牌不用好就是浪费。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发展足球，反过来也促进我们的企业发展。大家都认为我们搞得好，有品牌，有保障，就会购买我们的房子，因此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足球事业。”在他的传记里写道：“许家印认为，投资足球，除了表面上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着更深层的利益。足球经济或许有限，但是通过足球进行高端资源整合的价值却是无限的。投资足球，可以得到更多潜在的高层支持。恒大可以利用足球这个平台，最大限度地整合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与资源，从而扭转企业商业上的功利性，对恒大在拿地、授信、社交等多个层面，都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2013年后，恒大加快了多元化的布局，在文旅、健康、能源、制造、快消、金融等领域不断出手。到2017年，许家印宣布恒大集团已完成多元化发展的产业布局，形成了以民生地产为基础，金融、健康为两翼，文化旅游为龙头的发展格局。许家印曾谈及：“未来房地产行业可能遭遇寒冬期，因此，要率先做好多方面发展恒大集团的准备，高收益的行业是恒大快速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键，而相对缓慢的体育行业也要加快商业化操作，前三年可以亏钱，三年以后必须赢利……”

李威对自己前东家的看法是，公司上下早就在房地产上习惯了赚大钱、快钱，很难瞧得上赚小钱，也就很难真正脚踏实地地在这些行业里深耕。而且短期内现金流不高的行业，比如健康、养老，都需要长周期回报，后来已经解不了许家印的燃眉之急——即便许家印有耐心去做好一个行业，恒大这头吞金巨兽也等不及了。尤其是到了后期，这些多元化的转型探索更加成为许家印





左图：2019 年 11 月，许家印出席在广州举办的恒大新能源汽车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

右图：2022 年 7 月 7 日，恒大汽车推出的恒驰 5 开启预售

的融资工具，先是不惜重金投入，然后拿去融资，准备冲击上市。但反过来，这些项目大都经营不善，又进一步拖累了恒大的现金流，导致债务恶性循环，窟窿越来越大。

与恒大合作十多年的廖红梅提供了一个侧面观察视角：恒大冰泉、恒大粮油出来后，恒大的付款周期由 1 个月改为 3 个月；恒大做金融、养生、文旅后，账期变为半年，开始大量签发半年期商票；恒大高调做汽车后，付款就更没有节点，大量签发一年期的商票。“后来商票都不签发了，开始逼着供应商们抵房，表面上说是九七折，其实每套房抵下来都比市场价贵最少 5%。”

以恒大冰泉为例，对于这款定位高端的饮用水，恒大砸下重金营销，仅 2014 年全年销售费用就高达 32.5 亿元，广告费超过 9 亿元。恒大冰泉的售价最初在 5 ～ 6 元 / 瓶，却招募了大量中小商超的经销商，供需错配让恒大冰泉在两年多后亏损 40 亿元。2014 年，恒大冰泉率先启用“一物一码”，通过扫码具备溯源防伪和会员服务等功能，价格也降至 2 元 / 瓶。一位接近恒大冰泉的人士透露，恒大当时给了经销商很重的销量任务，很多经销商就开盖扫个码，然后把水白白倒掉，“这就算完成任务了。所以即使有销量，也是假的”。

一举引爆债务危机的恒大财富，前身是 2016 年 3 月恒大推出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恒大金服”。当时正值全国 P2P 盛行，很多房产公司都推出自己的 P2P 平台，两年后，P2P 遭到全面整顿，2019 年，恒大金服才改名为恒大财富。但内部员工透露，事实上恒大财富仍在继续销售理财产品，而且对本公司员工层层摊派销售任务。进入其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则以各种途径变成了恒大系关联企业的融资，最后终于爆雷。

在多元化探索方面，声量最高的莫过于造车。2018 年，许家印高调宣布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家印同样遵循了自己的一贯打法，他形象地总结为“买买买、合合合、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为了造车，恒大耗费巨资，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几乎把产业链上能买的公司都买了。2020 年，恒大集团旗下在港股上市的恒大健康正式更名为恒大汽车，等于是让还没造出一辆车的恒大汽车提前上市，由此吸引了众多知名投资机构，其股价甚至一度超过比亚迪。

不过，在砸下近 500 亿元后，恒大汽车仅仅实现了恒驰 5 一款车型量产，交付还不到 1000 辆。



（视觉中国 供图）

2023年迟来的财报显示，恒大汽车2021～2022两年累计亏损840亿，截至2022年底总资产为1152亿元，负债达1839亿元，明显资不抵债。公布财报前不久，恒大还喊话称，要实现量产大概还需要寻求290亿元融资。

这些多元化的项目很多其实还是跟房地产形成了绑定——靠房子和土地收益来实现周转。甚至在恒大汽车这个板块，后来都有媒体报出，恒大汽车下设的子公司在2019年至2020年间，从各地拿了10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其中三分之一是可建商品房的住宅用地。而且，恒大汽车的员工也被集团要求参与到恒大楼盘的全员营销和认筹中。2023年5月，恒大汽车发布公告称，将出售旗下47个地产项目，剥离地产业务，成为一家纯粹的新能源汽车公司。

2014年，恒大推出了一个线上的卖房App——恒房通，号称要打造一个全民营销的移动网络平台。恒大后来的员工人数接近10万人，许家印采取全员营销的做法，每次要加快出清时，就把卖房的指标强压到各个部门和地区公司的头上，然后再摊派到基层员工身上，有时甚至要拉着合作伙伴的员工一起卖房。2020年起，于睿也被公司要求频繁地全员营销并在网络上做“水军”，从每个月带人去看房签到，到后期考核指标上涨，他不得已花钱找黄牛带人去看房。再后来，恒大开始要求员工认筹购房，他和同事选择了一个四线城市最便宜的一套房，每人几千元凑了首付。“当时就知道这钱肯定打水漂了，房子本身最后也烂尾了。”

宋丁认为，恒大爆雷事件绝不仅仅是恒大一家的事情，对整个房地产行业乃至中国经济都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一个企业像这样高的债务，在全球都是很罕见的。我们从香港学了很多房地产开发制度、经验，但是香港的房地产企业运作这么多年，尽管也是房价高企，但无论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还是郑裕彤创办的新世界，到现在也很稳健，没有一个爆雷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债务控制非常严格，香港也有相应的制度，他们很难有超过20%的负债率。超过这条线，他们就不往前走了。”

张阿姨家在武汉周边的农村，她的女儿也在武汉恒大时代新城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那是在武汉解封后不久买的，大家当时都说疫情后房子要涨价，她就帮着女儿四处借钱凑齐了首付，还从银行贷款近60万。房子烂尾后，远在贵州打工的女儿不常回来，夫妻感情也出了问题，每次有事都是在武汉做保洁的张阿姨去跑。虽然有人告诉她房子已经复工，但她每次去看，整个楼栋却只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磨洋工。“我昨天去的时候，发现腻子粉都没刮完，防水做得也不正规，精装修材料都没有上。我还去找了恒大的工程部，他们说材料报上去了，但钱没到位。”张阿姨今年60岁，她哀求说，自己身体不好，也跑不动了，“你们能够帮帮我们吗？帮我们把精装修的材料送到楼里，我们所有的业主不会忘记你们的。你可以在稿子里说我的名字和楼牌，我叫张××，我们是在武汉恒大时代新城E4高层×栋×单元××。”

（鞠红伟、宋达、陈卫强、李威、于睿、魏唐为化名；参考资料：郭宏文、徐亚辉：《恒大许家印》，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伟：《恒大的困境与中国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第一财经2023年8月；施旖旎、陈友华：《商品房预售制：保留抑或变革——基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4期）

偏僻的高楼，那些注定要减记的资产

主笔 · 邢海洋

楼房，尤其是高层住宅，本来是城市居住的一种高级形式，是建立在购房者相对富裕的生活水平上的，却大量出现在三、四线乃至更小的城市里。

那些山野间的大高楼

上党，山西南部太行山顶上的高地，在古人的眼里是可以和上天沟通的地方。秦人东出关中进攻中原，这里居高临下，控驭太行山下的广阔大平原。战国最惨烈的长平之战就爆发在这里。我坐着高铁本为访古而来，到晋城下了车，却感受到房地产开发的巨大力量。

丛林环绕的高铁站离中心城区真的很远。公交车在缓山丘陵间不断地打着U形弯，接上党校的学员、大专院校的学生、中学的学生，向着市区开去。我奇怪于为什么半天都没有看到居民。这里有很高的居民楼，一丛丛地“长”在深秋的山谷里，与风景融为一体，让人惊叹于太行山巅的平静与静谧，却缺乏大平原上看到的忙碌的市民生活。车行一个小时终于进入了市区，博物馆、体育场与长途汽车站仍然是舒朗地分布着，让人感觉似乎来到了一处度假小镇。后来我向当地人打听，这里的确在努力打造特色康养城市，吸引周边省区的居民来休养度假。在晋南沁水河谷两岸，分布着几十座明清时期建造的城堡，晋南纵横的沟壑与山包上是不下百座的古代庙宇。高铁站边新区的楼房都卖出去了吗？我向当地人打听。得到的回答，原来这都是农民上楼的结果，通了高铁建了新区，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了，就盖了高楼，每家每户都分了三四套房子。至于城里人是很少在这里买房的，原因是不方便。如此看来，新区短期内也就只能是风景一般的存在，并不能形成持续化的发展。

在山西南部行走，应该说晋城的烂尾楼并不严重，这里是重要的产煤区，出产的兰花炭泛着荧光，是被用来做化工原料的，烧了发电都是浪费。或许正是因为当地雄厚的实力，城市才能建设得这样规整漂亮，征地拆迁的楼房也没有烂尾。而在晋南的运城，烂尾情况就比较严重，在楼下吃饭购物，楼上就是没安窗户的一栋栋插向云霄的高楼。

太行山山上山下，凭借着煤铁资源，安阳、长治和晋城等城市都是过去的工业大市，生产从钢铁、化肥到电视机壳等各种工业品。时代变了，这些老工业都不可避免地落寞，城市在寻找转型契机，房地产就是一种。走在安阳的古老的大街上，仍能看到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商品楼，售楼处装点着明亮华丽的灯光。

当房地产开发轰鸣的机器突然安静下来，这些曾经给当地带来GDP的30余层的钢筋混凝土商品楼，却不能通过销售、装修、聚集产业工人和居民，乃至推动当地教育和日常消费来带动GDP了。今年前三季度的GDP统计出来了，那些曾经依靠房地产热闹一时的地方，都没有了增长的动力。比如曾经的房地产大省河南，如今烂尾楼缠身，从高铁站郑州东站出来，就能看到烂尾楼，受房地产拖累较为明显，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仅3.8%。有一次在郑州东站换乘，间隙时间很短，我只能在站前广场周边走一走，便看到离车站最近的商业楼锁了大门，上面贴着告示——因为2021年7月20日暴雨损毁了写字楼，租户与物业方达不成赔偿协议，大楼只好暂时关闭。这一关就关了一年多，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任商业地产空置，只能说明这里的商业氛围差到了一定程度。

山西受到煤炭价格下跌的影响，前三季度GDP增速是4.5%，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三、四线的空置率

8年前，我开车在秦岭脚下的高速公路上路过，看到一座座小城市，都竖起了几十层的高楼，是颇让人惊讶的。自从天通苑建起了亚洲第一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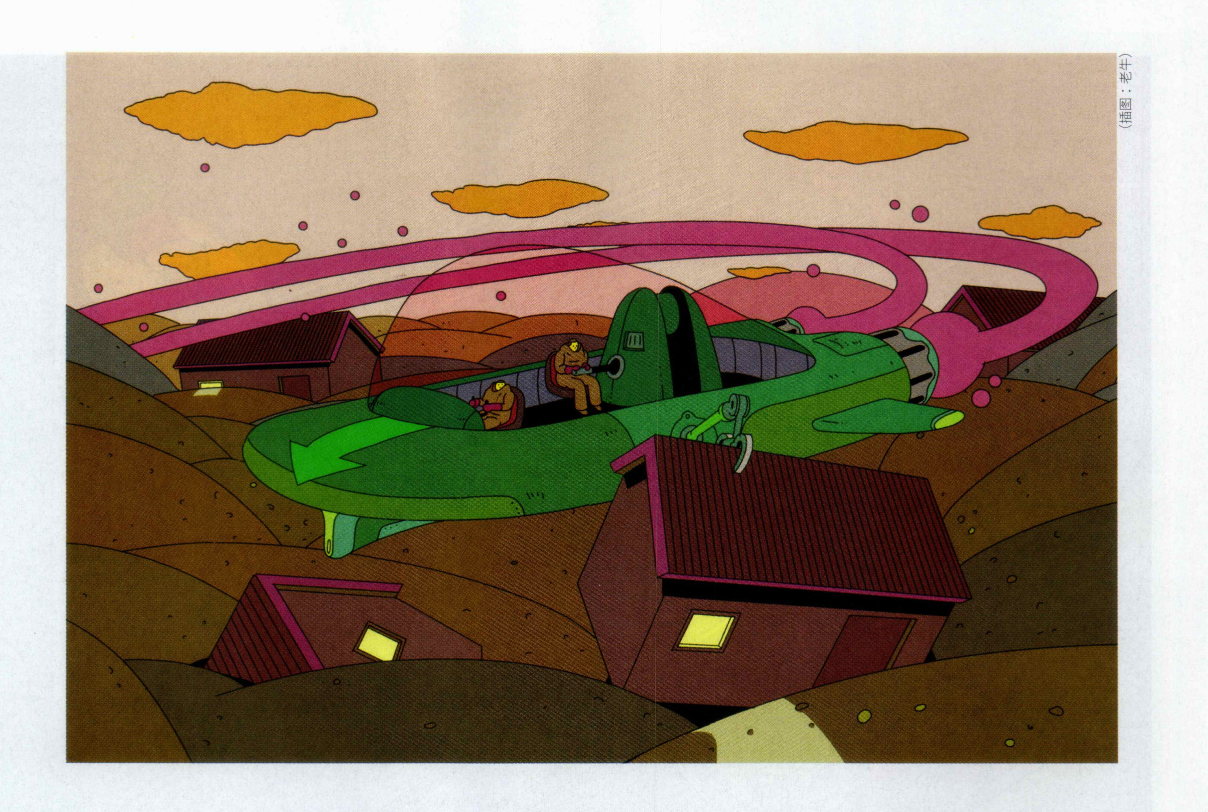
（插图：老牛）

区；长沙最大的小区湘江世纪城，300栋房屋住着10万人，相当于一座小县城；贵阳花果园，占地6000亩，总建筑面积近2000万平方米，住了十余万户，40万人……整齐划一的高大楼盘遮天蔽日，已经屡见不鲜。这些大城市里的大小区，虽不宜居，却卖出去了，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形成了社区生活。但那些远离了城市，试图要创建一座新城市的建设规划，却完全忽视了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发展规律，最终成了建设者和购买者的麻烦。这笔资产是早晚要面临清算的。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住房空置率调查报告》显示，全国28个大中城市平均住房空置率为12%，其中，南昌、廊坊、佛山的空置率排前三位，均在15%以上。而以全球各国的经验，5%～10%的空置率是正常区间。28个城市中有一半低于10%，只有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座城市低于7%。

但28座城市都是大城市，甚至只有少数三线城市能够入选。那些级别更低的城市很少进入到统计范围。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8年底曾发布报告称，截至2017年，我国城镇住房套户比达到了1.18，意味着若以一家一套房产的标准，房子多出了18%。研究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入户调查的方式来判定住房空置率，2011、2013、2015、2017年调查出的结果分别是18.4%、19.5%、20.6%及21.4%，2017年的时候，全国空置的住房就有650万套了。

按照我国房地产发展的趋势，新建的房子是越来越多的。并且，2017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广大的中西部小县城，刚刚进行了大规模的去库存运动，新一轮补库存又开始轰轰烈烈地进行，一、二线房企如恒大、碧桂园、融创、保利、雅居乐、中粮、富力等也开足马力入驻小城市，在小城市


（插图：老牛）

开发品质楼盘。后来房地产市场集中出现的烂尾，也是和这一波下沉市场的爆发有关系。

中小城市空置率远大于大中城市，这是基本的常识。这可以从房价上得到佐证，中国房价最便宜的城市分别是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一望而知，这都是黑龙江省的城市，天寒地冻，资源枯竭，这些城市正经历着人口移出。其余房价低廉的城市，诸如石嘴山市、朔州市、张掖市，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也是人员外迁的区域。中小城市人员流出，若再叠加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城郊农民上楼，就会产生大量的多余房产。鹤岗成为中国第一个财务重整的城市，取消了基层公务员的招聘，就是因为没有了土地财政的资金流入。

注定要减记的房子

房子盖多了，其实并不是问题，只要有人口持续流入，能够形成产业和社区生活，看似闲置的房子很快就会有人住，社区生机勃发。环绕北京曾经火热的大开发，很多楼盘就是在农田上拔地而起，无交通配套，商业配套更是匮乏，房子交付后，来自北京的购房者根本无法入住。房租说明了一切，在香河的一些小区，两居室的毛坯房房租只需300元，装修后的加500元，同等面积的房屋，在北京市区房租至少要乘上10倍。

仅凭着距离北京近，开车出行似乎都能值回租金差了，可问题是交通拥堵，进北京要经历检查站，排队检查的时间并不确定。多条高铁修通后，更远区域的郊区通勤都更加便利，通勤成本也更低。那些农田上建起的高层楼宇，建筑标准其实很高，社区绿化和内部的公共区域配套都对标高档楼盘，可建好了无法住，沉淀了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资产，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浪费。

环京楼市的商品房，位于京津之间的永清跌得最多，房价从最高22000元/平方米跌到了六七千元/平方米，原因就是这里远离京津间的交通联络线。不过处于交通干线上的武清或廊坊也并没有多好的表现，价格也是近乎腰斩。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小镇燕郊，房价最贵曾接近4万元/平方米，现在均价1.5万元/平方米。这里也是法拍房集中的区域。因离北京近，燕郊的空置率并不高，站在北京与河北的界河潮白河边向对岸望

过去，城市璀璨万家灯火。那些距离稍远的地方则是完全不同的情景，夜晚也是黑灯瞎火的。

县城里的高楼

那些国土腹地县城里的房子，也是近10年内如雨后春笋一般野蛮成长起来的，支撑它们的是一代人对家的冀望。县城房地产的商业逻辑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的婚房，而这又和适婚人口的性别比例有着直接的关系。村镇上的人要结婚，风气是得到县城买房，县城有房，才能在婚姻“市场”上加砝码，才有话语权。可买了房以后，县城没就业环境，年轻人还得辗转到更大的城市。那个县城的楼房，加上乡下的老家都会长久闲置。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乡土，以县城公寓房的方式存续着，很多家庭资源也这样沉淀下来，变成无效资产。

三、四线城市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摩天大楼？原因就在于建筑管理部门对楼宇建设的管理，30层左右百米以下为高层建筑，超出百米为超高层建筑。超高层在建筑模式、消防、抗震等方面的标准较高层建筑要高，且要求设置避难层、停机坪，成本一下高出很多。故而，无论是地方政府拍卖土地还是开发商盖楼，都倾向于利用最少的土地，获得最高的附加值，也就是在高层和超高层的分界线下开发房地产。如今，即便是在规模很小的县城，那些30层的大楼也比比皆是，可到了晚上没有几户亮灯。

楼房，尤其是高层住宅，本来是城市居住的一种高级形式，是建立在购房者相对富裕的生活水平上的，公共区域需要有专人打扫卫生，维修设施，冬日里的取暖则是整栋楼的公共消费行为。甚至社区的维护和治安，乃至教育环境都需要全体居民协商，共同营建。一旦居住比例不能达到一定程度，公共设施就可能因缺乏维修而废弃，社区生活也难以正常运转。在很多城市行走，满目所见，已经出现了很多凋零或正在凋零的小区。

日本有800万套房子空置，甚至房子没有人继承。那里多是“一户建”——一栋栋建在私有土地上的别墅样的小房子，即便长久空置，除了影响观瞻，也不妨碍什么。可如果是楼房，是那种高大的摩天楼，一个家庭的窗户破裂了不去维修，整栋楼便会受到影响。实际上，在东北，已经有房东不堪忍受冬日的采暖费用，即便赔很多钱也要卖掉多余的房产。

从“露天监狱”到战火加沙

记者 · 吴淑斌 程靖

自10月7日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目前已导致双方超过9000人死亡。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超过8000人。

过去75年历史里，冲突和战争一直是加沙地带的常态。近10年来，哈马斯治下的加沙经济濒临崩溃，却因中东热点转移、巴以冲突被国际社会边缘化，出现了罕见的“平静”状态。生活在加沙的人们得到一点喘息机会，开始在夹缝中规划自己的未来。这次大规模战争打破了短暂的“平静”，让脆弱的加沙几乎走向崩溃，也击碎了普通人对未来的微小希望。

无处可逃

“对不起，过去24小时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电只来了30分钟，我们家有30个人，都靠这一个电池。日落时分，天快要黑了，以色列轰炸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的家。朋友和丈夫、孩子去了医院，逃过一劫，但她的妈妈和妹妹都死了，丈夫的父亲也死了。那个妹妹才17岁，刚刚通过巴勒斯坦高考，她特别聪明，以后想做一个医生。”

失联24小时后，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终于在当地时间10月23日傍晚给本刊记者发来消息。30岁的阿伊莎是巴勒斯坦人，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市。她的情绪低落，为刚刚死去的邻居悲伤，为幸存的朋友担忧，也为自己一家人没有水和面包而焦虑。为了转移注意力，阿伊莎和记者聊了半个小时关于摄影展、爱情和伴侣后，情绪刚刚有些放松，气氛又陡然变了。

“就在刚刚！又一次空袭！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就连这种（轻松的）时刻都要被毁掉！大家都很害怕，刚才那次空袭很厉害！”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0天。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向以色列发射了几千枚火箭弹，哈马斯武装人员还在边境一场音乐节上杀害了270人。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发起代号“铁剑”的猛烈攻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一份简短的电视声明中称：“将动用其全部力量





（视觉中国 供图）

10月29日，巴以冲突已持续23天，受伤的儿童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医院接受治疗



巴勒斯坦人正在检查受损的建筑物。这次战争的轰炸密集、随机、猛烈

摧毁哈马斯，我们将打击到底。”

以色列的轰炸从10月7日开始。和以往不同，这次战争的轰炸密集、猛烈、随机，让人毫无准备。一位生活在加沙城的记者萨娜·卡玛勒（Sanaa Kamal）告诉本刊，10月7日开始的三天里，“我们一直在承受以色列的持续轰炸，几百次轰炸。第一天轰炸时我出去做报道，当我回到自己的街区时，我们的街区几乎完全被毁掉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街区，有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办公室，还住了很多上班族、记者和工程师。这里没有武装分子，为什么要炸我们这里”。阿伊莎还目睹了一种名为“火带”的新方式，可以同时轰炸同一社区的几栋房屋，仅一次空袭，就足以摧毁整个街区。

炮火之下，许多人被迫离开家，试图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今年40岁的海塔姆（Haitham）是一位在公益组织工作的农业工程师，战争爆发以来，他已经被迫迁移了两次。海塔姆和家人原本住在加沙北部的街区，10月10日那天，他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撤离警告电话，“轰炸和导弹正在接近我们，传来的声音非常恐怖”。海塔姆和家人收拾了最重要的物品，还带着一袋药品，转移到加沙城里的祖父家。那里没有电、水、网络，他们只能买到少量食品，满足孩子和老人的需要。

只住了两个晚上，海塔姆又不得不离开这里。10月13日，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要求加沙北部约110万居民在24小时内全面撤离到南部，因为他们即将发动“重大军事行动”——这被认为

是强烈的地面进攻即将到来的信号。

海塔姆和家人只好继续往南边走，这一次，转移的人里增加了他的父亲、兄弟一家，共13个人。一路上，看不见尽头的车辆队伍从北向南行驶，车辆的顶部堆满了床上用品和床垫，路上还有背着行李打算搭车的行人、后车厢挤满人的大卡车。他们来到南部汗尤尼斯的亲戚家，这里已经接收了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这是如今大多数加沙家庭的常态。阿伊莎的家里接纳了来自北部的哥哥、姐姐两家人，原本只住4人的房子挤进30个人。

然而，加沙南部也无法真正远离炮火。海塔姆告诉本刊，10月24日那天，“汗尤尼斯的爆炸持续了一夜，有一条‘火带’，我们不知道爆炸具体发生在哪里”。同样在24日，阿伊莎住在南部的表姐一家人因为空袭全部遇难，“以色列的炸弹还没用完吗？不是说南部是安全的吗？他们炸掉的一栋房子里有几十个人”。

“加沙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人们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更安全。”32岁的加沙摄影记者罗斯迪·萨拉杰（Roshdi Sarraj）告诉本刊，在一次外出拍摄时，他目睹了一支疏散人员的车队遭到空袭，造成至少70人死亡。战争刚开始时，萨拉杰位于加沙城中心的公寓就被摧毁了，但他和妻子、1岁的女儿并没有离开，只是住到另一个街区。“我和家人决定留下来。只要以色列还在攻击，就没有地方可以幸免。”

一部分惊恐的人们躲进医院里，希望可以躲避轰炸。“医院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特别受保护设施，任何病人都不应该在医院病床上被杀害，任何医生都不应该在试图拯救他人的同时失去生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共关系干事克里斯多夫·汉格（Christoph Hanger）告诉本刊，在加沙，他们的团队看到“数千人无处可去，正在医院寻求庇护，就睡在医院的楼梯间里，即使建筑物的墙壁因为爆炸而不断摇晃”。但在10月17日夜间，这种“最后的底线”也被击穿——自称“最动乱地区的和平天堂”的阿赫利医院遭到轰炸，造成约500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医生。

物资短缺

接受采访的那几天里，萨拉杰的周围总是一片嘈杂，人的呼喊声、汽车的轰鸣声、机器运转声常常淹没他的谈话。萨拉杰解释，他正在加沙城一座医院旁边拍摄新闻照片，看到伤者源源不断地被送过来，“医院的情况是灾难性的。（病人）数量增加如此之快，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和医生，也没有燃料和医疗用品来提供服务。医生告诉我们，他们试图在医院走廊里进行手术，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了。”加沙地区一位卫生部官员称，医院太平间已满，甚至需要用冰淇淋车来存放尸体。

医疗系统已经濒临崩溃。加沙城医院的医生尼达尔·阿贝德（Nidal Abed）在美联社采访中说，由于缺乏干净的水、发电机燃料和必要药品，他只能用“找到的任何东西凑合”：用衣服做绷带，包住大面积烧伤处；用商店里买来的食用醋做消毒剂；用缝衣针做手术针。由于没有足够的抗生素，他无法为严重细菌感染的患者提供完整的治疗，只能开一些药片。更大的问题是，电力紧缺之下，一些医院的灯已经熄灭。在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甚至只能由护士和助理将手机举在手术台上，用手电筒帮助外科医生做手术。

不只医院，整个加沙地带的水、电和生活物品都在全面告急。10月7日，以色列能源部长宣布，已签署命令要求以色列电力公司切断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

从2007年哈马斯武力控制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货物、燃料进出加沙都必须通过以色列的检查站。和平时期，加沙50%的电力由以色列提供；加沙拥有一座柴油发电厂，占供电量的25%，其余电力通过各种屋顶太阳能光伏板和私人柴油发电机产生。而电力直接影响供水，加沙地带的水务部门表示，该地区三分之一的饮用水依赖以色列提供，其他水源包括地中海的海水和地下含水层，经过海水淡化厂和处理站进行去污后食用。没有足够的燃料和电力，加沙就无法得到干净的水。

即使没有战争，加沙的供电和供水情况仍然

糟糕，艰难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萨拉杰回忆，大部分加沙居民每天最多能从主电网获得6～8个小时的电力供应，其他时间只能“各凭本事”。用水情况更是糟糕，很多地区的居民甚至无法从水龙头里得到干净的水，“这直接让他们患上各种疾病”。战争爆发后，幸运的人们每天能有两三个小时的供电，否则是长达好几天的断电。海塔姆曾发来一张照片，一个插排上插满了十几个充电器，这是家里偶尔来电时的情况。在本刊的采访中，身在加沙的采访对象只能断断续续回复消息，随后就是漫长的“失联”，因为网络也时有时无。

每天，加沙人要操心的事情是如何获得干净的水和食物。23岁的哈立德·阿莱曼（Khaled Rahman）躲在加沙南部的亲戚家里，和17个人生活在一起，他告诉本刊，水龙头几乎干涸，每天能流出的微弱水流不超过30分钟，他们只能到离家三公里的一个教堂里领取救援组织提供的干净的水，因为商店早已断货。“每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弟弟把厨房里五个瓶子挂在身上，去教堂排队。不管我多早到那里，都有好多人在排队。”哈立德说，家里的水由几位女性长辈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一小杯，“我们不敢喝光所有的水，万一明天没有了呢？洗澡、冲厕所更是困难了。好在我们喝水太少，也不太上厕所。至于食物，那是我的父亲和叔叔负责排队的事。”

各方斡旋下，以色列终于同意让部分物资从埃及一侧的拉法口岸进入加沙。以色列媒体称，截至当地时间10月26日，共有2批、共计74辆运送水、食品、药品的卡车向加沙地带运送物资。这只是杯水车薪，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加沙地带每天需要100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克里斯多夫告诉本刊，红十字会已经为加沙调动了60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需要一个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让援助持续进入加沙，否则我们将目睹更多的伤亡、痛苦，更可怕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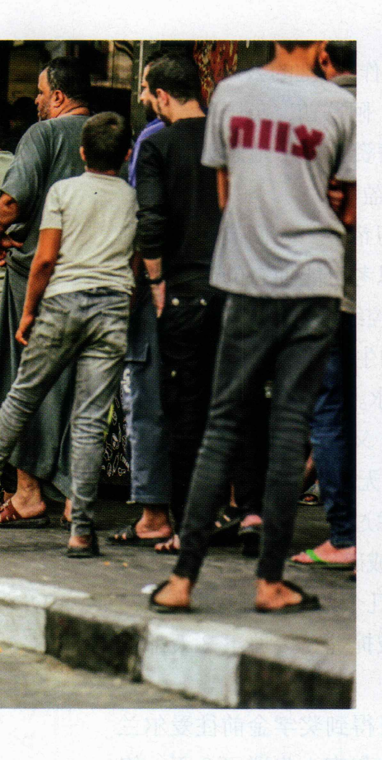
每天，加沙人要操心的事情是如何获得干净的水和食物。



“希望”破灭

在描述糟糕的战况时，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向本刊记者强调，“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不是10月7号才开始的”。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建国，加沙地带就开始了长达75年的“悲剧”。

出生于1965年的加沙人马哈茂德·达赫尔（Mahmoud Daher）经历过三次中东战争、几次加沙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武装冲突。达赫尔的父亲是加沙本地人，母亲一家来自内盖夫沙漠中部城市（现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母亲生活的村庄人民被以军驱逐，一家人逃到了加沙。在达赫尔58岁的人生里，对加沙的记忆是一串数字，都是战争和轰炸频发的年份：1997、1998、2000、2005、2009、2012、2014……至今，达赫尔还能记得自己两岁时跟着父母四处躲避以军空袭的场景，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一枚来自以色列的炮弹击中海滩，杀死了四个正在海边嬉戏的小男孩。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巴勒斯坦人在排队购物。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当局切断了对加沙的电力供应，禁止货物出入加沙

右图：10月24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向人们提供食物。以色列媒体称已有74车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只是杯水车薪

“再没有哪里的海滩比加沙更美，人们在这里奔跑、晒太阳。”采访中，萨拉杰多次提起加沙的海滩，这是加沙人民少有的娱乐场所，中国摄影师李亚楠2019年到访加沙时，看到夜幕降临后，加沙人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滩上搭起。不过，这片海滩也曾在以色列的严格管理之下——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以色列对海滩实施宵禁，每天晚6点至次日早6点钟，任何人不得进入。

2007年，以色列封锁加沙，不仅在北部和东部设置了由混凝土隔离带、缓冲区、瞭望塔和重兵把守的边界，海上也仅允许渔民在6～15海里的范围内捕鱼。电力供应不足、轰炸频繁、建筑材料输入受限，加沙当地无法发展大型工业，而最肥沃的农田也位于边境禁区，农民无法耕作。加沙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约旦河西岸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2022年，加沙年均失业率达39%，青年和女性失业率超过67%。

“在加沙，死亡像呼吸一样平常。”中国战地记者周铁君在2002年至2004年常驻加沙，见到了加沙人与以色列军方之间的暴力循环：激进分子发射火箭弹或发起自杀式袭击，而以色列用轰炸、推土机推平加沙房屋的方式作为报复；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葬礼上，民众情绪激愤，又会开启下一轮循环，而发起袭击的不少人都目睹过亲人被杀害。周铁君告诉本刊，以军常常试图定点清除躲在居民楼里的哈马斯成员，这很容易误伤普通人，“我租房时，也会让保安帮我留意楼里新搬来的人，可别是一个哈马斯的高官”。在《中东死生门》一书中，周铁君也曾提到，哈马斯在加沙并非没有争议，但因其在加沙承担了许多社区运营责任，即便视哈马斯为动荡之源的巴勒斯坦人，也对其感情复杂，或是不敢公开批评、怕招惹哈马斯。

不过，2014年加沙战争过后，除了2018年、2021年两次局势升级外，加沙地带出现了罕见的短暂“平静”。哈马斯与以色列间的小规模交火不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战争。外界认为，随着世界主要力量的战略改变，巴以问题被国际社会边

缘化，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热点从巴以问题转移到伊朗与沙特的大国对抗。在周轶君看来，虽然这意味着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并不算太糟糕，“政治解决没希望了，至少日子是平静的吧”。

人们在夹缝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开始对未来有了规划和期待。阿伊莎就是在这样的“平静”中回到加沙的。她曾拿着奖学金在土耳其留学，但在2021年2月选择回到加沙的家人身边。回国两年半，她做过兼职英语教师、为国际公司提供英语演讲培训、为加沙私营企业做调研。10月11日，阿伊莎的一位学生发来信息：“老师，今天夜里12点后可能就没网了，如果这是我给你发的最后一条消息，我想告诉你，你真的很棒。”收到这条消息，阿伊莎开心起来，“我认为我做老师还蛮成功的”。

她还在今年9月参加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UNRWA）的英语翻译岗位考试。UNRWA是加沙仅次于哈马斯的第二大雇主，在教育、医疗、援助和行政等分支机构里雇用了1万多名加沙人，是加沙人“挤破头”也要争取的理想工作。阿伊莎和另外5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她的笔试成绩不错，战争爆发之前，她一直在等待面试邀请。

哈立德也在2023年初回到了加沙。他在大学里一直学的是教育学和青少年心理学，希望能为加沙的教育做点贡献。“巴勒斯坦人很聪明，也很重视教育。但在加沙，孩子们的教育很容易中断，有时是因为建立和运营学校的国际组织资金不足，有时是一次轰炸毁掉了学校。我能做的不多，可以当一名老师，在特殊情况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上简单的课。否则一旦离开学校，他们就很难再回去。”

另一位24岁的加沙女生玛拉姆·萨拉赫（Maram Salah）在今年春天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一家人才库，帮助加沙年轻人匹配到国际企业。这种灵感来自玛拉姆自己的经历。在加沙一所商学院读书时，她曾为本地一家数字营销机构免费打工，毕业后成功找到了一家沙特企业的远程兼职工作。她发现这是一条可行之路，“现在许多加沙毕业生会参加代码、网页设计、市场营销的在线培训，找远程工作”。她的公司已经帮助10名加沙人找到了沙特、阿联酋、英国和约旦河西岸的远程工作。通过薪资抽成，她想让自己的项目逐步运转起来、实现盈利。

但战争打破了这一切希望。人们被无止境的死亡恐惧包裹着，无暇思考可能拥有的未来。10月21日，阿伊莎带着哭腔给本刊记者发了语音：“我还活着，但现在每天的生活是一家人为了喝水、冲厕所和洗澡而到处找水。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的事业理想怎么办？”又过了3天，阿伊莎已经没有心思关心自己遥遥无期的面试，“如果再不停火，我可能会因为思虑过度而死去。我们能活下去吗，会死吗？会被炸成碎片还是留个完整的？会和家人一起死，还是留几个人面对剩下的人生？如果我们家被炸了，会被掩埋在废墟下3天都没人来找我们吗？”

而玛拉姆在今年9月得到奖学金前往爱尔兰攻读硕士。战争爆发，她和家人失联了9天，终于在10月16日重新取得了联系，“我感到无助，只能尽我所能与他们保持联系。以色列炸毁了加沙唯一的电信设施，切断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炸了我们的家、杀了我的猫。9天的折磨，我以为我失去了家人！（今天）我们联系了40秒，听到我妈妈崩溃的声音，告诉我他们还活着”。

离开，还是留下？

不太了解加沙的人很容易发出疑问：为什么不离开加沙？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忍受折磨？

一个直接的现实原因是，人们很难逃离。加沙地带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从2007年被以色列封锁之后，除非获得以色列颁发的出境许可证，否则巴勒斯坦人被禁止离开加沙。原则上，以色列允许以下几类人离开：医疗和人道主义参与者；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的学生；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个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和外国新闻界人士。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流程漫长、烦琐，常常会毫无理由地被拒绝。哈立德将其描述成“一

场折磨”，他曾经在2021年前往欧洲留学，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最终获批。他带着入学通知、奖学金证明等材料前往民政大楼提出申请。“那里人好多，每个人都有迫切需要离开的理由，和工作人员大声述说自己的苦难：病痛，或是在西岸的亲人即将去世。”哈立德等了三个月也没有得到回复，此时距离开学只剩一个月。他给大学发邮件请求帮助，“但我也无法清楚说明离开加沙的审批是如何运作的，这个过程并不透明”。学校愿意帮助他，但结果如何“取决于运气”，幸运的是，哈立德最终离开了加沙，只是延迟了一个月报到。

拿到批准后，经由以色列的埃雷兹检查站出境又是漫长的过程。周轶君曾经见过前往以色列打工的加沙人是如何过境的：凌晨四五点，他们从家里花十几分钟赶到检查站排队，然后开始长达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等待被盘问、检查。如果边境发生了冲突，或是以方认为“有危险”，等待时间可能延长到五个小时，甚至临时关闭检查站，不再允许通行。

离开加沙的人像闯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自由地用水、用电、看电影，可以和各国的人交流。”在欧洲留学时，哈立德慢慢学会放心地接听手机，“不用担心这是不是轰炸警告”。2019年，因为工作调动，达赫尔和妻子迁居土耳其。刚离开加沙不久，达赫尔每次旅行前都担心自己是否需要提前4小时去机场，然后才反应过来，这里不再需要花3个小时通过检查站。“在土耳其，我第一次开车17个小时、1000多公里！这是我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在加沙，我能开的最远距离就是40公里。我被封闭了太久，请你想象一个离开监狱、走向自由的人的感觉；我从笼子里走出去，环顾四周，看到了笼子之外的空间。而这不光是我自己的生活，这是加沙200多万人民的生活：要么逃离并得到自由，要么在监狱里慢慢地死去。”

也有人主动选择留下来。摄影记者萨拉杰出生在英国，当时，他的父母正在英国留学，学业结束后带着年幼的萨拉杰一起回到加沙。“我永远不会离开加沙。许多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是从别的地方被驱赶过来的，我们本来就是自己土地上的难民，还要继续流浪吗？如果有人占领了你的土地，你就要继续反抗直到重获自由。”萨拉杰告诉本刊，身边有许多朋友曾经试图离开加沙，到别的国家定居，最后还是回到这里，“他们回来后说，没有哪个地方像自己的家园一样，有这么美的海滩”。

在加沙，萨拉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媒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了十多年，如今是一家媒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被许多国际媒体称为“中东的眼睛”，向世界报道中东尤其是加沙局势。10月17日，萨拉杰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超过12名记者被杀，由于爆炸以及电力和互联网中断，加沙缺乏媒体关注。然而，我们仍在努力报道，以便世界能够看到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萨拉杰告诉本刊，他曾经报道过2012年、2015年和2021年发生在加沙的战争，这一次是“最糟糕的一次，他们攻击加沙的每一个平民，占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

战争开始以后，萨拉杰始终留在被轰炸的街区、医院等各个地方，还帮忙徒手从废墟下挖出被掩埋的伤者。因为网络和电力限制，萨拉杰每天只会回复一次消息。10月22日，在一所嘈杂的医院里，萨拉杰发来消息告诉本刊，在这次战争中，他失去了一位同事，一位只有21岁、非常专业的摄影记者，“他有非常灿烂的笑脸和美丽的灵魂，梦想成为一名报道世界各地新闻的国际记者。当时，他戴着头盔、身穿印着‘记者’的服装在现场报道，轰炸就这样发生了。还有两位同事失踪，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们是否活着”。

发完这条消息后，萨拉杰再也没有“已读”消息。也是在那一天，以色列轰炸了萨拉杰家所在的街区，他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成为第19名遇难的巴勒斯坦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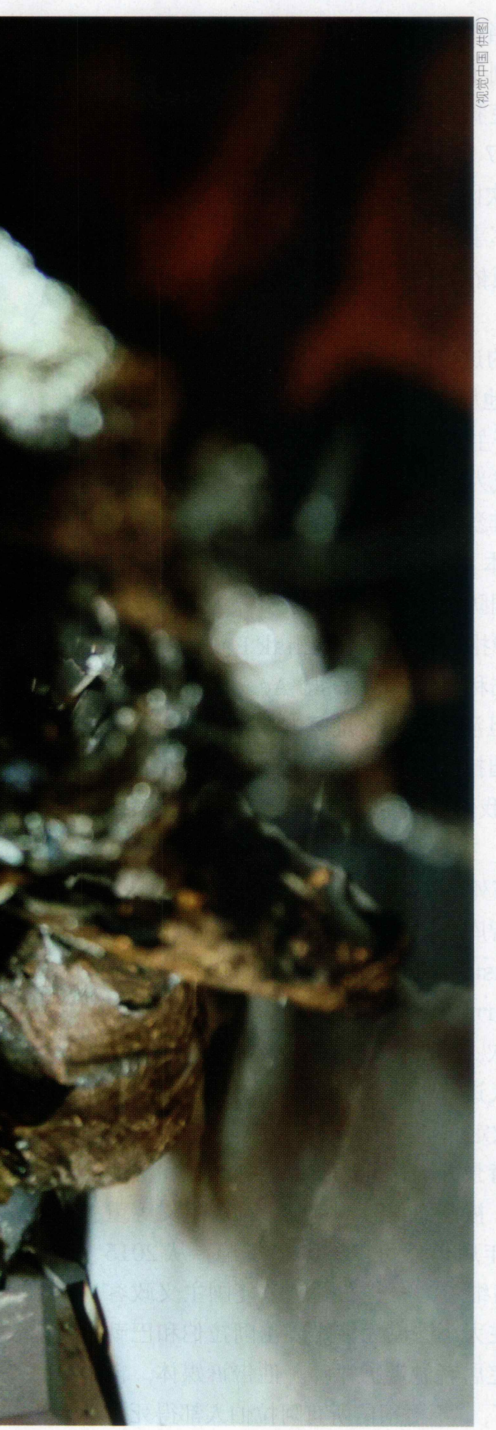
（感谢周轶君、李亚楠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实习记者覃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被封闭了太久，请你想象一个离开监狱、走向自由的人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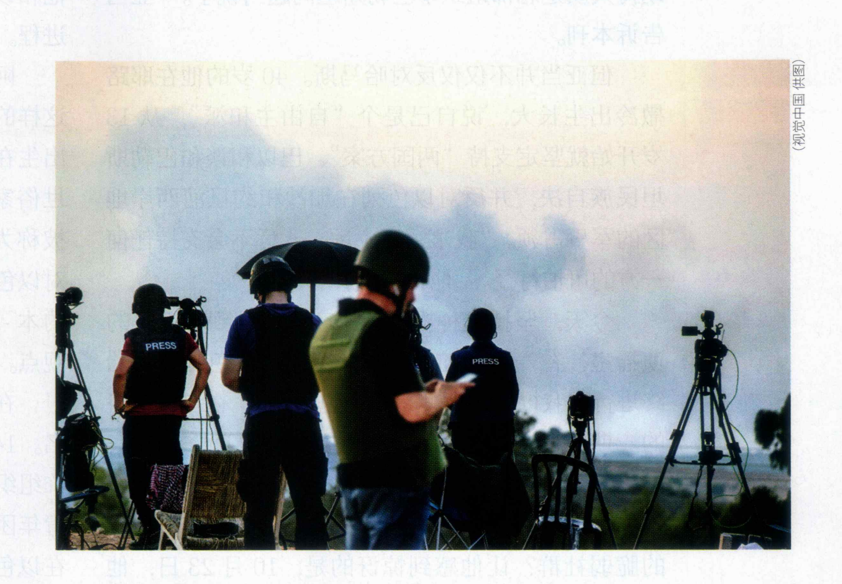
战火引线："右转"的以色列

记者 · 余物非　编辑 · 徐菁菁





（视觉中国 供图）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10月17日，在加沙边境附近的比耶里农庄，以色列军队成员在检查破坏情况

右图：10月28日，加沙东北部拜特哈农城区遭轰炸后，冒起浓烟。战地记者在远处拍摄

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前，以色列的对巴勒斯坦政策，正在日益走向单边化，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日益壮大的极右政治党派和犹太教极端势力。当以色列在中东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逐渐站稳脚跟，其壮大不仅威胁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社群，也让这场加沙战争前的以色列陷入动荡、分裂和危机。

多战线战争

当地时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突袭，将200多人作为人质带回了加沙地带。事发后24小时内，在特拉维夫一家电视台担任记者的亚当就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推动解救人质的民间组织“立刻带他们回家”（Bring Them Home Now）。

从10月8日开始，亚当在新闻演播室和志愿者办公室“两边跑”。被当作人质的200多个人来自100多个不同的家庭，这100多个家庭中有95%通过“立刻带他们回家”跟国际上的政客、法律专家、权威人士等沟通联系，亚当在组织中负责国际战略。在他的斡旋下，英美法意等欧美国家的立法者和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与家属见面，包括梵蒂冈教廷和罗马教皇弗朗西斯等国际组织和个

人在公开场合为释放人质发声。“人质中有 9 个月大的婴儿，4 岁的女孩，135 位女性中有 30 多位超过 60 岁，十多人超过 80 岁。这早就不是军事冲突了，劫持人质是恐怖组织拿巴勒斯坦问题当幌子。”亚当告诉本刊。

但亚当并不仅仅反对哈马斯。40 岁的他在耶路撒冷出生长大，说自己是个“自由主和派”，从 13 岁开始就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巴以和谈和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并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军事占领。“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支持任何一方的可怕行径。”他补充道。

今天，坚持这种立场并不容易。回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在麦克风前，亚当表示坚信以色列应“始终进行自我批评，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在自己主持的一期节目上，他批评内阁成员，并质问作为嘉宾的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为什么更多的兵力被投入保护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而不是加沙边境周围的脆弱社群？让他感到惊讶的是，10 月 23 日，他被这家供职了四年的媒体辞退，原因是高层认为“战时冒犯性言论”可能引发军队和国内观众的不满。“在民族主义情绪爆棚的战时，以色列正在失去听到不同声音的耐心。”亚当说。

自从哈马斯的突袭后，因“求变”言论而被起诉的人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成立四年多的某巴以冲突和平促进计划项目的负责人阿米告诉本刊，该项目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有约 600 位志愿者，其中数百人因为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场合发布争议性信息被解雇，理由都是“支持哈马斯，煽动反对以色列的力量”。“但实际上，当你查看帖子和人们写的内容时，会发现内容大多要柔和得多。人们只是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同情。”阿米补充道。

把所有人当作敌人的情绪，在此次战事打响后，也在被政策激发。10 月 10 日，袭击后的第三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 - 格维尔（Itamar Ben-Gvir）宣称他的国家安全部已经购置了超过 1 万支枪，连同头盔、子弹和防弹背心分发给了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 - 犹太人混居城市的犹太居民，以及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犹太住户。

随着以色列境内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裔公民和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抗议对加沙的空袭和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本 - 格维尔在 10 月 27 日说，以色列正在经历一场“多战线的战争”，他支持“让警察直接射杀”阻挡公路和城市入口的示威者并免除其责任。他和以色列司法部长已经决定加快这一政策的立法进程。

阿米和亚当都担心，突发的战事让本 - 格维尔这样的政客找到了机会。1976 年春天，本 - 格维尔出生在由伊拉克犹太移民和库尔德犹太移民组成的世俗家庭。1987 年至 1993 年，巴勒斯坦人发起了被称为“第一次因提法达”（First Intifada）的反对以色列长期军事占领的抗议和暴动。当时，12 岁的本 - 格维尔皈依了犹太教，也开始接触右翼政治观点。

在极右翼的这条路上，本 - 格维尔可谓少年成名。14 岁时，他加入了后来被以色列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卡汗主义运动”（Kahanist Movement）青年团并逐渐成为团长。“卡汗主义运动”向来支持在以色列建立非犹太人不得拥有投票权的犹太教权国家。18 岁，本 - 格维尔由于参与极右翼运动的背景而被以色列国防军禁服兵役。19 岁，为了抗议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签署完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Oslo Accords），承认巴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控制，本 - 格维尔从拉宾的凯迪拉克车身上卸下装饰品，并对着电视镜头宣称：“我们到他的车旁边了，我们也将去找他。”三周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被右翼激进犹太主义分子用手枪打死。

耶路撒冷智库“以色列民主研究中心”（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塔玛尔·赫尔曼（Tamar Hermann）告诉本刊，本 - 格维尔被起诉过 150 多次，其中有至少 8 次被定罪，罪名均与针对阿拉伯人进行种族主义煽动和支持恐怖组织相关，最近一次定罪是在 2007 年。

但这样的背景并未让他远离以色列政坛和法律界。在以色列，被定罪谋杀、贪腐、种族主义等重罪的公民在 7 年后仍然可以参政和备选。从 2015 年开始，本 - 格维尔为一些右翼宗教复国主义政客担任助理，并在大小法庭为涉嫌袭击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定居者做辩护律师。他告诉媒体，自己变得更温和了，“不再相信所有阿拉伯人都得死”，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1989年，“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一位身份不明的司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被拦截检查

下图：2023年5月18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带领犹太定居者们经过耶路撒冷老城区



(视觉中国 供图)

2023 年 10 月 28 日，被哈马斯武装劫持的人质家属在特拉维夫抗议以色列政府，希望官方想办法让他们与家人团聚

也因此与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决裂。赫尔曼说，这些言行让本 - 格维尔从极右翼人士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可能拿到选票的那一个。

去年 11 月，作为信奉犹太至上主义的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党魁，本 - 格维尔跟随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组建的政治同盟赢得大选。据《纽约客》杂志报道，在这场选举中，出于安全政策方面的考量，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军人将选票投给了本 - 格维尔。

今年，刚在国家安全部长任上履新不久的本 - 格维尔突访了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颇具争议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圣殿山（Temple Mount）。此地被穆斯林称为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Al-Aqsa Mosque Complex）。跟随他的脚步，犹太定居者和极端分子还闯入了耶路撒冷古城的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这一行为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抗议，以色列军队和民兵组织随之开始了镇压。

截至 10 月初，以色列今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总共杀害了 240 多名巴勒斯坦人，为历史新高。此外，定居点的扩张也在加速，今年已有至少 700 座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被犹太定居者拆除。以色列国内媒体报道称，在本 - 格维尔上任国安部长负责边防和西岸事务后，犹太定居者可以焚烧、抢劫甚至谋杀而几乎不用遭受任何惩罚。

赫尔曼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观察以色列内政与社会民调结果。随着几轮巴以和谈屡屡失败，像亚当和阿米这样的自由主和派已经越发式微，社会的右倾让宗教保守势力越发强大。赫尔曼指出，宗教保守势力的崛起并非空穴来风。“从以色列建国以来，生存的危机盖过了很多其他分歧，其中包括宗教与世俗的分歧、不同来源地移民信念的分歧，以及阶级的分歧。”赫尔曼说，“我想说，这些分歧的集中爆发是以色列民主的悲剧。”

保守化的暗流

1952年，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与当时的犹太教正统派“哈雷迪派”（Haredi）代表人物哈宗·伊绪（Chazon Ish）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

本-古里安问宗教领袖，教俗如何在新国家共处？哈宗伊绪回答，丢弃了犹太教传统的世俗犹太人要给虔诚的犹太教徒让路。本-古里安反问哈宗伊绪：你所反对的那些不信教的犹太士兵正在守卫边境、保障生命，他们不正是在践行犹太人在“应许之地”定居的诫命吗？哈宗伊绪说，士兵能活着，多亏了教徒们学习“妥拉”（Torah）。“妥拉”是犹太教律法和教导的统称。最终，两人未能达成共识。

在不同时期，以色列这片土地接受了来源地各异的犹太移民。本-古里安出生在今波兰境内，以他为代表的来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西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大都接触过自由、平等、民主、民族自决等价值观念，远离了正统的犹太教传统。在反犹主义的催化下，“犹太复国主义”在这一群体中兴起。20世纪初，他们回到如今以色列境内建立“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场，也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成为经济和国防建设的主力军。而哈宗伊绪所代表的“哈雷迪派”大都来自起源于东欧的现代犹太经学院，在早期的“西方犹太人”群体中是少数。

从1948至1951年，中东战争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排犹运动”使得超过30万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东方犹太人”（Mizrahi Jews）移民以色列，也让来自亚非的人口从建国初期的15%上升到37%。本-格维尔家族就来自伊拉克，而伊拉克的犹太人在中东已经生活了超过2000年。激化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矛盾，使得他们和邻居关系变得紧张。“他们大都是比较传统的、信教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不是出于理想，不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移民。”北京大学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宇告诉本刊，“这些人像白纸。但由于他们本身比较偏传统，宗教理念比较强，所以他们更容易进入哈雷迪的体系。”

本-古里安勾勒出世俗的“犹太-民主国家”的框架，对虔诚的犹太教徒做出了重大让步。在所有成年犹太人都需要服兵役的以色列，国父免除了400位犹太经学院（Yeshiva）学生的兵役义务，但要求这些人必须成为职业经学者。后来，能获得这一豁免的人数被提升到800人，而且到1974年，每个哈雷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就能多获得一笔政府奖励。“在建国初期，以色列势力弱小，也不知道战争打出来是什么结果，”王宇指出，“保留这些经学院，就好像保留了犹太民族的火种。”

在建国后的30年，以色列历经四次中东战争，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让位于国家生存的当务之急。“西方犹太人”对“东方犹太人”长期保持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权。塔玛尔·赫尔曼说，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期逃离东欧来到以色列，一家人生活拮据。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为以色列“西方犹太人”家庭提供了赔款，她的父亲拿到这笔钱便把它用在了子女教育上，五个孩子最终都拿到了大学文凭，找到了收入不错的工作，实现阶级跃升。

“东方犹太人”由于缺乏类似的经济支持并将主要精力诉诸宗教学习，许多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或进入经学院和犹太教堂工作。这一社会经济现实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以色列工党的长期执政。

这种看似稳定的“中心-边缘”体系在1977年被打破。那一年大选，由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同意与宗教政党组建内阁，第一次战胜了工党。哈雷迪派当时提出共同组阁的条件是取消兵役豁免权人数的限制，贝京欣然接受。王宇告诉本刊，此后工党和利库德轮流执政期间，宗教政党虽然小，但却是天然的“组阁伙”，在签署组阁协议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很少有人愿意触及他们的利益，以免徒增政治前途的风险。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渐渐开始大规模“脱产读经”直到四五十岁。他们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小城的封闭社群也越来越壮大。这里的犹太男性蓄胡子、鬓角处留着一绺头发，通常穿着白衬衫和黑色外套，头戴黑色礼帽或用发夹固定在头上的“基帕”（Kippah）小帽；女性则被要求剃掉头发，戴着假发或头巾，身穿遮盖大部分身体的朴素衣服。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坚持把“妥拉”当作生

活准则，遵循超过 400 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定，比如：犹太人只能和犹太人结婚，吃饭时不能将肉类与奶制品相混合，一年中必须有几天需要节食，等等。社群的日常生活被正统派祭司“拉比”和教法机构“拉比法庭”（Rabbinical Courts）左右着。

与此同时，宗教复国主义思想（Religious Zionism）越发盛行。“卡汗主义”和早期的本-格维尔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Stratfor）在 2022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宗教复国主义政客致力于将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引入学校课程；针对阿拉伯社群，他们希望剥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公民身份，支持定居点的扩张和把阿拉伯人驱逐出以色列，并要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纳入以色列版图。

在 2022 年 11 月的大选中，极右翼的犹太力量党和宗教复国主义党（Tkuma）分别在 120 席的议会中获得 6 席和 7 席。而在 2020 年之前的所有大选中，两党合计获得席位从未超过 4 席。

分析人士指出，这与以色列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密切。一份“以色列民主研究中心”在 2022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9 年哈雷迪派有 75 万人，不到以总人口的 10%。不过哈雷迪派鼓励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平均每个家庭有 6 个孩子，而世俗派犹太人为每家 2.5 个。到 2022 年，哈雷迪派人口达到 128 万，占以色列总人口的近 14%。同年，在以色列全部 20 岁以下国民中，哈雷迪派占到近三分之一，而且当年每两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属于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家庭。相应地，一份 2023 年的民调报告显示，18 岁至 24 岁的以色列犹太人中有 73% 自称属于右翼阵营，而在 65 岁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中，这一数据为 46%。

内塔尼亚胡的选择

以色列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只是在威胁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由于国家的长期大量补贴，哈雷迪派几乎没有必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以色列统计局 2022 年发布的数据，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只有 53%。而在今年 5 月通过的国家预算中，内塔尼亚胡内阁依然决定大幅提升已有的生育津贴和经学院学习补贴，还史无前例地单列出 137 亿谢克尔（约合 33.7 亿美元）用于修缮正统派犹太教堂、改造经学院、为哈雷迪派家庭提供粮票、资助不教授英语数学等常规科目的私人宗教学校等。

“当人们以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不再是主要问题，人们便开始更多地讨论：谁才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赫尔曼说。

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变得越发紧迫。常驻耶路撒冷的阿米住在离以色列议会大厦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安静街区。今年伊始，阿米每次出门几乎都能看到游行人群挥舞着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拯救民主”口号。

今年 1 月 4 日，也就是内塔尼亚胡新一届内阁正式执政的第六天，新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Yariv Levin）公布了“司法改革”计划。计划显示，执政集团希望争取的目标包括：总理的人事任免和政策执行免受司法监督、议会可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定、内阁和议会负责司法机构的人事任免、禁止司法机关对现任总理提起刑事诉讼等。

在以色列由总理主导的“一院制议会”政体中，司法机关是唯一能够限制政府的机构，而所谓的“司法改革”将几乎取消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两位研究以色列政治的学者告诉本刊，由于建国初期的教俗之争和不同地域移民的差异过大，以色列并没有制定宪法，而是以议会一条条订立“基本法”的方式确立了国家的基本框架。由于缺少宪法的制约，自由派和世俗派担心，一旦“司法改革”被通过，右翼和极右翼主导的内阁权力将很难受到制约，以色列则将从一向标榜的“民主包容”滑向集权统治和“教权政治”（theocracy）。

去年 11 月的大选后，从 1996 年开始总计领导以色列 15 年的内塔尼亚胡在组阁时首次排除了中间派和左翼势力，一边倒地与宗教和保守派政党组成联盟。

20 年前，内塔尼亚胡并不待见哈雷迪派。他主张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因而对哈雷迪派获得的补贴嗤之以鼻。两

位分析人士告诉本刊，在2003年至2005年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内塔尼亚胡为了刺激国内劳动力市场，大幅削减了哈雷迪派的生育津贴和经学院学习补贴。2014年，他的利库德集团与中左翼政党组成的同盟在议会通过一项削弱哈雷迪派兵役特权地位的法案，规定以色列国防军需要征召一定比例的哈雷迪派男性，并要求军队在2017年达到60%的配额，否则拥有哈雷迪派成年男性的家庭将面临刑事处罚。

但从2017年开始，内塔尼亚胡本人开始陷入涉嫌贪腐的诸多争议中，并在2019年11月被以色列检方正式提起公诉。在检方向司法机构提供的三份调查文件中，内塔尼亚胡涉嫌收受价值超过100万谢克尔（约合290万美元）的礼品贿赂，通过利益交换换取一些以色列媒体对他的正面报道，并利用职务之便向两家电信和通信公司提供政策好处。以色列也因他的个人丑闻陷入了不到四年就举行了五次大选的政治混乱。

“如果你熟悉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就知道他会做任何事情来维持自己的权力。”电视记者亚当说。以色列管理学院（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in Israel）社会学教授盖伊·阿布特布尔-塞林格（Guy Abutbul-Selinger）长期关注以色列内政和巴以冲突在以色列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他认为，若不是手握13席的两个宗教和极右翼政党加入内塔尼亚胡的同盟，内塔尼亚胡无法通过利库德集团取得的32席再度领导以色列。“他们（哈雷迪派）需要内塔尼亚胡，就像他需要他们一样。”阿布特布尔-塞林格告诉本刊。

以色列最高法院向来是极右翼政党的眼中钉。在2020年，一条议会通过的立法旨在将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但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这令保守派人士和宗教复国主义者们大为不悦。而一场对司法系统的大调整也能让内塔尼亚胡更容易直接干预司法和检查机构针对自己的调查。

强推“司法改革”，以色列由此陷入了空前的动荡与分裂。

从今年1月7日开始，人们挥舞着蓝白色的旗帜聚在街头和广场，以“非暴力”的方式躺倒在议员的住所前，也占领过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和城际高速公路。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示威人数最多的一天超过50万人，规模可谓以色列历史之最。

教授和大学生罢课，商人和工人阶段性罢工。其中最醒目的是数万名预备役军人。他们有的是战争英雄，有的是仍在执行危险任务的飞行员、陆军战士和情报人员。7月末，他们决定不再响应军队号召继续服役。

“如果你希望飞行员在明知自己可能杀死儿童的情况下，还能够驾驶战机向建筑物投下炸弹、发射导弹，那么就要保证他们必须对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拥有最坚定的信心。”以色列特种部队指挥官罗恩·舍夫（Ron Scherf）在8月初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但他不信任拥有本-格维尔这样极端派的政治同盟。“如今，国家的危险来自内部，这是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

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支持预备役军人的抗命决定，随后他们被以色列警方指控煽动叛乱而被调查。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盟友则批评预备役军人已被巴勒斯坦势力渗透。

哈马斯突如其来的进攻，使以色列前途更加变化莫测。战争爆发以来，本-格维尔武装的犹太定居者们在约旦河西岸与手持燃烧瓶和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冲突不断，定居点的扩张并未停止。自从10月7日以来，已有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定居者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平均每天有5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而据人权组织统计，这一数字比过去两年的平均水平翻了两番还要多。另有近千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边境警察逮捕，170多栋民宅被犹太定居者拆除。

“定居者们修建一个定居点，他的邻居会是巴勒斯坦人。定居者要修建一座新的围墙，他们雇用的建筑工人会是巴勒斯坦人。”阿米说，“本-格维尔和定居者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明白，已经有500多万巴勒斯坦人在这里。无论你多么努力地试图铲除他、忽略他，最后你依然在面前看到他。”

（应采访对象要求，亚当和阿米为化名。参考资料：宋立宏，《坚守与妥协：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



粉丝与偶像："拟态亲密关系"的理想与现实

记者 · 孙雅兰

拟态亲密关系是对现实中亲密关系的仿拟，但是一旦粉偶之间缔结了这种关系，其收益和风险是同样巨大的。对学术界和媒体来说，我们也要秉持自己的责任和伦理，也要考虑帮助粉丝发展出自我约束的能力。

从"饭圈"发起的话题再次搅动了社会主流舆论。9月底，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前往巴黎表演"疯马秀"，刺痛了其庞大粉丝群的神经，Lisa在国内的多个粉丝后援会宣布停止更新，大批粉丝表示脱粉。随后，痛骂这位流行偶像"背刺女性"的声音四起，逐渐蔓延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审判"。

"疯马秀"（Crazy horse）是法国著名的裸体表演俱乐部，创作者用丰富的舞台效果展示女性身体，因此被视为女性迎合男性凝视的场所。Lisa本人似乎不太在意外界的声音，演出结束后，她主动在社交网络上公布了表演照，并发文写道："在巴黎'疯马秀'的演出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感谢这一切的发生。只要任何时候有空缺，随时给我打电话。"

2016年在韩国出道的Blackpink，由韩国头号娱乐公司YG打造，四位成员熬过了数年的练习生生涯，成为公司重点推出的唱跳女子组合。其团名Blackpink由两种表示颜色的单词组成——黑色和粉色，意在表达女性的多面性，成员Rose曾解释其中的含义："我们都是小女人，但又都是狠人。"Blackpink甫一登场，便从韩国造星工厂中脱颖而出，其人物妆发造型既甜美又酷飒，电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2019年4月19日，Blackpink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2019年科切拉谷音乐艺术节上表演

右图：2016年，TFBOYS歌迷相聚西安，希望能一睹偶像风采

音风格的歌曲与劲爆快节奏的舞蹈搭配，作品一再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YG为其拓展欧美市场的策略深入，Blackpink很快火遍全球，在YouTube上拥有近一亿订阅用户，是该平台全球订阅人数最多的艺人账号。

一时间，Girl Crush（形容女性对女性的迷恋）风格成为这只女团的强烈标签，其粉丝显示大部分为女性，她们在强大、潇洒、自信的偶像身上投射着有关理想自我的想象。在国内，Blackpink还有“人间四闺女”的昵称，粉丝借此表达对她们的亲密感受。

在走红七年后，经纪公司与组合的合约满期，Blackpink成员的各自去向悬而未决。因此，Lisa前往巴黎表演“疯马秀”的选择，也被人猜测是为即将到来的单飞铺路，但这种探索与她出道后的偶像定位完全不符，从而在粉丝圈中引发“地震”，爆发的争议尤其集中在亚洲地区。就在几个月前，Blackpink的另一位成员Jennie也因参演美剧《偶像漩涡》（*The Idol*）陷入风波，其中的大尺度戏份令她的粉丝倒戈相向，对她“艳舞女郎”的形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一贯以新女性代言人形象示人的偶像组合，在挣脱经纪公司的束缚后，显示出偏离轨道的个人意志，却与粉丝和观众的预设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也再次暴露出造星工业内在的脆弱与危险。

事实上，当造星工业大举攻城略地时，偶像崩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精心塑造的偶像无法再满足粉丝的期待，他们不惜以各种方式发起对抗。青年学者高寒凝曾在分析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时写道：“正如明星需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权方能成为明星，偶像在成为偶像的过程中，所需让渡的就不仅仅是隐私权，还包括自由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权利。倘若一名偶像忽然爆出绯闻或公开恋情，便无疑会对指向该偶像的亲密关系想象构成阻碍，粉丝对此感到不可容忍，亦是常理。”

饭圈正在制造越来越多元的粉丝类型，以投射粉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需求。“女友粉”在偶像身上倾注了对浪漫关系的理想；“妈妈粉”将偶像视为自己的子女，想要守望他们的成长；“女儿粉”将男偶像视为父亲，希望得到对方的指引和爱护；“CP粉”则热衷于想象偶像与其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当偶像的形象崩塌时，粉丝的情感都共同指向了愤怒，背后则是对自我预设崩塌的失望。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丽丽长年专注

粉丝文化的研究，她用“拟态亲密关系”来形容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备情感性、控制性和亲密性特征，反映出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已经深入若干私人领域，进入传统亲密关系的范畴。这在养成系偶像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粉丝经常将偶像称为“儿子”“弟弟”，并深度参与他们在升学、婚恋、事业等方面的抉择。

在长时间的精力、情感、金钱等多方资源的投入下，粉丝希望不断增进与偶像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建立起更牢固的亲密关系。但在朱丽丽看来，这种“拟态亲密关系”并不稳定。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朱丽丽明确地分析了这种关系的缺失：“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信任和理解，即真实的自我表露，但微博等新技术的实现非但没有将偶像们的‘后台’生活展现出来，反而是‘前台’展演的一种延伸，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层人设的外壳之上，这种关系是极不稳定的。”

什么是“拟态亲密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8月TFboys十周年演唱会在西安举办，场面十分火爆。这个十年之约是他们在刚出道时就与粉丝立下的。几年前你就在研究中提到过这个十年约定的重要性，当时有预料到它带来的结果会如此火爆吗？

朱丽丽：经纪公司为TFboys和粉丝打造出“十年”的概念，是将偶像的成长和粉丝的成长牢牢捆绑在一起。粉丝长时间的陪伴，看着偶像从默默无闻的邻家男孩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偶像明星，这样的成长和蜕变是偶像和粉丝共同经历和完成的。在长时间的精力、情感投入下，粉丝对偶像不仅仅是崇拜和喜爱，更是一次次从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粉丝的参与不仅仅是精力、情感的投入，更是金钱、技术、社会资本等多方面的支出，养成过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促进偶像和粉丝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亲密关系的建立更加本质化、纯粹化。

粉丝文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曾置身其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青少年时期追过星。学术界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也持续了30年，这30年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和变迁一直存在，也积攒了粉丝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史和情感史。TFboys十周年演唱会的火爆，也是粉丝文化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粉丝怀旧情绪的爆发，它连接了特定媒介时代的集体气氛和共同情感，跟粉丝个体的记忆和生命情感息息相关。当然，这场大型怀旧也是被制造出来的，资本和媒介联手放大了这种怀旧。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十周年演唱会期间还出现了粉丝之间的应援纷争，不同成员的粉丝为了抢夺场地位置发生“灯牌大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朱丽丽：粉丝社群是一个矛盾同盟群体，他们对外是同盟，对内是矛盾的，饭圈内部一直存在争夺和竞争，比如唯粉和团粉，这也是粉丝“圈地自萌”属性的一部分。这么大的一个社群，如果指望内部话语统一才可怕，我觉得会比现在这种乱象更可怕。粉丝内部的纷争，包括这次TFboys十周年发生的灯牌大战，本质上还是粉丝社群内部的亚文化资本竞争。粉丝们深度认同以消费、应援和数据贡献来评判地位等级的饭圈文化逻辑——即粉丝应该为爱发电、为偶像付出，而粉丝所付出的金钱、创意、精力和时间成本可以转化为粉丝的文化资本，决定了粉丝甚至粉丝团在饭圈内部的等级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用“拟态亲密关系”来形容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似乎这是二者之间最核心的纽带，具体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关系？

朱丽丽：我最早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关注到养成系偶像的“妈妈粉”“姐姐粉”，她们已经深入到偶像的私人领域，关注偶像升学、恋爱、结婚等一系列问题，很像一种亲密关系，所以叫“拟态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有几个特征：一是情感性，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投入，诸如迷恋、喜爱、关心，都是构建拟态亲密关系的基础。二是控制性，以前粉丝只是参与式的陪伴，比如去活动上为偶像“打call”，偶像有什么需求就为他们“发电”，但后来延伸到了干预偶像接什么戏、跟谁谈恋爱、宣传的方式等，甚至是要求偶像换经纪人。粉丝发展出更强的主动性，规训和控制偶像成长道路的意识和倾向更明显了。三是亲密性，粉丝关注的不仅仅是偶像的作品等公共领域，还有他们的私人生活，进入到传统亲密关系的范畴，包括偶像的衣食住行、教育、工作安排、恋爱和成长道路。

在这样的关系中，粉丝不是家人，仿若家人。粉丝分类虽然不同，从自身出发的情感需求却是相同的，对应的是粉丝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需求。

“拟态亲密关系”的理想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粉丝为什么会对偶像产生“亲密关系”的诉求，这其中有什么现实因素吗？

朱丽丽：粉丝文化发展的这几十年，有一些社会结构的变迁值得我们关注。随着社会的变迁，很多原有的社会结构松散了、消失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呈现出原子化的分散状态，青少年时期的他们在社会主流中的话语权很弱，很少有自己可以掌控的领域，同时他们又遭逢互联网的急速发展，有了互联网的媒介机制，就得到了舒张主体性的平台。粉丝文化，其实是原子化社会的一个出口。在孤独的社会中，人们非亲非故，只能通过同样的兴趣连接起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再加上网络平台有意识地制造了热搜榜单、排名系统、超话社群等，网络活动就变成了可以量化的数据，具备商业价值，塑造起一个粉丝培育机制。

以养成系偶像举例，他们的粉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粉丝与成员年龄相仿，都面临中考、高考、朋友、亲子关系的困扰，体验相仿，伴随成长的感受也就更强烈。另一部分粉丝年龄远远大于偶像，偶像的青春活力可以将他们带回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种移情、共情与对青春的追忆、憧憬紧密联系，使他们的情感寄托更为厚重和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在原子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疏离，甚至出现“社交降级”的说法，为什么在粉丝中却会出现对偶像“狂热”的感情？相比现实中越来越讲究分寸感的亲密关系，粉丝的“狂热”感情为何会失衡？

朱丽丽：我认为粉丝的目的不是寻求现实中社会交往的补偿，而是纯粹基于对媒介人物的“爱”而相互吸引、集聚和交流，其核心情感诉求点在于对准社会交往对象的喜爱与支持，源于人类依恋他人的本能，与距离远近无关。粉丝的“狂热”感情发展到失衡，一是粉丝的权力在可数据化、可视化的互联网语境中成为“流量”，与粉丝偶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丽丽

经济紧密绑缚，催生了粉丝应援打榜机制，粉丝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认同在这个语境下被放大了；二是互联网环境使得单个粉丝连接起来，成为饭圈、粉丝社群，粉丝个体的情感和行动受到了组织化圈层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类似于狂热、迷恋等情感的群体极化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拟态亲密关系”和现实中的亲密关系还有区隔吗？会影响粉丝的现实生活吗？

朱丽丽：所谓“拟态亲密关系”，是指一种建立在网络空间的想象的亲密关系。它与真正的亲密关系有别，但是又借助于越来越强大的粉丝本身，打破传统的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与神秘感。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拟态亲密关系是对现实中亲密关系的仿拟，但是一旦粉偶之间缔结了这种关系，其收益和风险是同样巨大的。同时，这种想象性的仿拟关系也很难持续性地主导粉丝的个人生命。这种关系更多还是在线上进行，是虚拟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变成真实存在的关系。对粉丝的现实影响，更多还是要看粉丝个体的生命成长。整体而言，我们不要小看粉丝自我规训和自我治理的

能力。对学术界和媒体来说，我们也要秉持自己的责任和伦理，我们的研究和报道也要考虑帮助粉丝发展出自我约束的能力。

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博弈

三联生活周刊：偶像区别于传统明星的重要特征是他们都有被精心打造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人设”，粉丝在追星时会意识到偶像背后或许还有另外一重真实人格吗？

朱丽丽：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往往来源于对他们身上某一种品质的喜爱，拥有这些品质的对象都是理想的伴侣或是自己想成为的形象。对年龄较大的粉丝来说，对某种品质的认同往往因为年龄的差距更容易转化为一种对“美好”“脆弱”的东西的保护欲。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信任和理解，即真实的自我表露，但微博等新技术的实现非但没有将偶像们的“后台”生活展现出来，反而是“前台”展演的一种延伸，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层人设的外壳之上，这种关系是极不稳定的。

经纪公司在替偶像打造“人设”时，虽然也会考虑偶像的个人特质，但更多是以市场需求和商业价值为主，可能会与偶像的真实人格大相径庭。许多初期被圈粉的粉丝，可能是被“人设”吸引来的，但是当他们“粉”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会比较在意偶像的真实性，所以一些偶像“塌房”之后，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脱粉。令他们感到伤心的不一定是偶像的崩塌，更可能是被美好人设打动的自我的动摇。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被精心打造的偶像，他们有可能实现个人意志和造星机制之间的平衡吗？越来越多的偶像“塌房”是否说明了这个机制的脆弱性？

朱丽丽：偶像这个职业，利益和风险同样巨大，偶像自身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他们当然有个人的需求，但这也是获取巨大回报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长盛不衰的偶像自律性都特别强，会自觉牺牲一些个人生活。偶像如果想打破这个怪圈，就需要降低对造星工业的依赖度，如果把自己的声誉、经济回报和影响力都高度寄托在造星体系之上，就得承受体系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偶像和粉丝之间存在博弈。偶像如果还处于上升期，受体系和粉丝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如果已经站稳脚跟，或许可以降低影响。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偶像本人的实力和影响力。

当然，偶像机制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也需要偶像和粉丝共同去打破，反思整个造星工业的商业性。造星工业除了需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也应该尊重社会主流价值观及公众感知。尤其是偶像工业对青少年有巨大的影响力，更不能以利润为唯一尺度，需要正视青少年成长中正向价值的形塑和引导。这需要社会、公众、媒介、学界的共同关注，形成良性的舆论协商和协同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粉丝的权力已经迅速崛起和壮大，对偶像的干预也已经深入私人领域，那么粉丝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朱丽丽：在互联网社会，粉丝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反转，他们不愿意再扮演痴迷盲从的形象，懂得如何通过集体和网络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甚至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但同时边界依然存在，我们看见的所有粉丝活动都跟平台息息相关，平台又受到国家政策的掣肘，2016年以来，国家网信办牵头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2021年整治重点转为“饭圈乱象”。粉丝权力网络具备毛细血管一般的弹性，粉丝的自我规训有它的试探空间。如果政策或平台给的空间比较大，粉丝愿意扩圈，就会跟爱国主义、商业资本共舞，多方参与公共生活和舆论导向。但如果外界空间缩窄，他们又可以把行为限制在微观政治和日常消费领域。

另一方面，粉丝的控制性虽然有时会深入到偶像的私人领域，但有时也会转向自身。如果偶像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和想象，他们就会出现大规模脱粉，转身将情感投射到另一个相似的偶像身上，偶像之间的竞争很激烈。粉丝是有选择的，他们其实是流动的，这也是变相地对偶像施压。

“粉丝文化”就像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粉丝文化”的研究是一个问题型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问题都在不断变化，当前你关注到的最新问题是什么？

朱丽丽：我最近思考的方向是有关饭圈组织化的协同治理问题，希望通过分析饭圈组织化与平台、

媒介、政策之间的多元关系、饭圈组织化对社会主体的冲击和影响，深入探寻多元主体如何协同合作，引导饭圈文化成为健康的青年力量。

随着大众文化工业的发展，有两个节点改变了追星活动，一个是大众传媒的出现和普及，第二个节点是互联网的出现，两者叠加构建起巨大的媒介基础设施，连接起不同的社群，促使追星活动以更广泛、更激烈的方式被社会看见。一开始，粉丝文化只是一个边缘的小众文化，但当它跟流量、资本、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后，就破圈了。从早期的“追星族”，到“歌迷”“影迷”，再到“粉丝”“饭圈”，称谓的变化映射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粉丝已经形成非常具有组织力、行动力、影响力的互联网社团。粉丝文化也不再是“圈地自萌”的亚文化，而是越来越主流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粉丝和网民的界限已经分不清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粉丝和网民的界限已经分不清了？

朱丽丽：粉丝跟网民的界限模糊了，粉丝文化跳出了亚文化圈，产生了很多不属于亚文化的议题，网络社群的社会动员力量溢出了，搅动社会舆论的力量增强了。比如早期的“帝吧出征”，还有疫情期间“饭圈女孩驰援武汉”，从粉丝社群发动起来的议题有多少普通人参与其中？拿周杰伦粉丝和蔡徐坤粉丝之间的“打榜战役”举例，卷入其中的粉丝和网民怎么划分？况且，粉丝本身也在不停地流动，粉丝到了一定年纪就脱粉、退圈的现象非常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粉丝会逐渐投入工作和家庭生活，社会经历和压力使他们不能再像青少年时期那样追星。总之，进入平台媒介时代，粉丝进而指代平台账号订阅者甚至平台用户整体（即“网民”），粉丝文化与青年文化、互联网文化逐渐难分彼此，粉丝群体、粉丝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也持续上升。这里面有很多模糊地带，都是学术界和社会有待深入观察的问题，才可能做出更清晰的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观察中，当下有哪些新的“粉丝文化”现象值得大众关注？

朱丽丽：除了青少年粉丝，中老年粉丝很大程度被忽视了。最近塌房的秀才背后就是巨大的中老年粉丝群体，一直以来他们的情感和娱乐都是匮乏的状态，只能通过短视频和虚拟偶像寻求慰藉。这个人群是沉默的大多数，长期不被看见，这也反映了社会人群的隔离。在秀才塌房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秀才的存在，但其实他背后的流量非常惊人。对许多中老年女性来说，秀才是浪漫关系的想象，也是一个情感倾诉的对象，她们中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获得过爱情和关注。如果进一步延伸这个话题，她们为什么没有说话的对象？背后反映的又是打工潮带来的家庭结构分崩离析，底层女性长期陷在辛苦讨生活的状态，没有什么机制为她们提供情感支架。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饭圈事件开始被大众关注并议论，这说明饭圈和大众的距离缩小了吗？但其中伴随的不解和困惑似乎也越来越多，你怎么看这种矛盾的现象？

朱丽丽：作为一个小众文化，粉丝文化正在融入主流文化，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粉丝文化对文化消费和民族工业有推动，比如近年来开始流行的国潮、古风，以前都很小众，但有了粉丝的高度参与后，它们开始被青少年群体热捧，包括以传统文化IP为创意的动画电影、B站跨年晚会、河南卫视的“奇妙游”系列等。在一些性别议题上，粉丝群体也在微博上持续讨论女性生育、职场性骚扰，因为粉丝中年轻女孩占了大多数，她们也推动了这些社会议题的深入。另一方面，大众需要理解粉丝文化并不代表需要无限度地接纳它，饭圈的破圈效应整体上是良莠不齐的。负面表现主要是对舆论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冲击和扰动，比如饭圈之间的谩骂、恶性竞争等，很多与饭圈文化相关的热搜引发了公众反感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警惕。

回顾中国粉丝文化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似是而非的闭环：从20世纪90年代的“病态青年”到2020年前后的“时代之病”“社会症候”，这看似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循环，然而此病非彼病，不同时期定义的“病”或者“症候”的内涵及语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所谓病理化青少年，所指对象还是边缘性的少数；后者的社会症候则是指粉丝文化与国家、资本、平台、媒介等结构性要素的复杂缠绕已成为中国当下非常突出的现象，成为与主流社会有重大相关的社会问题。粉丝文化就像一面镜子，研究它就是研究当代，背后映射的是复杂流动的社会肌理。



1

贝克汉姆，一个传媒品牌的诞生和成功

文 · 李孟苏

四集纪录片《贝克汉姆》擦亮了“贝克汉姆”品牌的金字招牌，让观众再次爱上这位退役10年的足球明星。

圣人大卫 · 贝克汉姆传

大卫 · 贝克汉姆今年48岁，人生过半，到可以树碑立传的年龄了。Netflix播出的四集纪录片《贝克汉姆》似乎是普鲁斯特写的脚本，一开头就是大卫在明媚阳光里缓步前往乡间庄园里的蜂房，金色的蜂蜜流进他手中的玻璃瓶。大宅子位于科茨沃尔德，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里提到“最美英国乡村”，都会收入科茨沃尔德的地名。

纪录片的很多取景是在贝克汉姆家的乡间大宅，展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家庭生活细节。贝克汉姆爱整洁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家里整齐得不可思议。他衣柜里的衣服分门别类，每个衣架间的间距相同，如果有人动了他一眼就会发现，赶紧按自己的顺序摆好。抽屉里的衣物按颜色摆放出不同的角度，方便取拿。如果他没有踢球，会是出色的收纳整理师。

他开口说话了。他轻松随意地说，他会在家人都入睡后，来到厨房，调好灯光，开始擦洗灶具、料理台，剪掉所有的蜡烛芯，把每一件东西归于



（视觉中国 供图）

2



3

1. 贝克汉姆和他的前经纪人、商业合作伙伴西蒙·福勒

2. 贝克汉姆与弗格森签署了他和曼联的第一份合同

3. Netflix 播出的四集纪录片《贝克汉姆》剧照

原位。他家的厨房干净得好像从来没用过。贝克汉姆的声音在年轻时比较尖利单薄，是他最薄弱的环节，如今语调沉稳亲切，不会带给人丝毫压力。他用这种口吻谈他的童年、职业生涯，谈他对荣誉、婚姻、家庭的理解，隐晦地回应了导演提出的婚外情问题，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沉默良久，他谈到给妻子造成了“伤害”，两眼含泪，“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私人生活”。

近年来，关于体育偶像、英超联赛、怀旧2010年代的纪录片大批涌现，《贝克汉姆》把这些情绪热点精心编织在一起，给了观众足够多的球赛片段、足够多的八卦和足够多的娱乐体育界明星。这部纪录片除了遮遮掩掩地提到出轨，没有曝出什么新料，毕竟贝克汉姆夫妇的生活被记录、披露得太多了。但这部片子从全新的“受害者”角度重新呈现贝克汉姆，拍了一部圣徒传记片：贝克汉姆是嫉妒、仇视、资本、小报和狗仔队、大众窥私欲的受害者，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些糟心事变成了地狱，他最终在球场上获得了救赎。

这样自律、不改敬业精神的贝克汉姆还伴随着成熟生发出豁达、宽厚，完美地契合了大众对偶像的期待。几十年如一日维系冷漠女强人形象的维多利亚也在片中流露出软弱，一一列举她作为妻子和母亲要操心的家务琐事，诉说他们夫妇二人共同面对的风霜刀剑，显得脚踏实地，人情味十足。相对鼎盛期，贝克汉姆夫妇出现在报纸头版的频率大大降低，纪录片把他们重新拉回公众注意力的焦点，而且让主人公超越了通常概念上的运动员和名人，更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纪录片播出后，贝克汉姆在社交媒体上涨粉50万。维多利亚在片中穿的白衬衣成了潮流单品，百货公司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里一件相似的白衬衣销量翻了4倍。

当片尾字幕推出，会看到出品方为“99工作室”（Studio 99）。它是贝克汉姆拥有的传媒公司，这意味着，贝克汉姆不想让大众知道的事不会在纪录片中透露出来。他让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导演、在伪纪实风格的电视剧《继承之战》中扮演雨果的费舍·史蒂芬斯来拍他们的家庭纪录片，和上世纪60年代女王请BBC拍王室生活纪录片如出一辙。贝克汉姆是“二战”后英国历史上被拍照和采访最多的人之一，大概仅次于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他也和女王一样，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却又如此不为人知。

过度曝光造成伤害也带来财富

四集影片中，大卫和维多利亚谈了很多成名带来的压力。观众未免感到些许讽刺，因为这些压力大多是他们自己制造的。纪录片不过是贝克汉姆夫妇又一次投喂给大众的八卦零食。一方面，他们在片中抱怨受到绑架威胁，无处躲藏，很害怕。贝

克汉姆抱怨，在西班牙他们送孩子上学都被狗仔队跟拍，在电视上直播。维多利亚说，感觉全世界与他们夫妻为敌，他们和媒体彼此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乐于把私人生活，特别是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曝光于天下。他们一家人的楚门秀轨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与90年代末兴起的流行文化重叠在一起。费舍·史蒂芬斯把贝克汉姆的成名路径、和媒体的相爱相杀安排为纪录片的一条主线。

贝克汉姆成名于1996～1997赛季。任意球踢出划时代的贝克汉姆曲线后，他开始了与各种品牌的合作。他给保时捷代言，那是他第一次坐保时捷，还带着拘谨。“那是我第一次踏入足球之外的圈子，当时鲜少有足球运动员这样。”贝克汉姆在片中说。队友内维·加里尔说，一般球员做不到的贝克汉姆能做到，除了想当足球明星，他还想得到更多。

赚到的钱贝克汉姆都花了，买金劳、古驰皮衣，因为有狗仔队跟拍，他要让自己帅帅的。通常球员都找一个本地女孩做老婆，他却和当时最红的流行歌星高贵辣妹成为情侣。他频繁更换发型，穿纱笼，1998年把婚礼的独家报道权以100万英镑的天价卖给了八卦周刊《OK！》杂志。小报胡编乱造，贝克汉姆一个劲儿给他们猛料。

最早跟拍他们、曝光他们恋情的狗仔队说，他们对报纸来说是天降甘霖，有无数个报道的角度，适合娱乐、流行文化、体育、商业等各种版面。美国版《Vogue》的主编安娜·温图尔让维多利亚登上封面，她说：“当两个人都魅力无穷时，魅力值就会翻倍。”他们引领了时尚，连狗仔队都去恶补时尚知识，了解维多利亚拿什么包、大卫穿什么运动鞋、戴哪款墨镜、开什么车，好写在报道里。

1998年贝克汉姆在世界杯赛场上被罚红牌下场，2003年他离开曼联转会皇马，成为足球界身价最高的球员之一，年收入1050万英镑，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齐达内（980万英镑）、罗纳尔多（820万英镑）。这5年内，他的声名也达到了巅峰。贝克汉姆确确实实影响了英国传媒业的运作。这对超级名人夫妇是英国最大的新闻来源，他们不管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能登上各大小报纸、周刊杂志的头版、封面。仅在小报《每日镜报》上，平均每天就能看到5次贝克汉姆夫妇的名字。2002年英国的大小报纸上共提到他们18500次，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娱乐圈和政界名人。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能成为世界狗仔队之都。

贝克汉姆在曼联的周薪为9万英镑，其中2万英镑是形象使用权的费用。他的教练弗格森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他的经纪事务。贝克汉姆有俱乐部之外的经纪公司，在不踢球的时候，经纪人负责安排他在全世界巡回推广自己的形象：和曼德拉、安南会面，去美国参加MTV颁奖典礼，参与慈善活动，比如反对种族歧视、劝告球迷不要做足球流氓、为联合国筹集善款，等等。

当年《观察家报》的专栏作家彼得·康纳德评论：贝克汉姆的跖骨断了，大家为他祈祷；扭伤了手腕，又让人苦恼。好了，现在，大家又要为他转会开始祈祷了。贝克汉姆左右着这个国家的情绪。纪录片中有一个细节，贝克汉姆夫妇在电视台做专访节目，主持人介绍他们，“这是英国最著名、最上镜、被八卦最多的夫妇”。

过度曝光导致了他和教练弗格森的分歧。弗格森说：“他变了，他获得的媒体关注让他成了名人，这与我的期望背道而驰。”贝克汉姆坚称：“（名气）绝对没有改变我。”弗格森回答：“嗯，他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弗格森的助教卡洛斯·奎罗斯教练说，当商业利益侵入球场，就出现了球场内和球场外的斗争。从贝克汉姆开始，球员的价值不在于他每场比赛进了多少球，而是看他卖掉了多少双球鞋、多少套球衣。他曾为嘉实多代言，宣传润滑油，其实他本人就是润滑剂，用以促进商业和传媒机器的运转。

贝克汉姆的胜利

贝克汉姆是现代公共关系和传媒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完美产物。

康纳德在2003年的《观察家报》上写道：“贝克汉姆是媒体时代的反映。他只是膝盖以下有非凡的天分，结果自己就成了媒体，传达各种免费的或收费的信息。不要做种族主义者和请喝百事可乐，本质上都一样。其实贝克汉姆对他要传播的信息也不感兴趣。他在身上用印度语文了维多利亚的名字，但是拼错了，那也没关系，反正他

们谁都不懂印度文。对他来说，耐克的钩子和汤米（希尔费格）的小旗子，都没什么区别。”

2003年9月，小报登出一张贝克汉姆和西班牙助理丽贝卡·路斯的亲密照片，颗粒粗糙，画面模糊。婚外情曝光了。维多利亚立即要求丈夫终止与原经纪公司SFX的合同，这导致路斯丢了工作。惊恐的路斯向英国公关大鳄马克斯·克里夫德（Max Clifford）求助，克里夫德帮西班牙女郎把这段艳情卖了个好价钱，让英国的各家小报以及天空电视台，白捡了爆炸新闻。克里夫德此人，只要评“英国最坏的100个人”，他就会上榜。他是操纵整个新闻的人，一点儿都不同情走倒霉运的贝克汉姆夫妇。“从公关的角度来说，他们不应该把这事儿处理得这么烂。贝克汉姆够成熟、够有钱，他应该有能力防患于未然。至于维多利亚，她以一种滑稽的方式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过于饱和地出现在媒体封面上。她太热衷于名气，我敢说她宁愿这样还怕没人注意她。不过我要老实说，如果大卫·贝克汉姆是我的客户，这事儿永远、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

渡过险关的贝克汉姆夫妇更不甘心做媒体工具，而要成为内容和价值观的输出者，更要把握舆论的走向。贝克汉姆与西蒙·福勒的公司签了经纪约。

西蒙·福勒是英国著名娱乐制作人，发掘了音乐人保罗·哈卡索，为麦当娜制作了《Holiday》唱片，制造了“辣妹”、S Club7两个流行音乐组合，创造出电视选秀节目《流行偶像》。在运作“辣妹”组合时，福勒改写了一个概念，他把“歌唱组合”发展成电视、电影、零售行业的“品牌”。维多利亚与贝克汉姆的婚事就是他有意识撮合的。二人恋情曝光后，福勒一直扮演着怂恿、刺激媒体的角色，果真吸引来媒体排山倒海般的注意力，极大地提高了贝克汉姆夫妇的知名度。

关于“名气”，福勒说过一句话：“名气是媒体爆炸引发的现代现象，现在全世界有无数个数字频道和小报，15分钟制造出一位名人并不奇怪，何况有很多人乐于出名，为了出名愿意做一切事情。”在福勒看来，流行歌星、运动明星是品牌，而不是音乐家、运动员。他们应该出现在杂志、电视、服装、书籍、广播和一切你能注意到的媒介上。他们像超市货架上摆着的商品一样有“货架寿命”，所以在他们的保质期内，必须尽可能有效地发掘出其一切价值。

在福勒的亲手调教下，贝克汉姆比绝大多数名人都善于管理、控制自己的公众形象。2014年，福勒成立贝克汉姆品牌控股公司，让退役的贝克汉姆能够成功延续“贝克汉姆品牌”。他还投资了维多利亚的时尚业务。2019年，贝克汉姆夫妇以3800万英镑的价格从福勒手中买下了他所持有的股份，独立掌控了个人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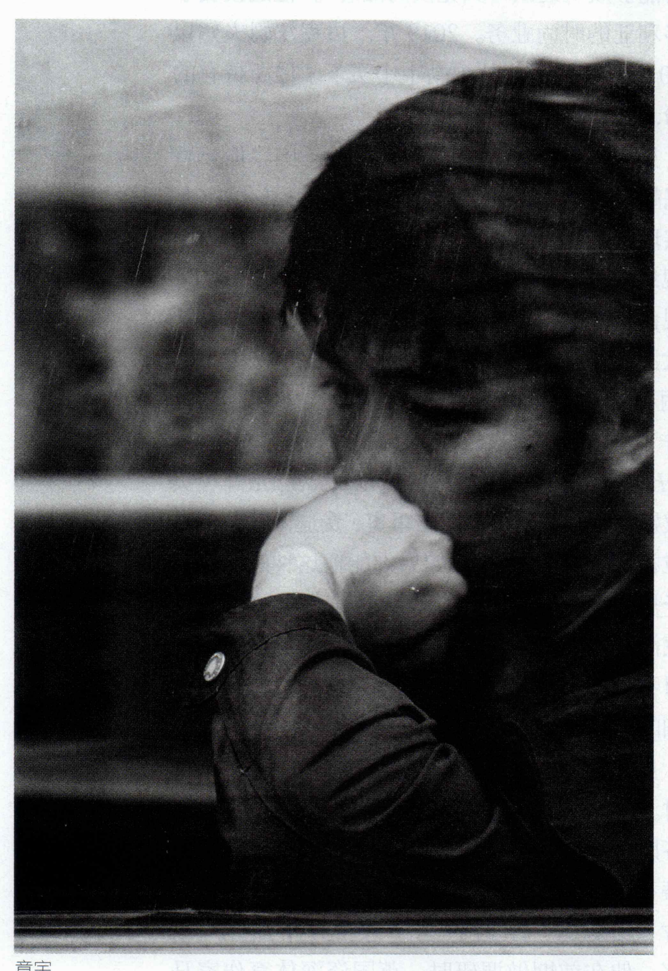
贝克汉姆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他一直有兴趣运作体育、旅游、时尚等内容的商业化平台，为实现传媒梦想，他成立了“99工作室”，致力于电视纪录片和杂志的制作。他的创业伙伴是ITV电视台高层妮可拉·豪森（Nicola Howson），还有大卫·希斯（David Heath），他曾是好莱坞明星丽芙·泰勒的合伙人。2021年，“99工作室”制作了纪录片《狂热足球：英超崛起》（*Fever Pitch: The Rise of the Premier League*）。《贝克汉姆》第一集，曼联球员里奥·费迪南德谈到老特拉福德的气氛，说：“如果你能把这种感觉装进瓶子里卖掉，你就会成为亿万富翁。”这事儿正是贝克汉姆最擅长的。他真的成了亿万富翁，据《星期日泰晤士报》发布的2023年富豪榜，贝克汉姆夫妇的净资产为4.25亿英镑。

贝克汉姆为他的纪录片录了30个小时的采访素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向他推荐了费舍·史蒂芬斯，他们曾经合作过纪录片《洪水泛滥之前》。史蒂芬斯支持利物浦队，而不是曼联，他凭借纪录片《海豚湾》拿到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他在前期做调研时，英国资深体育作家马特·狄金森（Matt Dickinson）对他说，很少见到一个运动员像贝克汉姆这样清楚自己的价值和目标，而且确切地知道如何转化价值，实现目标。狄金森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回忆了一个细节。2000年他帮贝克汉姆写一本书，有一天他告诉贝克汉姆，出版商给他们施压，想要在书中看到更多有关色情的细节，包括他与维多利亚的私生活。贝克汉姆回答：“我给他们什么就是什么。”狄金森写道：“他的冷酷态度表明，谁会赢得这场较量。”

与媒体缠斗20多年，贝克汉姆终于以“成为媒体”赢了。

章宇：模糊才是世界的真相

记者・卡生



章宇

章宇的演技被谈论得越来越多，而他自己却越变越神秘。

不拍戏时，章宇喜欢喝酒，这在朋友间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他自嘲，自己“出产”于酱香型白酒产区，虽然酒胆大，酒量却不行，常常是调子起得高，爱张罗喝，却总是朋友中早早喝高的那个。他有一套非常特殊的喝酒理论，“清醒的世界是坍塌的，酒能给生活做减法，它让一切模糊起来，让人更接近一种简单”。

演戏之外，章宇喜欢把自己“藏起来”，如果不是为了配合电影《鹦鹉杀》的上映，观众很难看到他的身影。章宇说，角色是他表达的工具，这也是他在演戏时追求的一种境界，“简单”是一种期待，杂念少一些，在角色上多下一点功夫。

初见章宇前，我和导演麻赢心的感觉差不多，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吧，但恰恰相反，章宇的配合度很高，对一切与角色有关的思考都洋溢着热情。第二次见章宇，我们约在他家附近的一间茶室见面，相比宣传期的赶场，这次更符合他日常的状态，中午起床，下午骑上心爱的复古自行车到家附近会见朋友，眼里有残存的倦意，但聊角色时很快会发光。章宇认为，演员这种职业的特殊性是用角色和观众对话，再多一点的曝光都会让他觉得危险以及失去自由，所以他拒绝上综艺和接受过度采访。

他怀念那个用微博记录生活的时代，那时候他还是一名叫晓章的北漂年轻人。除了嬉笑怒骂的段子之外，他还喜欢写诗，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他身上的文艺劲儿总会不定时地在酒后发作。那些记录着生活点滴的微博他舍不得删掉，而是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章宇的演技被谈论得越来越多，而他自己却越变越神秘。

音准

《鹦鹉杀》之前，章宇没有和女导演合作过，麻赢心是第一个。当拿到这个剧本时，章宇看到了来自女性视角下的许多细腻的“小扣”，很别致，尽管在电影上映之后，口碑呈现了两极化，章宇和导演麻赢心、监制双雪涛都知道，“杀猪盘”这样一个社会议题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拍摄是一种冒险，但冒险似乎是章宇的本能。

他扮演的林致光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感诈骗

犯，他在互联网上通过编造不同的身份和女孩们聊天，他理智、果决，对于受害女性没有丝毫怜悯，然而，当林致光与骗过的女孩周冉在现实中相遇，他表现出的“真情”与伪装让人真假难辨，甚至一度让我在相信和不相信之间来回摇摆。

“这个角色的难点在于，演实和演虚了都不对。要找到一个真和假之间的尺度和分寸。”章宇说。他之前演过许多有爆发力、大开大合的角色，但林致光身上的模棱两可和暧昧感对现在的他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双雪涛之前和他聊林致光这个角色时说，这是一个以受害者视角叙事的电影，林致光只是一个中途出场的人物，章宇却觉得这样特别好，这是一个让人看不清的角色，充满了神秘感，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电影在东山岛拍摄，那会儿正赶上疫情封控，除了拍戏之外，主创们喜欢聚在一起聊角色。章宇向麻赢心提出一个想法，林致光作为一个假装新加坡商人的骗子应该操什么样的口音？麻赢心觉得，一个用声音骗人的人，有太浓的口音还能骗到一线城市生活的高知女性似乎有些不能接受，章宇却觉得既然他是一个新加坡商人，有一些走南闯北的口音应该会更有说服力。两人在口音上的分歧很大，章宇找了新加坡朋友聊天，发现纯粹的南方口音的确有点跳戏，最终，将南北方的口音各取部分，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双雪涛说，这个改动有点意思，在林致光的身上呈现出了一种漂泊感。麻赢心在剪片的时候也发现，林致光的口音的确让人物多了几分有趣的真实。

麻赢心评价章宇是一个擅长思考的演员，他会在拍摄前想得很深，在拍摄时反复探索，去寻找那个最准确的表演。章宇常常反思，这个角色中最让他产生兴趣的部分需要传递的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恰恰是一些看上去不那么“音准”的状态，反而更能呈现林致光这个人物的底色。

章宇演戏喜欢琢磨角色。他对我说，剖析一个角色的过程，其实跟外科医生差不多，“你得把血管、肌肉、脏器、骨骼都给它捋清楚，然后再去分析人性，就会看到一个方向。锚定一个目标去演便会把角色表达得准确”。林致光这个人物说起来复杂，在章宇的“庖丁解牛”之后，似乎又不是那么难演了——“林致光作为一个常年钻营、欺骗别人感情的人，一定是逻辑清晰、反应迅速的，他对人的观察和算计是一种下意识，只要抓住他迟疑、晃神和失控的几个瞬间，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

章宇的表演方法一开始并不是“解剖式”的，他聊起他2011年拍摄的电影《手枪》，这是一部至今没有上映的电影，连续六年，每年都会补拍一些镜头。那时候年轻，他说，由于自己扎得很深，戏拍完，人有点走火入魔，世界是昏暗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种“危险的自溺”。后来，他觉得既然做演员是一辈子的事业，这样的感性驱动，拍不了几部，人就不行了。所以从那之后，他开始对角色进行庖丁解牛般的剖析，他认为这样才是健康且可持续的。“就像画画，不能一直盯着一个角落在那儿描绘，有时候站远一些感受一下，把自己抽离出来看整体那些没有画过的部分，然后再去调整能量的配比、节奏的快慢、旋律的高低。”在采访过程中，章宇偶尔会流露出对年轻时那种“自溺”式的表演状态的怀念，但他也很清楚，那样尽管很迷人，但也十分危险。

纯粹

章宇喜欢写诗，拍戏时有感而发会写，“酒神附体”时会写。在他发给我的诗歌里，能感受到他对于文字的热爱。那些直穿灵魂的字句，透着野性和疯狂。我想，如果章宇不做一名演员，做一个诗人也很不错。

在章宇发给我的诗里，有一首诗很特别，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猜测应该是写给挚友胡波的。“我想到那些一去不返的人，一去不返！一列姓名驶过，有生有死，或明或暗，他们驶入黑夜混作一团，吸引我的同时，给我昏眩的惊骇。一截绳子，一个盒子，一本英汉词典，一张像素不高的照片，或一颗不能咽下的肉丸，它们都在指向明的同时又指向暗……”

导演胡波在拍摄完《大象席地而坐》之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生命。他的死给章宇的世界观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章宇谈到他时，依然非常难受，“因为他的事情，很

多状态被撕开了，震碎了”。章宇在那之后度过了一段无所适从的日子，一帮朋友们追求的电影梦，那些近乎奢侈的理想与纯粹是否真的可以存在？

章宇回忆起《大象席地而坐》开拍前胡波制片人找他时的情景。制片人找到他，想让他出演于城这个角色，手里拿了一份合同放到章宇面前，章宇说，没钱就是纯帮忙，还签什么合同。这是章宇演戏以来唯一一次没拿钱的演出。由于资金限制，电影只拍摄了27天就完成了，章宇还把艺术家好朋友厉槟源推荐给了胡波，在影片里出演一名倒买倒卖的黄牛。说完，章宇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章宇是在北漂十年之后的2018年被观众看见的，他参演的三部电影在这一年先后上映，《无名之辈》《我不是药神》在商业和口碑上双丰收，《大象席地而坐》虽然无法上映，但却入围柏林电影节，获评费比西影评人最佳影片和金马最佳剧情长片。那一年，他36岁。回想他当年义无反顾辞掉贵州话剧团的工作，从贵州坐上绿皮火车到了北京，这十年好像是一场梦。

对于北漂而言，最难的就是押一付三的房租。章宇性格要强，没钱租房从来没有跟父母开过口，有时候是哥们儿接济，有时候是厚着脸皮向曾经待过的剧团里的团长借一些钱。初到北京，没有背景的年轻演员为了角色要蹲守有剧组驻扎的宾馆，不管是不是有机会，看见剧组工作人员就给人家塞资料。一开始，资料上没啥作品，根本不会有剧组用你，即使是客串过一场戏的作品也要往上写，最好能填得满满当当的。尽管如此，章宇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不甘心。

他告诉我：“因为年轻，身上有一种朝生暮死的状态。白天被人拒绝，到了晚上人非常绝望，但第二天爬起来依然充满希望继续跑组。”做演员有没有前途有时候是一门玄学，不是说你有实力就一定可以演出名堂。有时候去剧组试戏，也有可能副导演前面挑花了眼，最后一天你恰好出现就是你了。

在他的微博尚未彻底关闭之前，那封怀念胡波的悼词一直置顶。他曾经写过，“胡波孑然前往，率先抵达，他再不会被消解掉”。《抵达》是胡波离世前写的剧本，章宇一直有些羡慕胡波，他是一个近乎于理想主义的创作者。尽管章宇知道，人在演艺圈很难做到纯粹，但“尽量不带杂念地去创作哪怕一次，对于人生也是重要的”。他希望自己也可以无限接近那种纯粹。“年轻的时候无忧无虑，是因为死亡是遥不可及的，感觉你可以一直奔放下去，但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死亡并没有那么远。”章宇说。

自由

章宇觉得自己身上的反叛、野性、执拗是永远不可能被驯化的，只能是用一些方式让自己藏起来。成名之后，微博上说的话发的图不再安全，公众人物是一群被过度关注的对象，那些属于普通人会有的情绪会被无限地解读。无奈之下，他关闭了面向大众的微博。

成名的好处是，剧本纷至沓来，他可以在众多角色里挑选自己喜欢的。2018年之后，《风平浪静》中具有宿命感的宋浩、《东北虎》里的中年人徐东，都是他想要去诠释的角色。还未播出的娄烨的《三个字》、田壮壮的《鸟鸣嘤嘤》以及采访当日刚在平遥电影节上预热的《沉默笔录》都是接下来会陆续上映的影片。章宇喜欢和艺术家们一起玩，他曾对厉槟源说，羡慕艺术家们的生活，能创作，也能做自己。

成名这道考题有时候会把人吞噬。章宇觉得，那是一个巨大的旋涡，充满了诱惑，一旦接受，或许人生就会失控。“他拒绝了很多。”厉槟源是章宇身边重要的见证者。

厉槟源和章宇相识于2016年一次跨界的艺术活动，两人后来发展为密友，是拥有对方家里钥匙的关系，是城市里彼此的亲人。厉槟源回忆两人的初次相识，“一开始大家不熟悉，又都很狂，互相都不太搭理对方，直到走到成都，我们合作了一个作品《小厉与晓章》”。那是一个戏剧行为艺术表演，两人互相交错念章宇写的两首诗，原本不相干主题的诗歌，形成了一种互文与对话，章宇说：“就像是当代人沟通的方式，每个人都只是在考虑自己想表达的那个部分。”那场戏没有预演，两人即兴发挥，演得酣畅淋漓，像是一个我和另一个自我之间的对话。

章宇爱喝酒，厉槟源却是酒精过敏，两人在一起时，章宇总是喝大的那个，厉槟源负责护送。原本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却有一些相似的对于艺术（表演）的理解。厉槟源认为，身体是他的空间，所经历的时间则是他的作品。章宇说，身体是演员的媒介，



上图：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下图：艺术家厉槟源（左）与章宇





演员的神秘性是塑造角色的基础。总之，身体是艺术这个事情大概是他们的共识，他们都是动用身体表达的人。

章宇拍《东北虎》时，厉槟源去探班，看见鹤岗附近冬天的雪地，突然来了灵感，在野外湖泊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四肢绑上红砖在冰面上爬行，名曰“进程”。艺术是一种随时都能发生的事情，这是章宇一直向往的自由感。厉槟源跟着章宇回过贵州都匀，两人走街串巷，聊到许多往事。经过某条街时，章宇说曾在这里被乌泱泱的几十号人追，像极了香港电影《古惑仔》里的场景，如果不是当时跑得快，或许早就死在了这条街上。

2013 年，章宇银行卡里还有一两万元时，他决定沿着 318 国道从成都骑行到西藏，全程 2200 公里。那辆自行车是在拍一部短片时片方赠送的普通山地自行车，他骑着这辆道具车勇闯西藏，为了轻便行囊，扔掉了所有的配重。他给自行车取了个亲切的名字叫“老白”，方便在途中跟它聊天。抵达拉萨时，他让藏民朋友翻译了鲁迅的一句话：“梦醒之处无路可走。”然后把这句藏文喷绘在了自行车的大梁上。那辆叫“老白”的自行车现在已经退役，挂在章宇的家中，舍不得扔掉，因为那是他人生中最接近自由的一刻，而老白，陪伴并温暖过他。

章宇与我采访过的所有演员都不太一样。他的忧伤、迟疑、困倦都是具有指向性的，没有粉饰，充满了真实的力量。我从未期待过与某个演员真挚地谈论彼此喜欢的作家。章宇聊起查尔斯·布考斯基，他喜欢他，是因为他极简的文风穿透了翻译，可以毫无损伤地被读者理解到，更何况，他如此地热爱喝酒。当然，类似的作家还有几个，也属于他喜欢的行列，比如海明威与卡佛。

他喜欢文学作品里的穿透性，然而在他的表演中，他却期待着演出一种模糊性，因为那才更接近生活本身。就像他自己，复杂且天真，准确又需要偏离准确，模糊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要不要背诵?

文 · 苗炜 图 · 孙愚火



背诵真是一种奇观啊。

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某一天某位同学的姥姥在家长群里发出一个视频，是她外孙女在背唐诗。如果背诵的是“离离原上草”，家长们估计会夸奖一番，但小姑娘背诵的是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大家矜持、沉默。等我儿子上完小学一年级，按照课本要求，会背七八首古诗了，加在一起也不到《春江花月夜》的一半。儿子每天早上到学校，老师会带着他们背诵《三字经》，我送他上学，路上偶尔听他背诵两句，不由得想起我背诵得最熟的一篇课文，那是上世纪80年代高中英语课本的第一课，叫《马克思是怎么学习外语的》，当年背得滚瓜烂熟，不过到现在还没有learned the spiri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annot use it freely。马克思学英语的方法，我没能掌握，但我对英语世界还是充满了好奇心。

100多年前，英国学者阿诺德说，真正的教化要通过阅读文学、学习语法和背诵伟大作品来实现，他任学校督导时，要限制科学在小学课程中的比重。他说，一个男孩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赋予他把事情做对的能力，语法比数学更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还说，背诵伟大的诗歌，能让学生体会人类思想的美，一字不差地背诵能培养学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操守。

我看过《爱丽丝漫游仙境》，爱丽丝坠落到兔子洞，想考验一下自己是否还像从前那样头脑健全，她先背了乘法口诀，然后又背了一首诗，这首诗写的是小鳄鱼：

小小的鳄鱼真机灵，
尾巴擦得亮晶晶，
尼罗河水哗哗流，
在鱼鳞片上闪金星！

他咧着嘴巴笑嘻嘻，
伸开爪子多神气，
笑容慈祥又温柔，
欢迎小鱼进嘴里。

英国诗人艾萨克·沃茨曾在教育部门任职，他写的诗，要求学生背诵。有一首诗是这样的——“我听到懒虫在抱怨，你把我叫醒得太早了，我还要睡，再多睡会儿，这样就浪费了半天的时间。”按照沃茨的逻辑，孩子背下这首诗，当妈妈叫他起床上学时，他就不会再要求 a little more sleep，学生们背了这首诗，就会知道傻吃闷睡是不道德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小鳄鱼”，是在戏仿沃茨的诗《小蜜蜂》。沃茨原来的《小蜜蜂》是这样的——

小蜜蜂啊小蜜蜂
善用每刻闪亮时光
整天采蜜多辛勤
在每朵盛开的花上

瞧她熟练建蜂房
瞧她整洁涂蜡汁
努力干活来储藏
自己做成的甜食

不论劳动还是技艺
我也要忙碌不停止
因为撒旦会把坏事
塞进一双懒惰的手

看书干活或好游戏
第一年就这么度过
让我的每一个日子
都有美好经历可说

勤劳的小蜜蜂这个形象看来没什么文化差异，我们也有儿歌，“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我上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杨朔的散文《荔枝蜜》，当年好像要求“全文背诵”，那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酿造着未来。”这散文有点儿腻腻歪歪，“全文背诵”这四个字更让我怀恨在心。可上了大学，第一学期考当代文学，有一道题就是分析杨朔的散文，我在考卷上胡乱写了几百个字，大概意思就是我们都上了大学了，能不能让我们学点儿高级的东西，别老拿这样的作家糊弄我们。后来老师找我谈话，说我这道题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但还是给我一个及格。

沃茨教育孩子的、带有自然神学意味的小蜜蜂，被卡罗尔改成了恶搞的、适者生存意味的小鳄鱼。爱丽丝后来跟大青虫说，她本来想背诵《忙碌的小蜜蜂》，可是背诵出来的词全都变了，大青虫就让爱丽丝再背诵一首《威廉爸爸你老了》。这是英国诗人骚塞的诗，原作是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者问答。老年人说：我年轻时，牢记青春会飞逝，所以我不滥用我的健康和精力，这样我将来就不会匮乏。我知道青春短暂，不管做什么事，我都着眼未来，我始终把上帝放在心间，所以到老了还能平安喜乐。原诗颂扬了勤劳和虔诚的价值，爱丽丝再次把这个正能量的诗变得无厘头——

威廉爸爸你老啦
头发变得白花花
整天还在拿大顶
你这年纪合适吗

年轻时不敢练倒立
生怕脑子出问题
现在反正没脑子
多练几下怕啥的

爱丽丝背诵并篡改的这个版本中，“威廉老爹”成了一个拿大顶搞推销的小商贩。这一戏仿把那些擅长道德说教的老者嘲弄了一番。我年轻的时候能听到与骚塞原诗相差无几的训诫——“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还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还有一句话，我爸爸会背诵，传给了我，我也背了下来，“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

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我起先为这句话中的逻辑所困惑，如果虚度年华，当然应该悔恨，如果碌碌无为，当然应该羞愧，后来隐隐觉出这句话异常严肃，你要在“临死的时候”，面对上帝或者面对一个终极大boss，你要对自己的一生所为做出解释并接受评判。塑造一个人的灵魂类似于DNA的转录和复制，爱丽丝的戏仿违背了转录的过程，淡化了阅读、背诵、时间管理和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

背诵伟大诗歌当然能塑造一个人的操守，不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两句诗指向两条不同道路。美国心理学家加涅说，我们所铭记的言语序列直接明显地作用于语言特别是口语的建构，回忆现有的言语序列能帮助我们构造交流思想的连贯语句，并衍生出无限多样的新口语表达。也就是说，在语言学习中，显性的语法规则能帮助学生建构言语规则，隐性的言语规则也能被内化，背诵能增强语感。加涅的这个说法，我们翻译一下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语言学习是一个逐步积累范例的过程，爱丽丝背诵的打油诗消解了原诗的价值观，但依赖的还是背诵下来的语言范例。

朱熹老先生说，凡读书，须整顿几案，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朱熹老先生推崇的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现在已转变为“传授”了，但老先生所讲的那种积极的学习状态，久远不忘的学习效果，还是非常有吸引力。如果说学习过程包含了输入—练习—输出，背诵到底属于前两个阶段还是后一个阶段呢？我们要孩子集中注意力，要用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背诵更显示出他的注意力在集中了，背诵就是用功。我们钦佩那些诗词大会的冠军，钦佩那些张嘴就背诵《秋兴八首》的诗人。清朝有个读书人唐彪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人，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绝。文成之后，自以为辞意皆己出也，他人视之，则以为句句皆从他脱胎也。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说的还是输入和输出。

有统计说，小学教材中要背诵的篇目大概是160，初中要背诵的篇目大概是120，高中只有30来篇，这300篇90%以上是古诗和文言文。说实话，对古诗文词，除了背诵，还有什么更好的学习方法？不过，学习语言，也不总是朱熹老先生那样正襟危坐。我们这里有一首美好的歌谣，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我就跑，轰的一声学校不见了”。小孩子接触到这样的东西，也就是知道了什么叫“戏仿”。再比如《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假乌龟那段“谐音梗”，他说学校里的课程首先是“缠绕和扭曲reeling and writhing”（其实是“阅读与写作reading and writing”），接下来课程是“野心、分心、丑化和嘲弄，ambition，distraction，uglification，derision”，这说的是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假乌龟对学校课程做滑稽变形，但这段语言游戏也是语言学习的好材料。

学习外语要不要背诵呢？我在“知网”上看了不少论文，大多数都主张背诵。论文援引语言学家和行为学家的论述，说语言是一种记忆理解系统，外语初学者有必要背诵不同类型的文章来熟悉外语；语言是一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的行为，未经强化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背诵就是最好的强化手段。这些论文大多会提到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克拉申说，学习者要有大量语言输入，可克拉申还说，学生要是感到紧张、无聊、压力和自卑，学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我还看到一位老师在网上讲数学，他要求学生背诵“大乘法表”，也就是20以内的乘法表，这样有助于做素因数分解，听到他这个要求，我想了想13乘17、17乘19等于多少，完全不记得了。倒是想起来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一位学习不错的小女生向老师告状：“罗伯特今天早上背乘法表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好。”老师隔着窗户问：“7

乘 8 等于多少？”罗伯特小声说，43。老师大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再错的话，我就要拿手杖揍你了。”还有，《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开头，爱丽丝也背错了乘法表。英国数学家丹尼尔·塔米特说，几百年来，乘法算术题对孩子们来说，难度丝毫未减。他还引用了学校监督署的一份报告说，对乘法表不够熟悉，会严重影响乘法计算的熟练程度，很多反应慢的学生很难用乘法表来计算。

塔米特希望用谚语的方式来改造英语乘法表。他说“五乘五是二十五，六乘六是三十六”这两句，韵律非常舒服，开头和结尾同样工整，考虑 7 乘 8 这个问题，应该把答案 56 放在前面，这样就强调了最重要的部分。他从韵律和结构上思考怎么改进英语乘法表，非常推崇日语乘法表的韵律和节奏，还说像中国乘法表那样把“乘”和“等于”这样的词都删去，更有助于学生的背诵。英国学生之所以背不好乘法表，就是教育者不考虑英语乘法表形式上的重要性。

塔米特是一个拥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会 11 种语言，2004 年创下一项纪录，用 5 个小时的时间背诵出了圆周率小数点后面 22514 位数字。他把圆周率打印在信纸大小的纸上，每张纸 1000 个数字，就像画家凝视风景那样凝视这些数字。2004 年 3 月 14 日这一天，他从伦敦坐火车到牛津，在一间博物馆里当着摄影机和若干观众开始背诵。他说，大东西比起小东西更特别更刺激，因此更容易被记住。像 pen 和 song 这样的词容易忘，因为它太简单了，像河马 hippopotamus 这样的词读起来慢，说出来也更花时间，反而会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说法实在违背我的直觉，不过塔米特接着说，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起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既长又复杂的数字列能玩出花样和韵律。

照他这样说，背诵《蜀道难》比背诵“床前明月光”要更有意思，背诵《春江花月夜》获得的乐趣，绝不是背下一首七律能比的。塔米特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他背诵圆周率的 5 小时 9 分钟，我看完后不由得感叹，背诵真是一种奇观啊。别说 5 个小时了，如果一个学生能连续背诵 5 分钟，那就是一篇 1000 字的文章了。

抵达地球的小行星样本

主笔 · 苗千

太阳系形成40多亿年来，小行星贝努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的化学性质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可以说在其中保存着太阳系形成初期的物质形态，因此获得贝努的样本也就有极其重要的科学意义。



2023年9月24日，一份珍贵的小行星样本从天而降。已经离开地球7年的“OSIRIS-REx”航天器飞临地球轨道，从10.2万公里的高度向地面投下了一份含有小行星样本的包裹。这个包裹只用了十多分钟就穿透地球的大气层，最后在降落伞的减速作用下缓慢降落在美国犹他州的沙漠地带，而后迅速被专业人员找到，进行密封保存。这是人类至今为止获得的第三份小行星样本，其中可能包含着太阳系形成以及生命现象产生的秘密。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2016年9月发射的OSIRIS-REx航天器全名叫作“太阳系起源、光谱解析、资源识别、安全保障、小行星风化层探索者”（Origins, Spectral Interpretation,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Security, Regolith Explorer），它离开地球已经有7年时间，目的就是执行一项耗资10亿美元的小行星取样计划。这次将小行星样本送回地球，标志着这次太空任务圆满完成。

在2017年到达目标小行星“贝努”（Bennu）之后，OSIRIS-REx又花了两年时间围绕着它进行探测。这是一颗宽500米、富含碳元素的近地小行星——实际上，它对地球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平均每6年与地球接近一次，未来它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极低。看上去这颗小行星的表面远不如人们此前想象的光滑，而是一个由石块和沙砾受引力作用聚在一起的物体。

OSIRIS-REx在2020年10月开始在小行星表面采样，但采样过程并不顺利。用来取样的机械臂总是插入石堆中过深，让任务难以完成。最终飞行器取得了总共重250克的石块和沙土，并密封保存，而后又花了将近3年时间返回地球，将这些珍贵的样本送到科学家手中。

在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包裹外层的最高温度可能达到2700摄氏度以上，这有可能造成包裹破损并且毁坏其中的小行星样本。在发现坠落于沙漠的包裹后，已经为此进行了多次训练的团队首先确认包裹没有发生泄漏，随后迅速将其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密闭实验室，让样本处于氮气环境中。尽管如此，科学团队还是对其降落地点附近的环境进行取样，以确定其在降落过程中是否受到污染。

这仅仅是人类第三次取得小行星的样本。2010年，日本的“隼鸟号”飞行器将“丝川”（Itokawa）小行星的样本送回地球，而其取得的仅仅是一些肉眼不可见的微粒；2020年，“隼



(ICphoto 供图)



(ICphoto 供图)

左图：2020年10月21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OSIRIS-REx探测器在2亿多英里外具有潜在危险的小行星Bennu上进行了历史性的短暂着陆

右图：9月24日，美国航空航天局从深空采集的首批小行星样本空降犹他州沙漠

鸟2号”飞行器将其在小行星“龙宫”（Ryugu）上取得的大约5.4克样本送回地球；而本次总共获得了250克的小行星样本，是最多的一次。由于样本珍贵，在分配时要格外谨慎。在装样品的容器被打开之后，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其中的石块，测量了每一个石块的大小、形状，以及质量和孔隙率等性质。美国航空航天局将70%的样本留待未来有了更先进的仪器后再进行检测；将4%～5%的样本送给日本和加拿大的合作者；剩下25%的样本才是供科学团队中超过200名科学家研究使用。

太阳系形成40多亿年来，小行星贝努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的化学性质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可以说在其中保存着太阳系形成初期的物质形态，因此获得贝努的样本也就有极其重要的科学意义。一方面，行星科学家们希望从这些样本中了解太阳系形成初期的状态，理解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样本解开地球生命现象的起源问题。

例如，关于构成生命的重要物质氨基酸究竟从何而来，目前仍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氨基酸起源于地球的海洋热泉，也有人认为其来自撞击地球的小行星。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在陨石中发现了构成生命现象最关键的20种氨基酸中的12种。在获得了贝努的样本之后，科学家们好奇能否在其中发现所有20种氨基酸。

在人类有能力将类似龙宫或贝努小行星的样本直接送回地球研究之前，科学家们只能通过落在地球上的陨石来研究太阳系内小行星的构成。现在看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想要经受住快速进入地球大气层时产生的高温，落在地球表面的陨石大多是非常坚硬的石块。但人们现在了解到，像龙宫或贝努这样非常松散且含有大量水分的小行星样本可能才是太阳系中小行星的常态。

为了获得小行星贝努的样本并将其送回地球，飞行器OSIRIS-REx花费了7年时间，总共飞行距离超过62亿公里，终于完成任务。不过，它的太空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如今它已经改名为“OSIRIS-APEX”，重新向太空深处进发，计划在2029年围绕着小行星阿波菲斯（99942 Apophis）进行探测。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杂志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的相关报道）

板块运动与地球气候

主笔 · 袁越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很多人都被关在了家里，其中就包括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范斯沃斯（Alexander Farnsworth）的古气候研究者。有一天他在网上闲逛，看到一篇论文预测2.5亿年之后地球上将会出现一块新的超级大陆。这个消息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将英国气象局（Met Office）开发的一个气候模型放到布里斯托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上跑了一遍，看看2.5亿年之后的地球气候将会是怎样的。运算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那时的地球平均气温将会超过40℃，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将会灭绝。

范斯沃斯博士将这个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23年9月25日出版的《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杂志上。其实2.5亿年是一个超出普通人想象的漫长时间，今天的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但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地球的板块运动为什么会影响地球的气候，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生命在进化的过程中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挫折。

根据这篇论文，2.5亿年之后地球升温有三大原因：首先是太阳的光照强度将会增加2.5%，这是地球增温的外部原因；其次，超级大陆的形成会伴随着火山活动的增加，从火山口喷出的大量二氧化碳将会增加地球的温室效应。不过，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了部分专家的质疑，比如德国地质学家沃尔夫冈·基斯林（Wolfgang Kiessling）就认为地球内部的热量会随着地球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减少，所以2.5亿年之后的火山活动强度并不会增加太多。

再次，也是最有意思的原因，就是板块运动本身所带来的升温效应。当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合并成一个超级大陆时，大陆中心区域因为距离海洋太远而变成了沙漠。这件事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陆地植被减少，光合作用总量降低；二是降雨量减少导致陆地上的沙土不再能顺利地流入大海，这同样会妨碍大气二氧化碳的固定。原来，地壳内储量丰富的硅酸盐会在雨水的帮助下和大气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变成碳酸钙和二氧化硅（沙子），这个过程被称为硅酸盐的风化（silicate weathering）。正常情况下，风化产物会被雨水冲进大海，这就相当于把大气二氧化碳埋入了地下。

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这块超级大陆的位置。根据计算，超级大陆最有可能形成于赤道附近，那么上述增温效应都将变成现实。但如果这块超级大陆最终漂移到了地球的两极地区，那么陆地上覆盖的冰层会将太阳光反射回去，这就抵消了部分增温效应。

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在南极大陆，这块大陆是在1.2亿年前漂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因为洋流的作用，来自热带的海水可以畅通无阻地流到高纬度地区，所以南极大陆一直没有结冰。直到大约1500万年前，南极大陆和南美大陆彻底分开，德雷克海峡被打通，环南极洋流终于成为一个封闭的圆环，把来自赤道的温暖海水挡在了外面。于是南极大陆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冰盖，直接导致地球温度的下降。

哺乳动物身上有皮毛，不怕低温，所以地球降温是哺乳动物崛起的重要原因。但哺乳动物非常害怕高温，如果地球大气温度超过了体温的话，几乎所有的陆地哺乳动物都将被热死。相比之下，像爬行动物这样的变温动物更能适应高温环境，所以2.5亿年之后地球将会回到侏罗纪公园的时代，重新成为爬行动物的天下。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大汇聚（5）

蔡新罚俸

文 · 卜键

与永瑢同时任四库馆总裁的蔡新，福建漳浦下布人，自幼家境贫寒，与兄蔡湛随寡母耕作砍柴，艰辛中不忘读书。得益于远房叔父蔡世远（理学家，雍正朝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的关爱指教，蔡新于清贫中不废书卷，打下深厚的儒学根底。乾隆元年丙辰科，30岁的他得中二甲第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时值弘历初政，一改父皇胤禛的严苛峻急，施政宽松，注意采听臣下的建议，命翰詹科道官员每日呈进经史讲义，用备暇时阅读，也借以考察诸臣的学识境界。蔡新先后撰进讲义数十篇，深得嘉许，升侍讲，十六年九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对于那些老编修，这个速度就算是够快的了。弘历很重感情，做皇子时蔡世远是上书房师傅，曾为其《乐善堂文钞》书序，蔡新的发达与此有关吗？应该有那么一点点吧。

蔡新出于乾隆帝的亲自栽培，君臣二人亦感情深挚。十八年三月，担任刑部侍郎的他奏请回乡省亲，恳请开缺（即解职）。弘历批曰“准给假，不必开缺”，并赐予其母貂裘缎匹。二十二年六月，蔡新再请回籍为老母养老送终，也获得批准。蔡新感激君恩，弘历五十寿辰特地入京祝寿；二十六年皇帝南巡，也赶到浙江朝觐。其母病逝后，蔡新待守孝期满，才于三十二年五月回京。此类情况一般要等待职位出缺，有的一等就是数年，而有旨命蔡新复任刑部右侍郎。应是想到其在老家十年没有俸禄，乾隆又命蔡新提督直隶学政。次年八月，蔡新升工部尚书，一个月后改为刑部尚书，不到一年又改兵部尚书，兼以总理国子监事务。谁都看得出来，皇上有了让他入阁的意思。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蔡新的赐第失火，孙子亦经被烧死。乾隆闻知感伤，传谕所有烧损的公家房屋，均加恩以公款重修，免其自行赔修。三十八年八月，蔡新调任礼部尚书，九月钦命担任四库馆正总裁。

与叔父近似，蔡新长期任上书房师傅，后任总师傅，自然是永瑢的老师，师生二人一起进入四库馆，同做正总裁，也是一段佳话。蔡新精通数学，能应用勾股弦原理进行开方，弘历命皇子于课余时间跟他学习数学，永瑢的算学专长，应来源于此。此年的老蔡已然67岁，是一位老臣，也是一个名臣。乾隆登基之初大夸张廷玉、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后来认为二人各树朋党，渐而不喜“名臣”之说。而蔡新的忠正廉洁和纯孝善良，都使他欣赏信赖，嘴上不说，心底则以名臣待之。蔡新在家乡奉养老母时，弘历降旨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同时特别说明并非催他返京供职，只是为之预留这个位置——那份信任尊重，应非名臣莫属。

蔡新雍容和易，说话行事皆有名臣气象。四十六年辛丑科会试、殿试的第一名为钱棨，其也是翁方纲上年主持江南乡试的解元，所谓“连中三元”者也。科举规矩，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要拜谒孔庙，礼毕，再往国子监彝伦堂拜祭酒等，三人簪花后，预备的一枝备用金花则归总理大学士，历来如此。蔡新时任内阁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在场职位最高者，接到金花后递与翁方纲，说：“此三元，君所得士，而今又亲与此礼，此花以归君。”方纲顿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作《三元宴诗》《三元花歌》，又撰《唐宋以来三元考》，一时和诗者甚众。所谓名臣，又在于并不把名当回事，能让就让，不是吗？

历史上的名臣，也要求遇到麻烦和压力时不推卸，能担当。进入四库馆不久，蔡新就遭遇了一场小风波。那是三十九年二月，四库全书处进呈誊清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总裁等在封面上题有“原本校刊精审，并无应签之处”，岂知乾

隆一翻便发现有错，谕曰：

……朕以为其中断无错误矣。及偶取披阅，则《圣祖仁皇帝御制集》诗内桃花“桃”字，误写“梅”字，未经校出。朕于所缮各种书籍，原未尝有意苛求，亦实无暇通身细阅。而信手披翻，错字自然呈露，则其他舛误处谅更不少，总裁等岂宜概以轻心掉之耶？此内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所有皇六子永瑢、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英廉、金简，俱着从宽免其交部。其余总裁每日到馆，岂可于呈览之书竟不寓目！且全书卷帙浩繁，朕并非责伊等挨篇细校，但能每本抽阅数处，时为驳正，则校对及誊录等皆知有所儆畏经心，何竟见不及此耶？王际华、蔡新、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俱着交部察议。其复校、分校等员，并着一并交部议处。（《清高宗实录》卷九五三）

呈进康熙帝的《御制诗文集》，各总裁必然慎之又慎，反复精校，才敢在封面写上那段担保无误的话，未料皇上火眼金睛，还是被挑出错讹。这道谕旨的重要之处，还在于记述了四库总裁的分工：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英廉、金简是不看文稿的，于敏中虽有审稿之责，但在军机处实在太忙，应负责的正总裁为王际华、蔡新，以及副总裁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三人。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分工吗？应是有的，此谕则一律予以斥责。

当年十月，乾隆再次传谕指责誊录和校勘错讹太多，《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九七：

四库全书处进呈抄录书本，朕连日偶加翻阅，检出舛漏处不一而足。其中实系错误者，过失固不待言，即原文传写旧讹或文义不顺，既有加签改识之例，何不逐条举出，概以轻心掉之耶！朕未尝有意苛求，实亦无暇通身细阅，乃数日内信手翻披，而疵谬迭出，该总裁等所司何事？《永乐大典》内由散篇辑成者，此次始行呈进，办理已经年余，而自朕五月间临幸热河以后，又阅半年之久，何尚未能悉心校勘，以致疏悮若此？其纂修各员交该总裁等照原议办理外，至各总裁内，王际华于校勘《荟要》诸书，加签标识者甚多，前此呈览时，朕详加批阅，并未见有字画错误之处，办理尚属尽心，此次着免其议处；曹秀先于五月内随驾热河、继复派典顺天乡试，现进各书自未及寓目，亦着免其交部；其蔡新、张若溎、李友棠俱着交部察议。

因皇上已加区别，落实处分时将王际华、曹秀先排除，仅有蔡新、张若溎、李友棠被罚俸六个月。每一次被罚，老蔡都是默默接受，绝无声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本一體致中和而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其理自然不待勉强夫所謂
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豈非教
人以戒懼謹獨之意乎然究而言之有
不可則有可者在是尚出於勉强也出
於勉强則不能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
物矣蓋天地本無不位也萬物本無不
育也元黃分而清濁奠形色彰而動植
殊歷混茫以来有不位不育之時乎其
不位不育皆自人心不能致中和而然
初非天地萬物之過也孟子得子思之

蔡新书经筵御论（二）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球员赌球还真是个问题

文 · 张斌


（视觉中国 供图）
桑德罗 · 托纳利

10月的国际比赛日，意大利足坛平地风雷，江湖上有人抢着爆料，逼着警方只得在欧洲杯预选赛关键战前突袭国家队训练基地，堵住涉嫌赌球的几位国脚，随即将传闻坐实，又一轮意式球员赌球案爆发。见多识广之人，此时并不悲切，反倒拿意大利足球开起玩笑：逢赌丑闻，意大利人大赛必有所成，明年欧洲杯蓝衣军团卫冕有望嘛。

这玩笑自然会让意大利的支持者悲愤交加，何来卫冕一说，复兴之路如此坎坷，晋级决赛圈还要拼尽最后的力气。如此不堪的局面之下，以未来之星托纳利为首的球员赌球案又让意大利足球蒙羞，意大利人担忧自己本就蒙上微尘的足球名声遭此一击后，会不会直接导致今后转会市场上的整体式微，真若如此，那损失可就太致命了。

托纳利以近7000万欧元身价登陆纽卡斯尔联队，仅仅出战12场，便遭受了意大利足协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罚，虽已是法外开恩的10个月禁赛轻判，但整个赛季已完全报销，花了大价钱的纽卡斯尔联队着实被重伤。据说，警方突袭意大利国家队时，托纳利面对首轮讯问，紧张得不得了，并未完全承认过往赌球的行为，辩称是痴迷于其他非法游戏。事发之后，托纳利的经纪和法律团队反应迅速，对外宣称当事人患有“赌瘾”，确曾参与非法赌球，愿意配合警方深入调查，并向意大利足协自首，承诺愿意以参加社区服务等行为抵偿部分禁赛刑期，这才获得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罚结果。

根据《意大利体育正义法典》，托纳利以及其他涉案球员的禁赛期高限可达三到五年之久，基本上就是只治病，不救人了。此番，意大利足协格外法外施恩，足协主席格拉维纳公开将涉事球员称为“自己的孩子”，不忍舍弃。国家队主帅斯帕拉蒂最初的态度是，任何人涉赌都要伏法，后续眼见警方不顾情面搅扰了国家队备战，他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坚持将涉案的托纳利排进了与北马其顿比赛的首发名单。AC米兰主帅皮奥利在知道旧将曾非法下注自家球队之后，虽也震惊不已，但还是公开展现了慈父加恩师的一面，宣称过往爱托纳利10分，那现在就是100分。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也算温情，禁赛令一下，托纳利便要暂别赛场，那一日雨夜中，球迷聚集在球场里高唱意大利歌曲，想以此温暖23岁迷途羔羊的脆弱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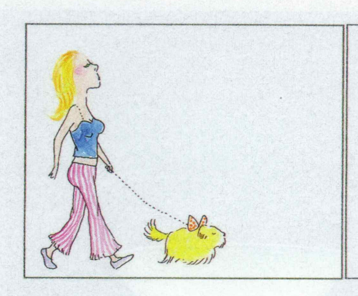
以上反应似乎都太温情了，意大利足球名宿迪·卡尼奥在电视直播节目里，痛斥新一轮赌球风波的主角们，翻译成中文最直接的意思大概是——傻瓜们！脑子进水了吗？做客节目的嘉宾、昔日门将马切吉亚尼也是怒火中烧，警告所有球员应该牢记，不赌球是底线，绝不同情犯科者。意大利名帅泽曼将矛头直指意大利足协，认为禁赛三年才能有所威慑，如今惩处宽仁过度，意大利法律没有得到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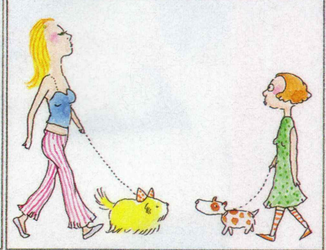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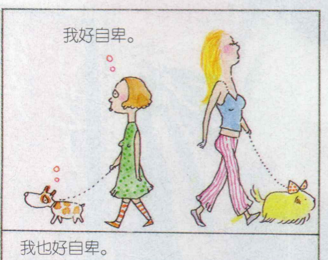
意大利政府五年前其实完全意识到了整个国家深陷过度的足球博彩和赌博之中，也曾发布所谓《尊严法条》，严禁博彩广告再上胸前广告，即便意大利职业足球一年为此损失一亿欧元也在所不惜。但是已经渗入到民族性之中的好赌之风以及移动互联网提供的便捷的用户体验，导致合法与非法的足球赌博异常繁盛，格拉维纳沉痛剖析，举国500万人参与，150万人病态沉溺，因此才会有球员涉赌的胆大妄为。

在水晶宫队扮演救火队长的老帅霍奇森10月刚刚荣享俱乐部执教500场的纪录，在与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前被问及托纳利的赌球风波，76岁老人关切了托纳利之后，便强调说：“我们的比赛在推广各种博彩，这对社会并无益处，我们曾经努力戒除球员们嗜酒和烟瘾，如今要和他们的赌球作斗争了，这是我们社会的现实。”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我好自卑。
我也好自卑。


我心目中的完美情人是像猫一样心思细腻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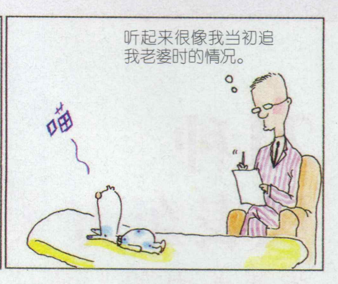
我心目中的完美情人是像狗一样乐观豁达的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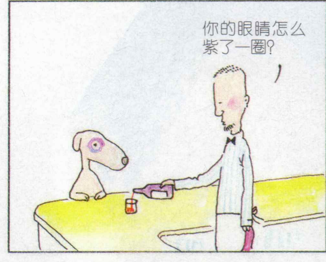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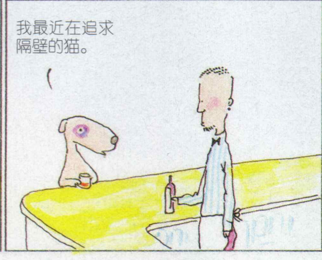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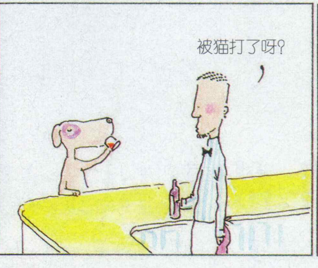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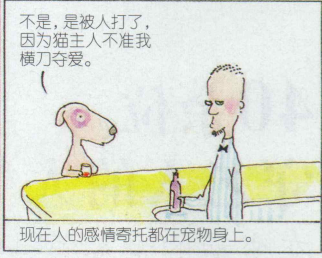
我就是一只像猫的狗。
我就是一只像狗的猫。

虽然如此，但骨子里依然是狗和猫呀。


我爱上了隔壁邻居的猫。

我为了她改变了所有的生活习惯，吃鱼、爬屋顶，不再像狗一样摇尾巴……

现在的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狗还是猫了……

喵
听起来很像我当初追我老婆时的情况。


你的眼睛怎么紫了一圈？

我最近在追求隔壁的猫。

被猫打了呀？

不是，是被人打了，因为猫主人不准我横刀夺爱。
现在人的感情寄托都在宠物身上。


星座专家说我们的星座相冲，还是别结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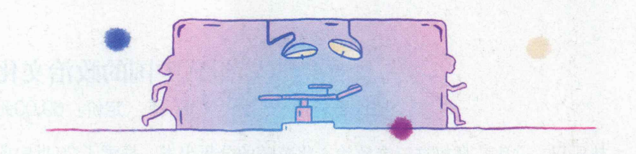
命理专家说我们的生肖相克，还是别结婚吧。

血型专家说我们的血型不合，还是别结婚吧。

专家说的都不算，想“成家”的说了算……

人到中年，做手术的前提是不耽误事

文 · 琢玉　图 · 陈曦



早上10点半，我终于到了办公室，还好，没太影响上班。我跟领导说的也是只需要晚到一会儿，连半天假都没请。

同事看到我，疑惑地问："今天怎么穿得这么休闲？"我一向喜欢穿正装上班，今天却穿了宽大的牛仔衣，里面套了一件T恤。我笑了笑说："我早晨去做了小手术。"同事一脸惊讶，连忙问我怎么了，我淡定回答："没大事，只是切了黑色素痣。"

我背上的黑色素痣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从来没有当回事。人到中年，乳腺、甲状腺的结节都是家常便饭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痣。但老公总是提醒我："你这东西太大了，切了吧。"因为他说的次数太多，本来毫不在意的我，终于下定决心去看看。

到了医院，医生淡定地对我说："你这个看起来颜色均匀，形状规则，如果不影响生活，就不用管它。"后来大半年，只要老公再提起这个"小黑豆"，我立刻把医生的话搬出来。再说了，我爸刚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一家人都围着他转，我哪有空管我背上无足轻重的一个痣。

但今年，"小黑豆"开始自己狂刷存在感，我明显感觉到它长大了，从一个西瓜子变成了比黑豆还大。我便又冲向了医院，还是那个医生，果然，今年他的话明显不同，只看了一眼就"判了刑"："切了吧，太大了。"

此时，我忽然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并不是因为病情，而是心里那些待办事项：过一段我爸要复查；下周单位有个大活动不让请假；最近孩子到了关键时刻，要准备体测备战中考……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像脑内面目狰狞的怪兽，冲我咆哮着。

医生看我没吭声，以为我害怕，便说："没事儿，很小的一个手术，你什么时候有空，我给你约上。"但我还是想再"反抗"一下："医生，我最近太忙了，要不再过一段时间吧。"医生笑着说："一个小时就完事。"我顶着苦瓜脸解释："我还要把家里和单位的事安排一下。"医生乐了："不需要安排，不影响任何事，也不需要家属陪同……"

难得遇到这么"热情"的医生，我不好意思再争辩，便定下这周四的早上8点，排我第一个做。

说实话，我对这个小手术没啥心理负担，但它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平时虽然我有带薪假，也不扣钱，领导还算体恤下属，但我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敢请假。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人用假的时候多着呢。这么件小事用掉一次宝贵的机会，会不会太不划算了？

终于，我生平第一次进了手术室，换上病号服，戴好一次性头套和鞋套，等待医生"传唤"。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忽然意识到，这完全是为了我的健康，怎么会不值得请假呢？平时都围着别人转，自己反而不重要了吗？

我趴在手术床上，医生只用了半分钟就把那个"黑豆"切下来了，全程我也没觉得疼。的确是个小手术。

下了手术床，我用最快的速度骑车奔向地铁，冲向了办公室。晚上下班，我又按平时的速度冲出地铁，抢到共享单车去接娃，然后回家马不停蹄地准备晚餐。吃过饭辅导娃完成作业。因为我爸周末要来，我提前把准备好的被褥拿出来，换洗了被单，将房间打扫了一遍。

完成了心中的待办事项，我长舒一口气，这场不耽误事的手术，甚好。抬眼看了一下表，快到11点了。当我进入厨房打算准备明天的早餐时，忽然犹豫了，不如明天买着吃吧，我要多睡半小时，走出这不变的中年循环。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